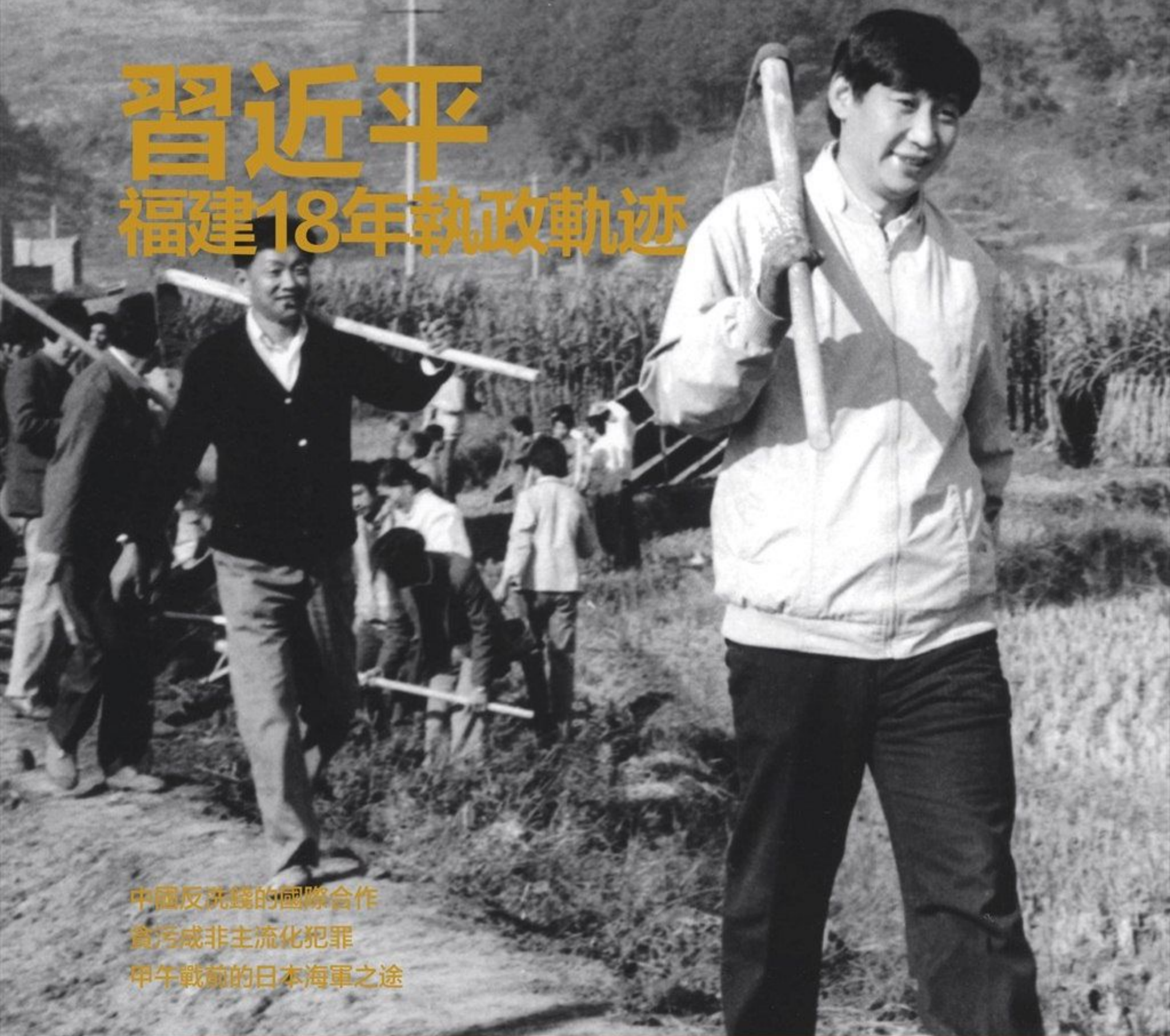


PHOENIX WEEKLY

鳳凰週刊

OCT 2015 | 第28期 | 總第557期

習近平 福建18年執政軌迹



中國反洗錢的國際合作
貪污成非主流化犯罪
甲午戰前的日本海軍之途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www.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官方微博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凤凰礼品微店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00852-22008790 传真0755-25934579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东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酉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镭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镭
副总编辑 蓝艺
主 编 师永刚 周宇
总编室主任 段宇宏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记者部主任 段文
主 笔 叶润洋 魏基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漆菲
主任记者 钟坚 李光 张弛
记 者 温彦辉 徐佳 陈祥 王琰 孙杨 曾鼎 赵新宇 李克难 吴如加
马军 徐伟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派记者 李想(华盛顿特区) 蔡源(墨尔本) 田晶(巴黎)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 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发展部编辑 马茹均 莫文辉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编 辑 部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社 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00852-22008790
深圳办事处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00852-22008888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楼 邮编518001
电话86-755-25934567(订热线)/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100005
电话86-10-65281005/65281006(订热线)/65211745(办事处)
Email: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010-84467053/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200042 电话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层(邮编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中美友好的战略不能改变

□ 周兼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与评论热潮。访问前，人们对中美关系不好、紧张等各种猜测，随着访问成果的逐一公布，烟消云散。应该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在外交层面上的最大成果是：不但稳定、巩固和发展了双边合作，而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走向变得更为清晰了。

自从2011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中美之间摩擦逐年增加。虽说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合作领域远超这些所谓的角力与分歧，但棘手的问题确实不少。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像中美这样的大国之间，要建立起新型的双边关系，必须经常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具体、现实的矛盾与问题，才能确保两国战略关系不被干扰甚至破坏。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时，正是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初始元年，二者在时空上的交叉并行，绝非偶然。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的访日、访美为标志，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就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但主控着世界经贸、金融、市场、技术、资源的绝大多数份额，而且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众多领域秩序、规则的引领与制定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战略，题中原有之义是，对内改革是唯一的生路，而对外开放则是对内改革的前提和必备条件。讲到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回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开放主要就是针对他们的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友好的外交战略，其实也是中共治国理政的内在需求。反之亦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战略正是中美友好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只要中国不背离改革开放这条唯一的生路，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中美友好的外交战略。

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中美之

间在广泛、深入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矛盾、误会和冲突、博弈，但并未超出正常的国际关系范畴，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可夸大其词。换个角度审视美德关系、美韩关系、美日关系，作为盟友，他们之间亦长期存在龃龉。虽然中美关系殊为特殊，但无论如何，中美友好的战略方向不能改变。

习近平访美前，大陆的官方媒体曾梳理过他对中美关系的十个判断，诸如：“中美存在分歧，但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加强对话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错误”，“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停留在概念上”等等，表明习近平对中美关系一直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认知。而他这次访美本身，也是在向国际和国内社会传达积极的信号。

很显然，中美友好不仅是中国国际关系的基石，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支点。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是金融等行业改革，无论是大型国企的跨国兼并还是民营企业的国际合作，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贸体系、对美国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有着极大的依赖。虽然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如果能放眼长远，控制分歧，在重大问题上多进行对话与合作，就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越来越深的裂痕。因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共同利益显然要大于分歧，合作的现实也要多过对竞争的想象，毕竟两国双边贸易总额已达5500亿美元。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说过，中美合作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表示，世界上除非美中两国一致，不然能够解决的全球挑战是极少的。2014年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奥巴马更表态：“美国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的兴起。事实上，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帮助中国融入全

球经济——不仅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而且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以及全世界的最佳利益”。

两国领袖人物的表态，反映了他们的清醒认识：中美友好是双方不能改变的战略，合则两利，斗则两败。

习近平访美恰逢美国即将进入新一轮大选，这时竞选者拿中国说事，很多时候也是争取选民的一种手段。回顾内部，大陆不也有很多媒体天天围绕着美国编造阴谋论故事吗？网络上叫嚣战争甚至核大战者亦不乏人在。对此，大陆民众要有清醒判断。目前中日、中菲关系等均处于历史低点，香港与台湾地区现在也出现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中美关系再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就会或早或晚、或多或少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环境。

论及中美友好，不能不涉及中俄关系。中俄目前确实不错，但不能把中俄关系的基础设定为“联手抗美”那样一种过时的、机械、简单的想象上。国家之间的竞争远比对抗要复杂得多。如何让本国的思想文化、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实现真正的进步，才是国家实力真正的竞争，而不需用对抗意识和冲突事件来体现。显然，与俄罗斯相比，美国对中国所能提供的合作空间要广大得多，而且会影响其他欧美国家对华的外交战略。即使中俄联合，要想对如今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也几乎不可能。如果采取“抗美思维”，只会强化与整个西方世界无谓的冲突与对抗。

中美关系当下虽缺少信任，但尚不缺少“信用”。只要是两国签署的合作协议，两国政府都在努力、切实地履行合作内容。随着两国增进对话、深化合作、不断扩大各种合作领域的信用，相信就能不断增加彼此的信任。在人类历史上，大国之间可以对抗，也可以共生。中美友好对两国来说，显然都是一种睿智的战略选择。



18

COVER
STORY

习近平福建18年执政轨迹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17年零5个月，是其“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从特区厦门到“后排老九”宁德，再至省会福州和省委省政府，从副厅级成长为正部级的官员，始终一步一个脚印稳步迈进。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厚实的执政经验，理念和思维日臻成熟。

红云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卷首语 Editorial

3 中美友好的战略不能改变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阅读/军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8 习近平福建18年执政轨迹
30 宁德岁月：地委大院的旧时光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42 郴州“寻官启事”的背后

观察 Observer

44 大陆经济学研究需要多元化

国际 World

46 曼谷爆炸案尘埃未定

日美部署水下
监听系统剑指中国

虽然冷战期间日美曾在津轻、对马海峡部署过监视苏联潜艇的旧版SOSUS，但提及存在针对中国潜艇的SOSUS尚属首次。

58▼

51 俄“远东梦”且行且艰
54 澳洲政坛再遇“知华派”

军情 Defense

58 日美部署水下监听系统剑指中国
60 俄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情

特别报道 Feature

62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64 陈平原：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
68 袁伟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

财经线 Business

76 最严第三方支付新规将面世
78 大陆地产业进入剧烈调整期
81 财经资讯

图谋天下 Galleries

82 民权之梦——玛格南图片社的见证

历史档案 History

88 铁石部队兴亡录

92 微史记

文化 Arts & Culture

94 袁世凯之问：共和需要多长时间？（上）

98 “大公园丁”许君远

100 刘慈欣：科幻作家须看得比时代更远

三地书 Books

103 历史属于失败者

42

郴州“寻官启事”的背后

政府登报寻找失踪官员，这样的黑色幽默已屡次发生，未来大陆相关部门可能进一步明确“失联”预案。

62▼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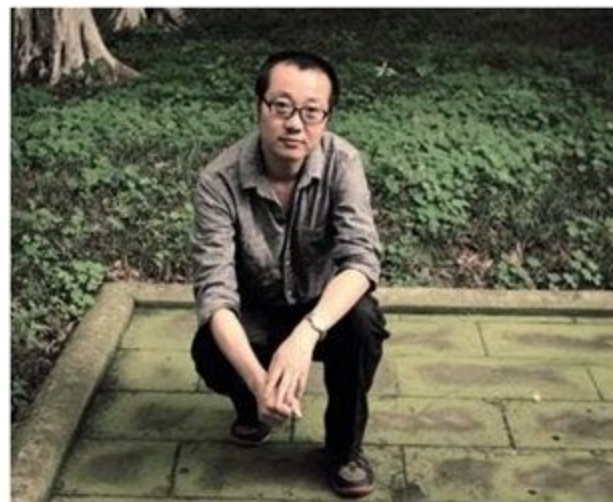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不是一个收获的时代，不应该用今天“典藏”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作品。真正收获的，应该是聪明且勤奋的后来者。



曼谷爆炸案尘埃未定

外媒指出，如果此事确为维吾尔极端主义者所为，则将是已知发生在中国境外的首起维吾尔人实施的恐怖袭击。这一事态的发展或将威胁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的安全。

46▲



专访刘慈欣： 科幻作家须看得比时代更远

刘慈欣今日的成功，是中国科幻百年长跑踢出的“临门一脚”。与天赋和努力同样重要的是把握机遇的能力，时代潮流中的顺势而为，锻造了这位科幻长跑的胜利者。

100▲

广告目录

多媒体 / 封二 周刊征订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北京友谊宾馆 / 1 《凤凰周刊·生活》 / 13 凤凰书 / 17 新媒体 / 43
芬迪 / 57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91





MOMENT

瞬间

匈牙利 2015 / 09 /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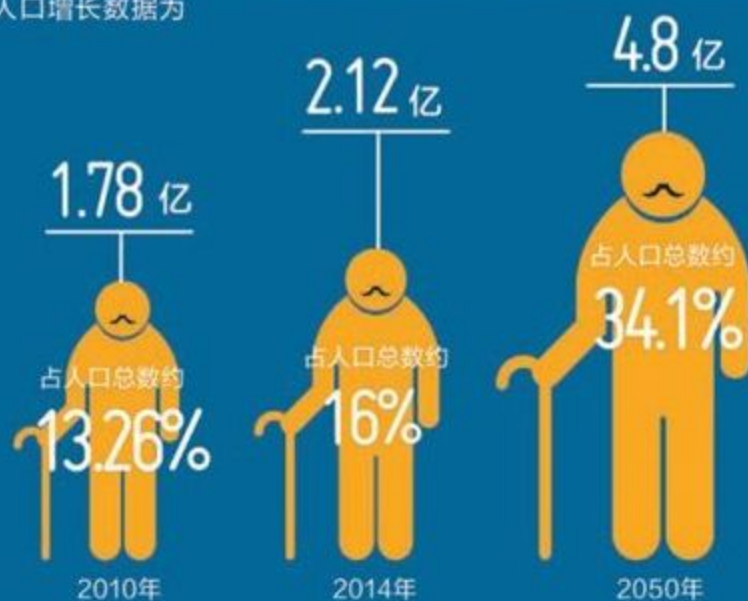
监狱犯人正在参与塞尔维亚边境铁丝网的建设，试图彻底挡回难民潮。许多人权组织公开表示反对，称匈牙利并未受到非法移民的威胁，进入这里的是逃离战火和死亡的难民，而他们需要帮助。



全球老龄生活指数排行 中国位列“中等”

数据来源：《金融时报》9月9日

中国老年人口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人口类别。官方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增长数据为



全球老龄生活指数排行

根据非政府组织国际助老会9月9日公布的2015年“全球老龄生活指数”，中国位列“中等”水平，面临相当大的挑战，但“在制定对老年人友好的政策方面有所进步”。该指数使用13项指标来评估四个方面的生活质量：收入保障、健康、个人能力和有利的环境。



1

《明报》

2015/09/16

美官员：中国希望提前实现减排目标

巴黎气候峰会前夕，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9月15日在香港科技大学表示，中国希望提前5年达到其减少碳排放和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的目标。去年11月中美领导人会面后，中方宣布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消费初始能源的比例提升至大约20%。而在今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中国将提出，到2030年左右将单位GDP碳排放较2005年的水平下降60%至65%。朱棣文透露，北京方面希望能先于既定的时间表，提前完成上述目标。他和中国相关人士私下交谈时，他们说希望能在2025年达到此目标。

2

《华尔街日报》

2015/09/16

OECD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9月16日称，最近几个月，全球经济前景略有减弱且变得更加不确定，因为来自中国的涟漪盖过了美国经济好转带来的正面影响。OECD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6月做出的预期为3.1%；将2016年增长预期从3.8%下调至3.6%。OECD在其最新的经济预测中把中国经济放缓列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并警告称，中国政府面临严峻挑战。OECD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比预期还要弱，可能给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带来严重影响。

中国增长成西方经济 “生命维持系统”

● 英国《卫报》网站 / 2015.09.14

→ 在中国问题上，西方看空的人远多于看多的人。然而，在持续35年的非凡经济增长之后，中国依然保持了7%的年增长率。西方经济评论最大的缺陷在于，都未能考虑到下个季度甚至下个月的结果。反之，中国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走向哪里。

2007年至2008年，当西方经济步履维艰时，中国经济进行了驰援。尽管北京政府采取行动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避免被拖进危机，但他们依然挽救了西方经济。在占中国出口市场半壁江山的西方市场几近崩溃的情况下，中国启动了5860亿美元的大型刺激项目，促进内需，以抵消出口需求的损失。

最黑暗的日子过去后，中国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对美元汇率与2005年相比上涨了25%。中国出口竞争力因而变小了。同时其经常项目盈余也急剧下跌，从2007年的占GDP10.1%跌至去年的2.1%。从2008年以来，美国GDP增长仅为10%多一点，而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约为66%。不过，中国也坦然承认刺激项目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问题：基础设施行业长期过度投资导致债务过量、房地产市场倒挂以及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增加。他们深刻意识到，刺激项目也拖延了最紧迫的经济挑战：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因此，中国发现自己需要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战线战斗：刺激项目带来的严重短期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长期结构性改革。

西方过于关注标题性的GDP数字，而忽视了这些深层结构性改革。从长远来看，关键是中国经济从劳动力密集、投资引领、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高附加值产品和国内消费经济的能力。西方世界依然需要生命维持系统，也就是零利率以及中国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股市会突然开始恐慌。对北京来说，这是担忧，而不是恐慌。相比之下，他们面临的挑战似乎是可控的。（马丁·雅克）

西方经济评论最大的缺陷在于，都未能考虑到下个季度甚至下个月的结果。反之，中国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走向哪里。

→

港不搞三权分立 北京言下何意？

• 《南华早报》，节选 / 2015.09.16

→ 当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9月12日表示“香港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时，他十分清楚，这番言论会触发新的争议。“我今天选了这样一个有争议性的议题，谈了以上可能引起争议的看法，主要是想以实际行动表明一点态度：在宣传推介基本法的过程中，不必回避争议。”张晓明在“基本法颁布二十五周年”研讨会上如是说。他强调，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并形容行政长官处于“行政主导、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中的核心位置。

一如预期，张晓明的发言引来法律界和泛民人士的反对。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如果张晓明的说法被解读为特首凌驾三权之上，将深表遗憾。

是什么促使张晓明发表上述言论呢？学者们相信，北京认为

一些香港人误解了基本法，误解了中央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中央试图对此予以澄清，而张晓明的发言是为了帮助中央澄清。这也被视为自去年国务院颁布“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以来，北京所坚持的主要对港政策思路的一部分。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最近几年，北京意识到，部分香港人误解了‘一国两制’，以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权力只限于国防和外交。本土主义在香港的崛起进一步刺激中央政府的神经，当局担心，部分香港人希望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北京现在严肃应对，尝试尽力在公共舆论中收复失地。”

8月26日，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在香港与民主党的核心成员会面，但其后张晓明迅即发表这番言论，显示北京与温和民主



派沟通的同时，不会容忍对它权威的挑战。

张晓明并非第一个强调特首地位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的人。基本法内地草委萧蔚云在其2003年出版的《论香港基本法》中写道，“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法律地位在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上。”书中也提到，《基本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不是三权分立，虽然香港的政治架构中存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相互制衡，其与三权分立是不同的，香港实施的是行

政长官领导下的政治体制。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饶戈平指出：“三权分立只适用于主权国家，香港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完全的三权分立会削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1987年明确反对。”但他也说，香港不实行三权分立，并不意味着三个机关之间没有相互制衡。

《基本法》中没有“行政主导体制”或“三权分立”这样的字眼，但内地官员和学者都认为，行政主导渗透在《基本法》的多项条文中。

香港去年销毁1.2吨象牙

• 《星岛日报》，2015.09.16

→ 香港去年销毁缴获的1.2吨象牙，受到媒体关注。内地此前也在媒体和外交人员见证下销毁了6吨市值高达1200万美元的象牙和象牙制品。这反映内地与香港两地在打击非法象牙买卖方面立场一致。

香港去年销毁象牙的行动可说是象征意义多于一切，因为当时还有30多吨象牙未被销毁。环保人士一直以来积极提倡保护非洲象，并要求打击无视国际象牙贸易禁令但又逍遥法外的捕猎者和商人。香港的销毁象牙

行动令环保人士感到欣慰。象牙制品是智慧、高贵和富有的象征，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仍然被视为身份象征，所以中国当局禁止象牙进口的做法看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令人安慰的是，渔护署已开始检查所有授权储存象牙的场所目前的象牙库存，并抽查象牙贸易商和手工艺店，同时也在观望国外碳测技术的成效。如香港要摆脱象牙分销及采购中心的污名，当局就必须以有效的法例打击非法象牙贸易。

台捣毁亿元诈骗案 八人被捕

• 《联合报》，2015.09.16

→ 台湾发生特大诈骗案，不法分子以低价购买关键词广告、高价转售给厂商从中赚取巨大差价作为诱饵，骗取受害人25亿元新台币。士林地检署指挥台北市调处指出，当局共逮捕了8名嫌犯，并在9月14日晚释放了当中7人；至于主要嫌犯邹志伟仍被羁押。有网民声称邹志伟曾在脸书上载多张名表、名贵跑车和大量现金的照片。

涉及此次诈骗案的公司“OurPPC”声称创立于2008年，总部设在美国。该公司号称拥有谷

歌、雅虎、bing、亚马逊和百度等网站广告点击代理权，可垄断关键词广告市场。该公司声称能以低价购买关键词，再高价卖给广告商，从中赚取差价，投资回报率高达10%至38%；高额回报率吸引了约2400个受害人投资。不过，调查结果显示这家公司并不存在。此外，为了营造投资获取丰厚利润的假象，该公司除了举办活动表扬获利百万的成员外，还安排投资人到澳门旅游；凡投资1万美元的成员可获得一个免费名额，而参加该次旅游的人数高达2400人。



难民危机与政治秩序

●《联合早报》/2015.09.15

→ 欧洲国家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难民来自中东国家，源源不断，不仅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很多因素更会导致危机的恶化。德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出于人道主义，开始接受相当规模的难民，很多国家担心这种做法会“鼓励”更多的难民涌入。迄今为止，世界的焦点在于欧洲国家如何应付危机，很少有人去探究危机的起源。从一个侧面看，难民危机是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秩序危机和外部国际秩序危机交互影响的产物。

中东国家的危机首先是内部政治秩序危机。尽管中东国家一直在寻找比较能够符合其宗教文化需求的政体形式，但似乎没有能够为国内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而稳定下来。如果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是以欧洲产生的近代世俗主权国家为标本，中东穆斯林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顺利适应这种世俗化为导向的政治变化。即使那些变得比较世俗化的国家，也是出于应对强势的西方国家的需要。就是说，政治变化的动力在

于回应外部环境变迁，而不是出于内部的变革动力。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东国家与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从形式而言也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但在实际层面，中东地区对西方式主权国家的认同是具有问题的，不同力量一旦有机会，总会尝试建立基于宗教之上的“真正”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伊斯兰国”就是例子。

内部的宗教派系纠纷、部落争斗、对现代化的不适等因素，使得中东国家充满“内忧”，而包括国家之间宗教冲突，对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不适等因素，也同样为这些国家制造很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就中东地区来说，主权国家秩序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波是欧洲殖民主义期间，法国和英国等对中东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波是冷战期间的美国苏联对峙局面；第三波是后冷战秩序的“去主权化”。

但在后冷战时代，对中东局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大

中东民主计划”。“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使萨达姆成为阶下囚，而且促使一向与美唱反调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主动放弃核发展计划。美国还进一步筹划中东的总体政治变革，提出一项在中东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大中东民主计划”使用了广义上的中东地区定义，除了阿盟22个成员国之外，还将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纳入其中。该计划触及到所有中东国家的切身利益，如果这项政治改革方案得以实施，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地位将受到威胁。一直以来，中东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实行世袭制，虽然不合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但传统上被老百姓接受。

美国这样做，除了实际的地缘政治需要，也是其文化扩张的需要。和穆斯林文化一样，西方的宗教文化同样具有扩张性。只不过，该计划很快走向了反面。无论通过军事手段推翻政权的国家，还是通过“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推翻政权的国家，原来政权解体后所出现的并非是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政权和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一些国家演变成失败国家，

迄今为止，世界的焦点在于欧洲国家如何应付危机，很少有人去探究危机的起源。从一个侧面看，难民危机是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秩序危机和外部国际秩序危机交互影响的产物。

一些国家处于失败国家边缘，更多的国家政权失去了统治能力，不能保障基本的社会秩序。

今天，整个中东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无政府状态为类似“伊斯兰国”这种极端宗教组织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机会。在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过程中，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美国因为地缘位置避免了难民潮，但和中东连接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么幸运，只能承担难民潮的后果。

中东已经乱了，亚洲会怎么样呢？尽管程度不同，亚洲也面临类似问题。朝鲜、缅甸等国家一直出现不同规模的难民潮。亚洲国家的问题在于，国家之间对区域秩序和外部势力的影响共识不够。中东很多国家尽管不认同美国在欧洲，但因为没有共识，很容易被美国和西方所分化。现在这个趋势在亚洲也同样存在，并且越来越明显。如果亚洲内部政治变革失控，例如人们一直担心的朝鲜政权解体，或者缅甸等国家的民主激进化，各种矛盾（宗教、民族、宗族等）很快会浮上台面，无政府必然导致难民潮。如何避免类似中东的悲剧重演，是所有亚洲国家需要认真思考的。

（郑永年）

中国清理“僵尸国企” 打造一流跨国公司

● 综合外媒报道 / 2015.09.15,16

→ 中国政府9月13日公布了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蓝图——《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向国有部门引入私人资本,整改“僵尸企业”。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处于破产边缘、长期需要国家资金扶持的企业。彭博社表示,改革将触及数万家这样的企业,还会涉及监管大型国企运作的国务院国资委。中方认为,国企改革将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平均每年提高至少0.33%。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夫·霍雷什认为,宣布进行改革的时间是有讲究的——

此前对中国是否会进行经济改革的怀疑情绪正在增加。

西班牙《国家报》称,《指导意见》更像一份意向宣言,而不是具体的措施清单。中国官员表示,改革是为了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提高国企的竞争力,政府仍保持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但其没有具体表示哪些企业将被私有化。

改革涉及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在一些非战略领域,外资也有机会进入。现在相继出现有关铁路、海运等行业的重组与合并计划。此前中国南车与北车合并,诞生了全球铁路装备制造业巨头中车集团。而两大海运公司中国远洋

运输集团和中国海运集团也开始探讨经营整合问题。上述举措是为了避免国内竞争导致的消耗战,而举全国之力与海外竞争。在钢铁、电信等领域,合并举措也在加快。

“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俄罗斯科学院专家弗拉基米尔·涅韦金称:“目前中国国企的管理达不到西方大型企业的水平。虽然国企能倚仗低息贷款轻而易举地采购新设备,但并不能有效运用它们,管理层实际上对业绩不承担最终责任。”

中国宣称,到2020年,将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虽然目标并不是很极端,但也要慎之又慎。

鉴于国企在国家经济和就业中的重要地位,改革中的一个失误就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上的严重后果。这种重要性使国企变成了庞大的院外活动集团,随时会利用同权力阶层的密切联系去反对任何可能会削弱其影响力的改革。

在国企改革蓝图中,中国政府称,对国企资本结构的改变将循序渐进,不设时间表。《南华早报》引述专家的话说,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惨痛教训始终影响着改革,令人担心国有资产通过贪污腐败渐渐流失。此前一些官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甚至把国有资产免费送人,在90年代造成了巨大损失。

韩企应调整在华战略

● 《朝鲜日报》/ 2015.09.15

→ 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于去年9月成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创下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新记录。去年11月股价飙升至120美元,接近发行价68美元的2倍。可是到今年8月末,其股价已跌至IPO之后最低点60.91美元,市值蒸发1407亿美元。阿里巴巴总销售额的83%是在中国国内,股价暴跌原因正是中国内需市场的低迷。今年第二季度,阿里巴巴的销售增长率跌至三年来最低。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以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接连遭遇业绩下滑。不仅是私营企业,连垄断着能源、通讯、钢铁等领域的国有企业也同样面临经营困难。专家

指出,需要密切关注中国实体经济的变化及其影响。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韩国企业想要生存就需要对中国的业务进行战略上的调整。

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夏季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开幕演讲中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这并不是空话。”但李克强的发言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回到高速增长时代。金融研究院博士迟万秀(音)表示:“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意味着年增长率降至4%-5%,李克强的发言可以被理解为中国能够维持6%-7%的中速增长。”

对于最近中国经济走向问题,大韩商工会议所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在进口、消费、投资以及金融等四个领域同时遭遇难关。

第一个是进口增速放缓。随着中国开始培养消费品和配件产业,减少从韩国进口半成品的



可能性增加;第二个是中国消费市场从汽车到家电和服装全方位陷入低迷;第三,曾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也在急剧减少,投资增长率从2013年第三季度的20.2%降低至今年第二季度的11.4%;最后一个危险因素是,中国金融企业为了应对经济低迷开始减少现金流,而在华的韩国企业也面临着资金回收的困难。

专家指出,韩国企业需要重新调整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其不

应只注重出口半成品,而应该将目光放在高端成品行业和服务业。比如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正以每年300%的速度增长,韩国企业可以考虑以电动汽车市场为目标对中国有潜力的电动汽车公司进行投资。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表示:“不要试图直接挑战中国,而应该搭顺风车。韩国更应该考虑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做些什么,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出口半成品。”(安勇炫 金起弘)

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越俄罗斯

● 俄罗斯连塔网，节选 / 2015.09.15

→ 2015年，俄罗斯平均月工资约为3.3万卢布（人民币约3200元），比去年明显降低。但更引人注目的观察结果是，俄罗斯人收入历史上首次少于中国人，而这个国家是人尽皆知的“劳动力源泉”。

最近一年卢布对美元汇率暴跌致使俄罗斯工资急剧缩水。2014年初，俄罗斯人均月收入为900美元。2015年中期，其工资约为3.3万卢布，以65卢布兑1美元的中间汇率换算，这大致相当于500美元。卢布可能走高，届时俄罗斯人以美元计价的工资将重新增长。但即便如此，它也未必能赶上中国。在俄罗斯人的既定观念里，中国人劳作不过是“挣一碗米饭”。

十年前，月薪300美元在中国即便不算丰厚，也属正常。如今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近150%，去年增加了12%。这一情况常常被经济学家看作是明显减慢中国发展速度的原因，毕竟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廉价劳动力保障的。但实际上，中国工资的上涨既是与经济增速，也是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适应的。2005-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9%。同时，这十年来，该国生产率每年扩大近18%。

作为对比，2003-2008年，俄罗斯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7%-7.5%。危机后，增速显著放慢，到2013年降至1.8%。其结果是，工资增速也放缓了，最近一年半，工资比整个经济滑坡得还要厉害。雇主认为，最好通过节约人力成本来削减开支。

当然，较小的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是对俄有利的一面。表征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是47，在俄罗斯为42，但这一数据考虑了所有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资。此外，这一落差没有大到可以弥补两国如今以美元计价的工资差距。

俄罗斯在劳动生产率增速上



落后很好解释。生产率主要依靠技术和设备，但俄罗斯企业对产业升级和服务行业的投资进展缓慢——只需看看工业机器人市场最近的数据即可：中国在全球机器人市场的采购中占据近三分之一的份额，俄罗斯的采购量仅占1%，低于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产业升级费用高昂，如今由于制裁，投资总体上将会是问题。投资占俄GDP的比例为20%多一点，而中国的这一比例达到45%。其次，俄罗斯没有正常的产业升级融资机制，如减轻专项税负。第三，俄罗

斯拥有大量来自独联体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对他们的使用要比产业升级划算得多。最后，产业升级必将减少就业岗位，而失业率上升肯定会使俄失去长期以来精心维持的稳定。这种局面完全不是政府需要的，因此它不太鼓励企业朝这个方向努力。

无论如何，低工资既是问题也是机遇，这意味着过去设在其他国家的生产部门可能迁至俄罗斯，从而推动俄经济增长。当然，这也意味着国家将沿“第三世界”国家惯常的道路发展，但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网店在中国遍地开花 缓解农村贫困问题

● 德国《时代》周报 / 2015.09.14

→ 中国经济近年来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除了军事技术之外，中国人几乎可以生产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但是中国人缺乏创新和自己的发明创造。第二个问题是：不管中国沿海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多么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仍旧十分严重。在宽阔的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网之外，很多人仍然依靠国家过去分给他的小块

土地生活。他们大多就业不足。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得到缓解：这多亏了网络经济。

淘宝肯定是最著名的例子。这个交易平台已经促使中国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村家庭成员加入到网络经济当中。他们通过自己的淘宝店铺直接向顾客供应自己的农产品以及手工业产品。有的农民干脆提供自己的库房给网络交易商做仓库，这给他们带来租金收入。不久前，分享经济也在中

旺起来。分享是指交易（特别是服务）在用户之间直接进行，并不通过中间商。网络平台的运营者大多只收取很少的费用。在西方，提供租车服务的优步公司和房屋租赁中介空中食宿网站这两个美国公司是分享经济的代表。

在中国，此类平台主要在农村落地开花。例如，一位企业家两年前在东北辽宁省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该地区的小企业主只需付很少的中介费就可以租赁他们的设备。在其网站注册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个，每月使用该服务的也达几千人。

然而，究竟是什么令中国的

网络经济如此特别？美国的网络供应商（谷歌、脸书、推特、优步、空中食宿）早已遍布全球多国，而中国人几乎一直在建立自己的对应产物。或许出于市场保护和国家审查的原因，它有利于本土服务商的产生。但它们绝对不仅仅是美国供应商的粗糙翻版，它们当中的很多趣味性更强，功能更多，或者是提供美国根本没有的服务。例如两年前作为出租车程序成立的“滴滴打车”，如今不仅介绍出租车服务，也介绍私人驾驶或者是合伙打车服务。据称，超过1000万中国人每天使用该项服务。

美国撤销对华裔超导专家的间谍指控

•《纽约时报》，节选 / 2015.09.13

→ 今年春天，当美国司法部逮捕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并指控他向中国透露敏感的美国技术时，检方似乎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这位名为郝小星的教授发给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精密设备设计图。检方称，设计图泄露了一种设备的设计。该设备称作袋形加热器，用于超导体研究。郝小星早前签署过一项协议，承诺对设计保密。但几个月后，独立专家发现，司法部这起案件的核心证据有问题：那些设计图不是袋形加热器。此时距联邦探员将郝小星铐走已经过去了很多时间。

9月11日下午，面对知名科学家的宣誓证词，司法部撤销了针对郝小星的所有指控。这相当于尴尬地承认，在指控郝小星之前，对于在这起案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相关科学知识，检方和联邦调查局探员并不了解，也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去调查。相关指控损害了郝小星的事业，并给人留下了他是在为中国充当间谍的印象。

“我没指望他们能懂我做的所有事情，”57岁的郝小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但他们不咨询专家就指控我，让我的家人经历所有这一切，损坏我的名誉，他们不该这么做。这不是开玩笑，不是

儿戏。”

美国面临着试图窃取政府和企业机密的外部黑客，以及内部员工的冲击。奥巴马总统的打击战略包括，对谍报活动大力开展调查和起诉，并增强网络防御。但郝小星一案使人们怀疑，司法部在急匆匆地寻找中国间谍时，是否导致有中国血统的无辜美国公民被冤枉。

不管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郝小星一案涉及的专业知识都很复杂，它涉及的过程是给一种物质覆盖一层非常薄的膜。郝小星的代理律师彼得·蔡登博格称，尽管很复杂，但在提起诉讼前，政府似

乎从未咨询过专家，所以检方才误解了证据。蔡登博格说，在郝小星一案中，当局看到了写给中国科学家的电子邮件，就做出了最坏的假设。“如果他是加拿大裔美国人或者法裔美国人，又或者他来自英国，这件事还会被政府注意到吗？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这件事受到了当今政局的影响，”郝小星说，“但我认为这样做是错的。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们为这个国家的安全和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天普大学令其行政休假，并撤销了他物理系主任的头衔。他说这还导致其无法继续一项当时已接近尾声的长期研究。讲述这场令家人苦不堪言的磨难时，郝小星强忍住了泪水。“我才刚刚走出了这场噩梦，”他说。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阅《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

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南非发现新古人种化石

•《金融时报》，节选 / 2015.09.11

→ 在南非的一个岩洞深处，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埋葬着原始人类骸骨的墓穴，这种原始人类是此前科学家不知道的。这种原始人类似乎在很多年里一直将逝者的遗体放置在那里——这是科学家首次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以外的人种观察到这样的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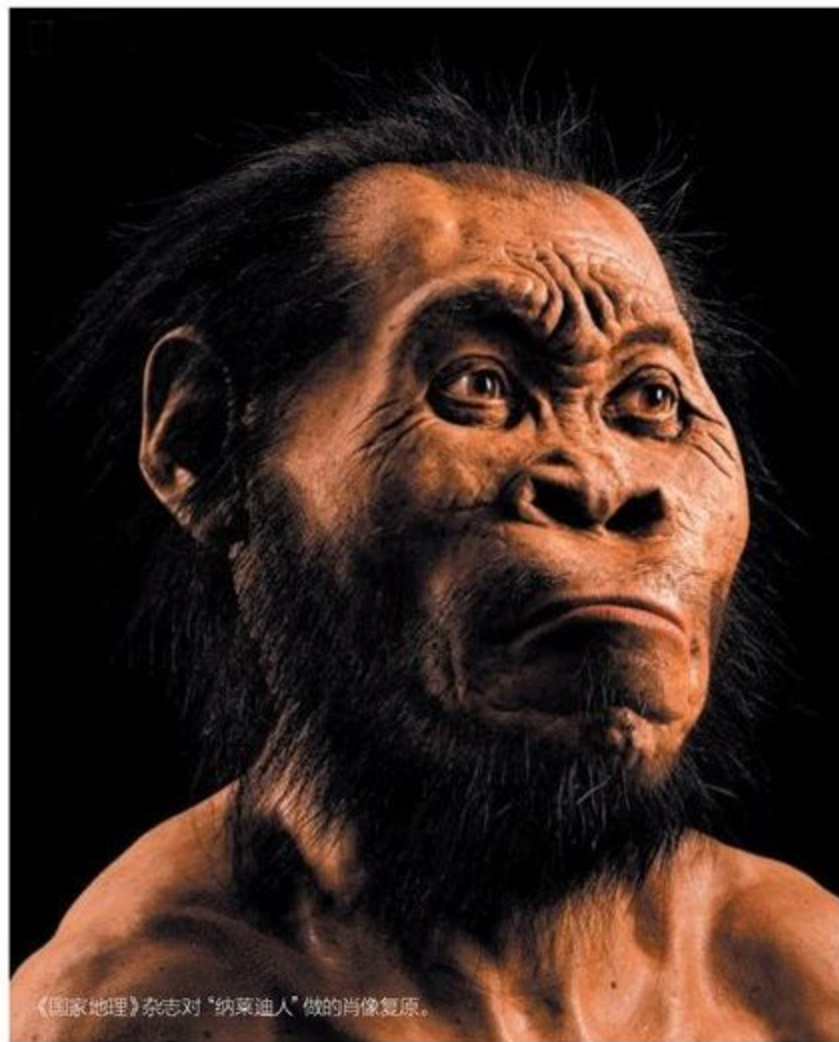
这种新人种被称为“纳莱迪人”，研究者在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和在英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种新人种的发现。这些化石不寻常地混合了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的特征，相关细节发布在《eLife》期刊和《国家地理》杂志上。2013年初次发现后，由60名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团队一直在致力于表征从距离约翰内斯堡50公里的“新星洞”发掘出的15具骸骨。

“鉴于遗骨中几乎每一块骨

头都出现多次，纳莱迪人实际上已经是人类世系中得到最完整了解的化石成员，”项目负责人李伯杰教授表示。该人种根据其发现地命名：“纳莱迪”在当地的塞索托语中意为星星。

然而，现在还有很多未解之谜。首先是化石的年代，通常使用的地质年代测定法还未给出结果，这意味着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纳莱迪人可能生活在远至250万年前，或者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他们生活在数万年前。

“纳莱迪人在某些方面和现代人类很像，如手、手腕和脚的形状，”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起源研究主管克里斯斯特林格表示，“另一方面，纳莱迪人较小的脑部（仅为现在成年人脑部大小的三分之一）和上身的形状让人更多想起前人类和非常早期的人种，如生活在超过150万



《国家地理》杂志对“纳莱迪人”做的肖像复原。

年前的能人。”

“根据这些特征，纳莱迪人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种之

一，或者是一种保留了许多人类更早期进化阶段特征的人种，”他补充。（克莱夫·库克森）

全球气温升高速度将加快

•英国《独立报》网站 / 2015.09.14

→ 英国气象局认为，全球变暖速度放缓的态势很可能在两年内结束，地球气候系统正在经历极端变化，今明两年气温可能创下新高。这一发现可能推翻气候怀疑论者的说法。

英国气象局的这份报告——《气候系统正在发生大变化？》共20页，着重指出当前在地区范围内影响降水和气温的主要天气模式的变化。该报告称，以太平洋热带地区为中心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正“愈演愈

烈”，而且势将成为有记录以来强度数一数二的厄尔尼诺现象。1982年和1997年的冬季也出现过“强厄尔尼诺”。英国气象局称，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亚洲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北非南部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发生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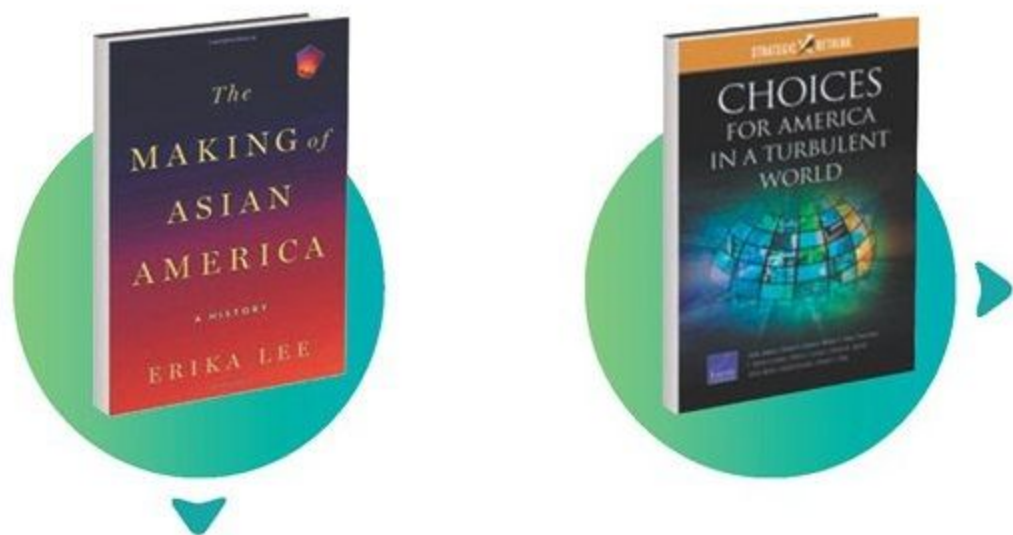
英国气象局的研究估计，地球可能进入一个世纪以来强度数一数二的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指的是气候系统发生变化，使太平洋海水变暖从而推高全球气温。英国气象局预计，此次厄

尔尼诺事件的强度不亚于1997-1998年。当时，厄尔尼诺事件曾引发南美的致命泥石流、东南亚的严重干旱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极端天气。

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三年破纪录——全球平均气温2014年创新高，预计今年还会上升。同时，气温升高的速度可能将进入加速期，加速水平与全球变暖速度放缓前类似。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的亚当·斯凯夫教授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很可能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纪录。未来一两年内，全球的十年变暖速度将达到20世纪末的水平。”

斯凯夫认为，过去15年的“降温”期中，太平洋拉低了全球平均气温，不过目前的迹象表明，地球又一次进入“变暖”期。他表示，千百年来，这种气象模式的自然变化时有发生，但是鉴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断增加，这些变化对气温的影响变得更加深远。

该报告称，未来几年全球气温升高的速度也将加快，终结十多年来全球变暖速度看似放缓的势头。一些怀疑论者曾抓住这一全球变暖“暂停”的机会，宣称驱动气候变化更多的是自然循环而不是人类活动。然而，一些科研人员认为全球变暖的趋势并没有显著放缓，而是计算有误。



在美国历史中沉浮的“亚裔美国人”

●《纽约时报》，节选 / 2015.09.09

→ 李漪莲的《亚裔美国人的故事》是一本内容详尽的著作。她认为亚裔美国人不断在被标注为“好亚洲人”和“坏亚洲人”之间循环，这取决于移民与定居背后，不断变化而且通常是自相矛盾的政治。

当19世纪到20世纪初亚洲移民威胁到白人劳工时，我们是“被人看不起的少数族裔”。然而到了冷战期间，我们又被描述为“模范少数族裔”，以便稳定美国学术界精英的信心。这种标签变换的随意性显示出我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我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功能：廉价劳工、反共斗士乃至令其他人相形见绌的超级优秀学生。李漪莲认为，亚裔美国人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不仅重新定义了移民政治与种族类别，也重新定义了“身为美国人的真正本质”。

李漪莲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她撰写的这部综合史追溯了多个亚裔美国社区的经历，从19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劳工，到20世纪80年代明尼

苏达州的苗族难民。这本书没有激进之处，只是拓宽了视界，进一步提供了实用且重要的信息。

“穿越边界与边界执法”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这一章里她深入研究了数万中国人与日本人如何千方百计以违法的方式移民美国。这些故事鲜为人知，但却极为重要。在李漪莲看来，《1882年排华法案》标志着“排外主义时代”的开始，勇敢的移民会藏在火车车厢里，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或是躲在船里，从古巴和牙买加进入美国。运送亚洲人进入美国成了涉及不同种族、利润丰厚的买卖，不少希腊人、意大利人都参与进来，还有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和墨西哥蛇头。李漪莲引用1904年巴法罗城报纸上的故事，一个加拿大边境上的蛇头经常把中国人伪装成印第安人，“给他们穿上‘印第安服装’，让他们拿着装满树皮的篮子”。

李漪莲指出，第一代移民在美国遭到排斥的同时，亚洲人成了第一批无正式文件的移民；当

时美国国内恐慌很多，首当其冲的是所谓的非法移民，亚洲人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20世纪不断增长的国际压力扭转了这股趋势。先是二战期间，需要让中国在战争中对抗日军；其后，“冷战”以及朝鲜和东南亚之间的“热战”造成各种全新的亚洲盟友与敌人。加上民权运动的影响，最终转折点随着《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通过而到来。李漪莲指出，1965年的法案“在美国社会乃至各个领域内实现种族重组”，从而“改变了亚裔美国人与美国历史的进程”。

李漪莲强调外部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作用，由于这些力量，亚洲人有时被欢迎，有时被排挤；有时被接纳，有时被驱逐。这些是合情合理、有必要的方式，可以解释亚裔美国人作为种族与民族社区是如何形成的。当这些历史与1965年之后的现实发生接触，我就想知道更多关于“亚裔美国性”方面的东西，即我们在社区内部如何定义自己的位置、价值、身份与文化。“亚裔美国人”与“亚裔美国性”都在不断重新形成，不断为历史学家们造成各种新问题，供他们在不确定的未来某时进行研究。(OLIVER WANG)

美国面临一系列广泛挑战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 / 2015.09.08

→ 《美国在混乱世界中的选择》一书是兰德公司为美国在这个快速变化世界实施外交政策而探讨全国性战略因素的系列书籍中的第一本。在这里，其列出了下一届美国政府在全球和三个关键地区面临的重大选择，包括美国政府在管理世界经济、国家防御、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处理网络空间的冲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选择；美国政府在欧洲、中东和东亚面临的选择；以及可以告知并引导这些选择的、广泛的战略指导方针。

如今的美国没有面临任何现存威胁，而是面临一系列广泛挑战。“基地”组织产生了更多分支机构，这些效仿者比“基地”组织本身更强大、更激进。气候变化加剧，与气候有关的灾难预测变得更可怕、更迫近、更可信。网络空间的崛起成为秩序与混乱势力之间的新战场。旅游地域的扩大使得埃博拉之类新流行病变得更危险。过去几年的经历提醒我们：稳定并不是国际环境的自然状态，和平并不能使自身永久存在，整个地区都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继续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也应在秩序不存在的领域（比如网络 and 气候管理）推动新标准的开发。国家在任何此类系统中都是最重要的基础。挑战来自打破这些规则的强大国家，以及无法实施这些规则的弱小国家。国家的能力需要与个人及团体的破坏能力同步增长。美国需要一方面维护现存机构及标准，一方面对这样的积极议程作出贡献，并致力于提供必要的资源。

朝鲜欲在10月发射长程火箭

● BBC 中文网，节选 / 2015.09.15

→ 朝鲜在9月15日接连暗示，可能于劳动党创党日的10月10日发射长程火箭，而宁边的所有核子设施已恢复运转。韩国政府响应称，目前并未观察到有异象，但朝方若执意有所行动，并不会为自己带来好处。

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长与原子力研究院院长9月15日先后接受朝中社采访表示：“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国家宇宙开发局正赶工着，让新的地球观测卫星开发进入收尾阶段。在党中央决定时间与场所后，世界将能清楚看到先军朝鲜的卫星冲破大地，并持续飞往青空高处。”

朝中社的报道还提到，包括浓缩铀工厂等位在宁边的所有核子设施以及5兆瓦的黑铅减速炉（即石墨反应炉）的用途，都已调整变更与重新整备，开始正常启动。前述两位研发机构代表的姓名并未被公开，但两人的发言被认为是朝方将于近日发射长程火箭与开启核试验的暗示。

朝鲜上次使用“核雷声响”一



词是在2013年2月进行第3次核试验后，而上次发射长程火箭（通讯卫星）则在2012年。韩国北韩大学大学院教授梁茂进向韩联社表示：“以朝鲜过往发射人工卫星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是在纪念日前发射。这次要发射有可能选在10月5日前后；若是这样，就能让世人将目光都集中在10月10日。”

2009年分别搭载光明星2号和3号卫星的银河2号及3号卫星的发射选在金日成逝世纪念日前；2012年搭载光明星3号、2号机组的银河3号卫星，则于金正日逝世周年前发射。今年8月下旬，韩朝非武装地带（DMZ）发生两名韩国军人遭地雷炸伤事故，双方为此交互指责，直到25日展开谈判后

才达成共识并解除紧张局面。

双方红十字会代表于9月7日至8日间协商展开韩朝离散家属见面事宜。当时韩方代表在会上表示，希望将家属会晤时间订在10月上旬，为的是遏止朝方选在10月10日前后“有所行动”，但朝方代表以“尚有活动要举行”为由拒绝。

由于中美两国将于9月25日举行首脑会谈，紧接着还有10月16日预定举行的美韩首脑会谈，朝鲜的行动除了能在国内“树立军威”，也被认为是在释放讯息、要求美国改变向来对朝鲜的敌视政策。朝鲜若坚持发射卫星或展开新一轮核试验，将被韩方视为安全威胁；不过目前也无法排除朝鲜有延迟或更动发射日程的可能性。韩国外交部对此警告称，朝鲜发射弹道飞弹属于重大挑衅与军事威胁，明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任何使用弹道飞弹技术行为”的决议。

中国方面则透过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响应：“朝鲜作为主权国家，有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权利。但这项权利目前仍受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限制，应该被确实履行。”他还表示，希望有关国家“谨慎行动”，勿做出造成东北亚地区紧张之行径。

中国拟向埃及出售潜艇

● 德新社 / 2015.09.16

→ 中国军火出口一贯以性价比高著称，特别是随着中国军工水平的快速提高，中国军事装备的质量不断增强，甚至可以与西方的高端军事装备竞争。一位来自埃及军方的消息人士日前透露，中国正试图向埃及出售两艘潜艇，中国的潜艇价格低于德国潜艇。

中国在传统的亚洲客户市场之外寻求扩大军火出口，该消息人士说，北京通过在亚洲提供有吸引力的出口贷款优惠在同西方潜艇制造商竞争中取得优势。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达成了潜艇购买合同。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3月公布，中国已

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不过出口中的70%是给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提出向开罗出售潜艇，埃及正在进行研究，但作出决定并不容易。熟悉此事的业界人士说，埃及2011年曾向德国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TKMS）订购了两艘潜艇，目前还希望购买另外两艘潜艇。

那两艘德国潜艇预计将在2017年交货。上述消息人士说，

目前TKMS正和埃及就购买另外两艘潜艇进行谈判，北京则建议埃及可考虑购买中国价格更低廉的新型潜艇。不过该消息人士并不清楚中国建议的潜艇类型以及具体的价格条件。据悉，中国的潜艇由武昌造船厂制造。武昌造船厂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造船企业，隶属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武昌造船厂曾进行过宋级潜艇的研制，1999年5月首艇正式交付海军使用。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习近平 福建18年 执政轨迹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17年零5个月，是其“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从特区厦门到“后排老九”宁德，再至省会福州和省委省政府，从副厅级成长为正部级的官员，始终一步一个脚印稳步迈进。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厚实的执政经验，其理念和思维日臻成熟。

记者/钟坚

从1985年6月，32岁生日那天，习近平到福建任厦门市副市长，到2002年10月，辞去福建省省长一职，50岁的习近平以正部级身份只身赴浙江，习在福建整整工作17年零5个月，他恋爱、结婚、生女，都在这里，按他的说法，“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

青年时期的习近平在福建真正成为主政一方的大员，他的很多学识、理念和人生信仰、价值观都得以充分的实践。2010年以后，已身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习近平在首次回福建时，多次跟友人说，福建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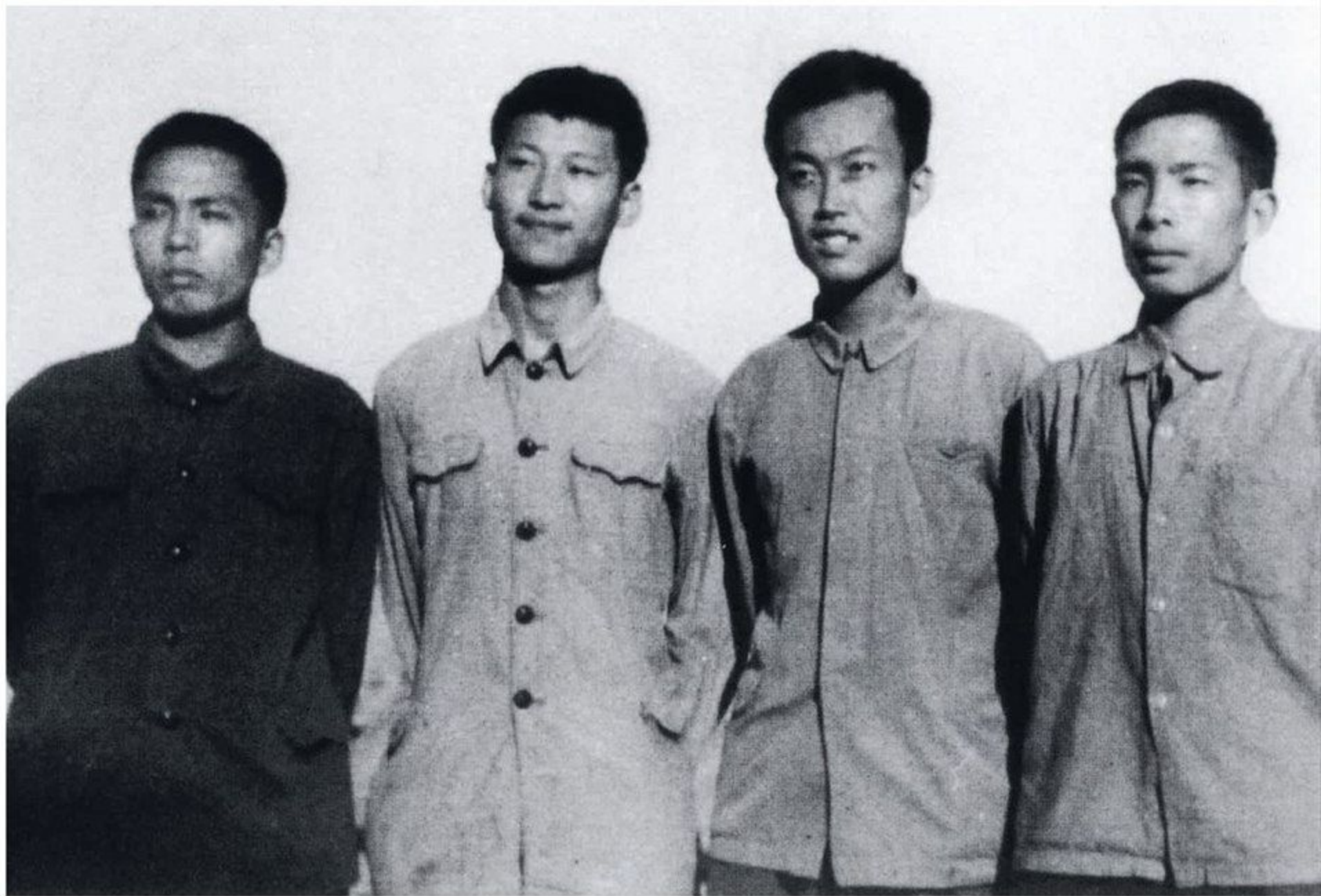
福建省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室主任江典辉评论说，从一个副厅级成长为一个正部级的官员，应该是习人生经验积累最为重要的阶段。“习的每一步都很踏实。比如他从60分到70分，慢慢地发展，不像有些人今天60分，突然升为80分，到明天掉下去又是60分。他就是70分、71分、72分，一步一步往上走。他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

从下放知青到军委办公厅秘书，从军队大机关到

➔
1989年12月2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下乡调研时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







↑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陕西延川县。

基层的河北正定，从内陆正定小县到开放特区厦门，习近平的人生经历多个起承转合。此后习稳步起锚，逐步达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

“跑男”下基层

厦门特区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第一站，也是他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习近平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接受《厦门日报》采访，他说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在厦门工作的3年，感受很深、获益很大，对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在厦门工作期间，他牵头研究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的郑金沐回忆，当时厦门市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时间，这一发展战略才得以制定完成。

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当时评价：“这个发展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习近平跑遍了辖区内所有村。在厦门亦复如是。

1986年4月7日，习近平到厦门最边远、

最贫困的老区山区村——莲花镇白交祠村和军营村，考察边远农村生产发展和民生保障工作。当年军营村的村主任高泉国还清晰地记得习近平考察时轻车简从，步行三四百米后才从村口走到村里。到了村部后，习近平还没坐一会儿就急切地走到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

在厦门特区呼吸了三年改革开放的空气后，习近平1988年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不同福建的厦门、三明，宁德位于闽东地区，是当时福建最为偏僻落后穷困的地区，别的地方都已上市了，它还叫行署。但对从陕西老区来的习近平来说，到革命老区的宁德当地委书记，反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到宁德第一个月，习近平轻装简从，带



1972年，插队回京探亲时的习近平。



1977年，读大学时的习近平（右）。

着自己的秘书下去调研，第一站即是古田县（此古田非古田会议的古田镇）；第二个月，习还是调研，基本是2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

3个月，习近平走遍了9个县。之后他到浙江任职，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在上海仅7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19个区县；到中央工作后，他的足迹则遍及大陆31个省区市。用当下的流行词说，就是标准“跑男”一枚。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讲：“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习尤擅访贫问苦，闽东9个县中最偏远的是寿宁县。该县下党乡刚成立，公路、电话都不通，人家告诉他，来回步行要走七八个小时。习说那我一定要去一下。那时，乡里干部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每人都自己带个炖罐，咸菜萝卜随便吃点。习近平就自带干粮，带了几个人徒步走到下党乡。后来，在他的关照下，通往下党的公路很快修通了。

离开福建20余年后，去年3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即兴提及了这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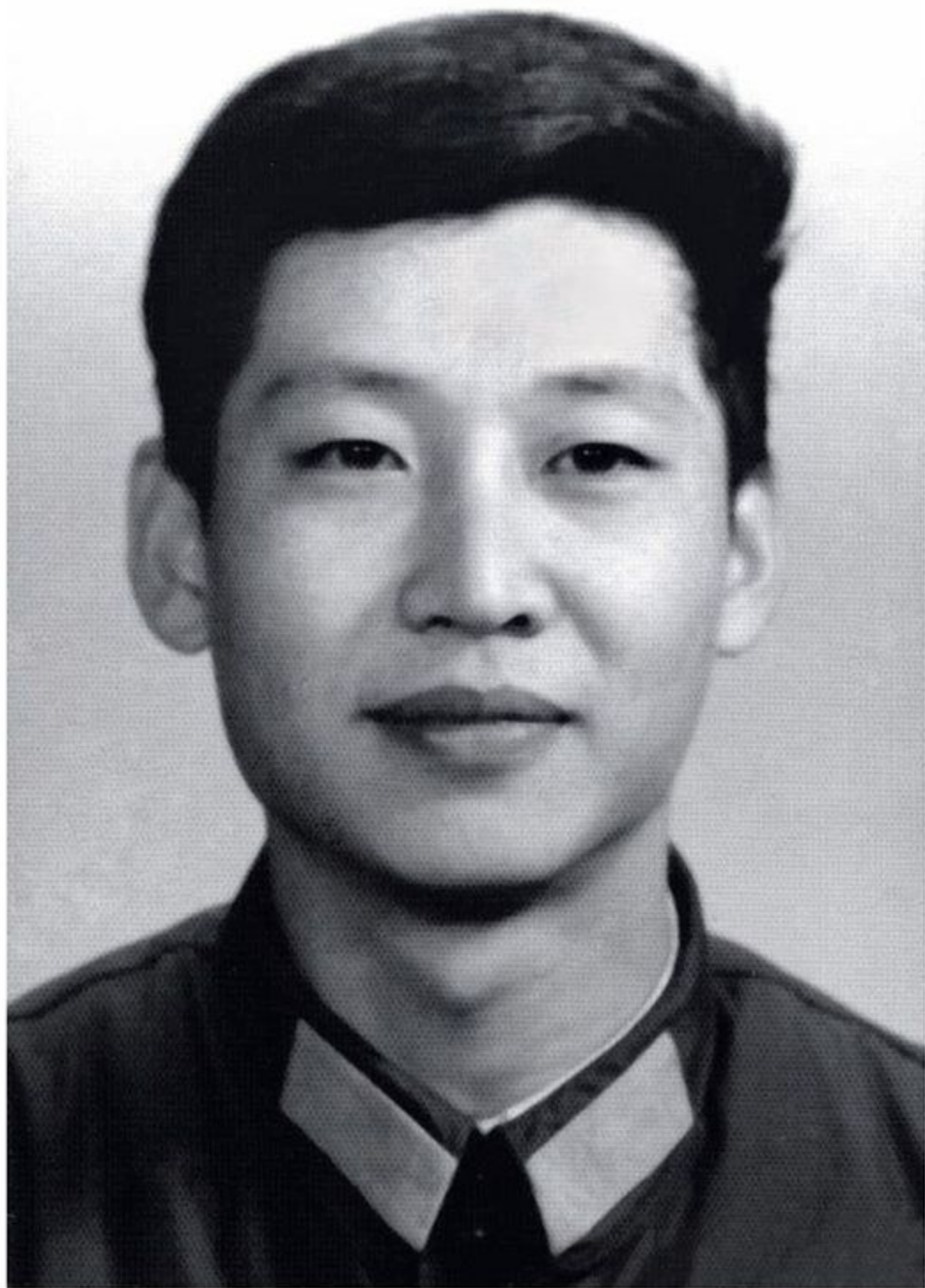
当时，宁德有4个镇没有通路，我去了3个，后来因调离了，有1个没去成。有个下党乡，我去时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他说这条路还

稍微近点，顺着河边穿过去。一路上，老百姓说“地府”来了。他们管地委书记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意思。那个地方叫寿宁县，明代写了《警世通言》等“三言”的冯梦龙在那儿当过知县。冯梦龙去上任走了半年。

当时我就一个感慨，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怎么千辛万苦都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

习近平还非常重视民众的信访疾苦，他在当时的信访工作专题材料上批示：“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信访工作，我们应该探索一条新路子。”“信访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领导要深入下去，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去接访群众，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问题往上推，这样做，

◀ 1979年，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时的习近平。



所以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地区的干部总是很低调地坐最后一排。

据大陆媒体报道，习近平赴任之前，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对于习近平，宁德人是由衷地欢迎，习给人以比较敦厚的感觉，干部群众对他的印象很好。”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的林爱国说，大家觉得习是北京来的人，希望他能够跟上面对接，搞一些项目，带来一些资金，尽快摆脱贫困。

俗语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些干部群众期待这位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在经济特区及中央机关任过职的新官，能烧它“三把火”，迅速改变宁德落后面貌。

习近平却没有急着烧。

“我六月到闽东上任，七月初至八月初，偕同地区的几位领导同志，走了闽东九个县，还顺带走了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大家边走边调查、思考、研究，思绪始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习近平后来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回忆到。

宁德人当时的梦想有三样：三都澳港口的开发、修建铁路和撤地建市。三都澳是军港，口子小、肚子大，出去后对面就是马祖列岛，属对台军事战略要冲。改革开放前，中央对台问题还是立足于打的思路，一切着眼于战争准备。中央对福建的整个投资不到18个亿，因为视福建为前线，不敢大搞建设。朱

既方便群众，又提高工作效率。”

在习的提议下，宁德地委、行署建立了下基层接待群众、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访贫问苦的“四下基层”制度。

当年的12月20日，霞浦县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举办，习亲自参加了这次活动，同102名来访群众面对面对话，受理各种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当场答复解决，其余的要求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

习创立的这套三级联动下访的做法后

来被他带到福州和他工作的浙江。习接任国家主席后，中国信访制度的变化也延续了这个思想脉络。

不急于烧“三把火”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宁德，交通闭塞，信息短缺，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维艰，属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海岛地区。全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被国家确定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1987年，该地区财政总收入刚超过1亿元，



↑
1985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考察。

“在厦门工作的3年，我感受很深、获益很大。应该说，这3年的特区工作历练，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帮助。”

镕基总理有一年到厦门视察，看到厦门有两个二三十层的高楼，还开了个玩笑，“你们是不是给台湾树立靶子呀。”他认为，高楼可能容易成为对岸导弹攻击的目标。

“三都澳军港的开发条件还不具备，这我们都明白。”习近平决定打消宁德人对他的过高期望，他几次跟林爱国说，“爱国同志我有时不太好说，你就多说一些。”习近平在宁德内部干部大会上也多次脱稿说过，“别人都以为我是北京来的干部，包打天下，什么都可以。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我们做什么事情要立足于实际。比如说修铁路问

题、三都澳的开发问题，谁不想做？谁都想做。但是我们现在做，条件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以后，我们再来做，做起来的效果会比现在做更好！”

习的思路是脱贫还要结合实际。他说，“宁德的贫困是千百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条件造成的，不是一个人一朝一夕就能给改变的，但是作为领导人要全力以赴，必须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一代接一代，不可能立竿见影。”习提出要立足宁德农业、工业现实基础，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弱鸟先飞”。

1983年，在河北正定办公室里的
习近平。

深入调研后，习近平认为，闽东地区脱贫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扶贫的关键是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遂提出闽东脱贫具体思路是：农业上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发展闽东特色水果，如霞浦、宁德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金芙蓉李，古田的油柰等；工业方面要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不要盲目为了出政绩而上项目，应强调突出规模经济效益，如霞浦电子按摩器、男宝器和福鼎的玩具，要千方百计上批量、上规模。

宁德虽经济总量排名老末，却很早通了程控电话，而且电话区号位列福州、厦门之后，为“0593”，这与习有直接关系。198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听人说，福建地区在建设数字基站和网络，北京邮电部的一位领导恰好在宁德。为了早点让数字程控基站在宁德落地，让宁德装上数字程控电话，习私下打听到那位领导住的酒店。

第二天，习近平早早起床，既没叫秘书，也没叫驾驶员，径自朝客人住的酒店走去，到时人家还没起床。习恭敬地在外等着，见到客人后，诚恳地请求对方支持一下宁德。

宁德两年从政经历，对习近平日后执政理念和治国思维影响深远。

福建一位党史研究学者评价说，在宁德这么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在这么短时间内，习近平能有非常大的作为也很难说。但习近平强调官员治国治政要有“滴水穿石”、锲而不舍的精神，“领导干部要有一种功不在我的职责理念”在宁德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习在离开闽东到福州赴任时，《人民日报》恰好有一篇报道《闽东脱离贫困线》。他后来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写道：







“有友人欣喜打电话告我此讯。我却没有丝毫轻松之感。我深知，相距于我们的理想，相距于我们的目标，相距于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脱离贫困线’只能说是起步。”

“马上就办”精神

1990年4月，福建省委任命习近平为福州市委书记。福州的六年主政生涯，对习近平的仕途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宁德的两年是对他人生观、世界观成长改造

打下了良好基础，福州则是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六年。”

在福州，习提出了“马上就办”精神。迄今，这四个字还刻在福州市委大院里。

1980年代末期，大陆各地对推行行政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盛，民众不满政府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的现状，各地政府迎合民众需求，出现了“马上办”组织，如山东、辽宁等地纷起的“马上就办”改革，山东还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但习近平当年在

**“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
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
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居中），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

立了台商投资区。

然而，相比全国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搞得最为不好，台商投资区更不用说了。“这里面有客观原因，尽管台商有八九成人祖籍来自福建，但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台商对福建颇为了解，福州没有腹地，没有上下游产业链，而企业生存靠的是市场，没市场根本难以生存，很多台商纷纷往广东、浙江跑。”福建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李新生说。

福州的招商引资政策、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思想观念都落后周边省份一大截。习近平为此有紧迫感——如不抓紧改变这一切，两年后市场环境变化了，更加什么都没有了。他提出“一个事情一个项目马上办”，“今日事今日毕”。

“‘马上就办’就是归纳了习近平在福州工作六年的一种执政理念，与现在提倡的改革行政效率，提倡服务型政府精神相通的。”李说，习近平当时是想尽快改变福州处于沿海区域“后排就座”的状况，争取每3至5年让福州上一个新台阶。

习近平在福州时，开始重视对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民主、科学的程序建立，“当时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搞了一个中国市长协会论坛，习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在他的关心下，福建很快成立了城市科学研究会，专门对城镇化进行课题研究。”福建省政研室原副主任杨益生说。

在几番调查研究基础上，1992年，习主导推出了福州市的“3820”工程，即3年一小变，8年一大变，20年时间达到亚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福建当地学者认为，习近平当时推出的这个福州市的远景发展规划，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定位，体现了主政者成熟的顶层设计和底线

思维。

大陆现有的管理体制下，下级官僚以服从中央为主，中央如果不出台大的方针政策，那下面好的改革苗头就可能死掉；而上面有了好的政策，下面怎么贯彻落实，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灵活还是呆板，这就看地方官僚的工作态度和技巧了。

“总体来说，习在福州执政治理的很多改革举措，也是在中央大方针框架下来谋划发展的。”但习近平长于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做好中长期的规划目标，做到有的放矢。

习近平离开了福州，任福建省委专职副书记，之后继续关注福州的建设。在其继任者的主导下，福州随后大兴土木，多上快上工程项目，习对此很不以为然。习离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市财政账上余额还有十几亿，但后来却出现了不小的亏空。

“习在福州当书记时比较平稳，比较实事求是，喜欢从长远出发，为以后的子孙后代着想。他提倡经济建设要常态化的发展，不喜欢搞突击，不喜欢搞空头支票和形象工程，这是他一贯思想。”习的一位友人说，在福建省委专职副书记任上，习仍为福州建设忧心忡忡。有一次习跟他讲，福州市的建设上现在有些操之过急，有的负债经营，不太务实。

友人说，习近平当年对福州市发展的思路，与现在中央政府提出的当前经济建设常态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有些理念不同、观点不一，但对过去的同事同僚，习近平习惯地以宽容和大度对人。习的继任者后来调至北京某国家部委任职，有一年，习近平去该部委视察工作，按照行政级别，座谈会上，习的这位过去同事位列很后。习专门叫人关照说，某某人，过去是我共事多年的老同事，

福州提出的“马上就办”精神与之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背景。

习到福州后，面对的是福州发展落后于其他城市的现实。当时的中国大陆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4个经济特区，后来又搞了15个计划单列市，但沿海省会，也只有福州、南宁没有拿到，其他都争取到了计划单列市名额。1984年中央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终于把福州也拉了进来，后面又给了福州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指标，1989年，建



▲ 1993年8月，时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左一）在福州市、台江区领导联合接待群众日接待群众。

多年没见面了，这次让他坐到前面来。

稳步治政渐成熟

从30出头的青年入闽，到50知天命之年重装待发，习在福建足足工作了17年零5个月，而且从副厅级干部成长为正部级干部，其间虽稍有停滞（副部跨越正部用了近8年时间），但始终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迈上权力高峰。

在福建治政的近18年间，他的执政理念和思维有的已臻成熟，如重视地方官员的基层锻炼。习近平在宁德任职时，曾以“猛将出于伍卒，宰相起自州郡”古言为喻，将地委机关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下放各县任副县长或副书记，这些人现在都走上厅以上领导岗位，民

众评价都较高。

有的渐趋成型，如习根据福建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经验提出既要抓经济又要注重环境的生态省建设，以后主政浙江时，便正式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的发展战略。其他的如反腐倡廉等治政理念，彼时亦已见端倪。习到宁德的那年，本地干部违章占地盖房成风，一个县城里房子建得没有规划，你扭过来我弯过去，百姓怨声载道说，“以后死了连棺材都抬不出来”。

习叫人去统计了一下，单单占房的干部就有几千户，不得了。大小都跟地委领导机关部门的头头有些关系。习在地委干部会上跟大家讲完这个现状后，非常平稳而又一字一句地讲，“几千个干部人数很多是吗？我们宁德地区人民群众有多少呀，300万！

300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可以得罪，几千个就不能得罪？”习的话说得很重，很快拆房工作就启动了。

熟悉习近平的人都知道，习酒量很好。1980年代末开始，大陆官场的吃喝风就屡禁不止，扬扬沸沸。福建一位过去的县委书记也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当县委书记的如不会喝酒，非常麻烦，上面来的客人，出场不能喝酒，场面会非常难堪，什么话都说不出，什么事都办不了。

习近平到宁德后马上规定，公务接待必不可少，但必须限制，宁德地委专门开会做了规定，制定了“公务接待12条”，什么领导接待标准多少，几个人陪同；而一般的公务人员严禁公款吃喝，违令重罚。

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回福



▲ 1995年12月，时任福建省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左一）在闽侯参加闽江下游防洪堤加固工程的劳动。

建时，看望过去的主要搭档林爱国，跟他推心置腹地讲，我们过去在宁德，条件穷，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很淳朴，干部很廉洁，现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有了，机场也立项了，港口部分也开放了。现在条件这么好了，干部却腐败了，近年来，宁德的连续两任市委书记被判无期徒刑，县市干部几十个坐牢去了。

林觉得习的这番话讲得有点伤感，也很惊讶。“我都没想到他会讲这个话，我觉得他都是政治局常委了，应该会讲些冠冕堂皇的话，如我们主流还是好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说怎么这样的腐败，宁德的这些案例都是习自己说出来的，说明他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关心这里的发展。”

林说，联想起来，习近平对现在反腐

治理，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一直是很清醒的，他已经知道腐败到什么程度。还在当地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和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等到当了党的总书记，有能力的时候，他就想着怎么处理。

“前阵子关于中央反腐有各种说法，有说是政治斗争政治目的，说法很多。但从我这样跟他接触过的同事来看，他不是这样的，不是一时的起意，他是一以贯之的思想。”林爱国说，习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从来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习在宁德工作时，就社会维稳问题，曾撰文，“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

习在福建工作时期的思想，在他今天主政中国后仍能寻得痕迹，“我看了中央现在在职务干部中推行的‘三严三实’的教育实践活动，很多内容和要求其实是对过去习的工作实践的总结和归纳。”李新生教授称，“治大国如烹小鲜”，习治国之道既有过去的作风思路，平实、简单、卓有成效，又有现在的在实践认识中快速提高，渐臻成熟。●

宁德岁月：地委大院的旧时光

在宁德治政两年间，习近平只身在行署大院生活，结识了一群朋友。离开宁德后，深厚的情谊未曾被时间冲淡，而是历久弥新。在这群一起共事两年多的老友眼中，“他这个人很自然，实事求是，不喜欢人家拍马屁。”

记者/钟坚

邢常葆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很是引人注目。那是他和一位老友的合影。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位老友在天安门检阅了参阅部队。

邢小名“阿宝”，是宁德市电视台台长，今年60岁，已到退休年龄。从事宣传多年的邢常葆一直小心翼翼，直到有一天，有过去的同僚叫他解放思想，才大方地把照片放大挂起来。

“阿宝算是当年习近平在宁德时的下属兼好友之一，那时习近平只身一个人在宁德时，下班后若有闲暇，会与一群单身汉们、司机等一起打牌，邢是其中一个。”已退休的前福建省侨联主任林爱国说，邢是福建省少数几个熟知当年习的故事的人。林爱国当年也是习近平的左右手，习近平是宁德地委书记，林爱国是常务副书记，专员陈增光是第三把手。

在福州，昔日的这帮“宁德老地委班子的人”已不多，都7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有时会在梅峰路上的一处废弃的部队营房小聚，话题免不了要谈论过去的同僚习近平。

这群老友提及这位老上级时并不怎么犯怵，跟他在一起共事2年多，大家了解他的脾性，“他这个人很自然，实事求是，不喜欢人家拍马屁。”当然现在习近平不一样，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不过邢常葆纠正道，“不要看他官那样大，只知道原则性的东西，不是的，他人情味很重的。”

地委大院的旧时光

邢常葆与习近平的合影摄于2000年11

月4日，这一年刚好是习近平当选省长后的一周年。宁德市撤地设市选在这月的14日，习提前十天来宁德调研。照片的背景是部队的一艘登陆艇上，习斜倚着船帮，神情放松地看着镜头。那天彭丽媛也刚好来福建，福州家里无人，习近平便带她出来转两天。

合完影的习近平第二天就到县里调研去了，还是老规矩，邢常葆以私人身份负责接待“大姐”彭丽媛。彭丽媛来宁德，吃饭住宿什么的都没通知宁德市政府接待处。习近平只交代了秘书，秘书招呼邢常葆，他说，大姐来，你搞个车，负责接待。邢常葆很乐意：那没事，小事情嘛。他的车是一辆旧桑塔纳，邢找朋友借了一辆3.0排量的皇冠撑场面，带彭去宁德的老街上到处转悠，看到哪里有特色小吃，就坐下来吃，很随意。

“因为他觉得是家属，有朋友接待就可以了，不要组织上安排，他这人公私分得很清楚。”彭丽媛几次到宁德探亲，都是秘书让去福州送片子的邢常葆随车带回来，从不派公车接送。

邢常葆1955年出生，小习近平两岁，彭丽媛则比邢小很多，但大家平时“大姐大姐地叫习惯了”。这声“大姐”，主要是尊重彭丽媛，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敬畏。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彭丽媛就是享誉中外的歌唱家，习身边的秘书、司机都这么叫，邢常葆差不多也叫了有20多年了。

习近平35岁到宁德，任地委书记。宁德不比厦门，是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地委在一个山坡上，办公区和干部的宿舍区沿山坡拾级而上，上去就是天王寺和镜台山，行署前面的一条路叫署前路。行署大院的布局大

体上叫“7127”，7就是7座办公楼，1就是一座礼堂，27就是27座家属宿舍，实际上不只27座。

习近平办公地在行署大院6号院，一栋三层的石头楼，三楼是正、副两个书记，二楼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一楼是秘书、驾驶员等。习近平当年上班一般都提前到，经过一楼楼梯口值班室时，会热情主动地与值班人员打招呼，还经常和工作人员谈工作上的事。那时的桂花树干仅有大拇指细，现在已亭亭如盖。

办公楼院门正对着的，便是地委办值班室，沿着值班室旁的楼道往上走，习近平的办公室在三楼楼梯口的左边，由两间相连的小房间组成，中间不曾隔断。一个摆满书籍的书柜很是醒目，布设陈旧的房间里，一张皮革沙发放在外窗边，沙发旁立着一个三角桌，桌上摆着两个暖水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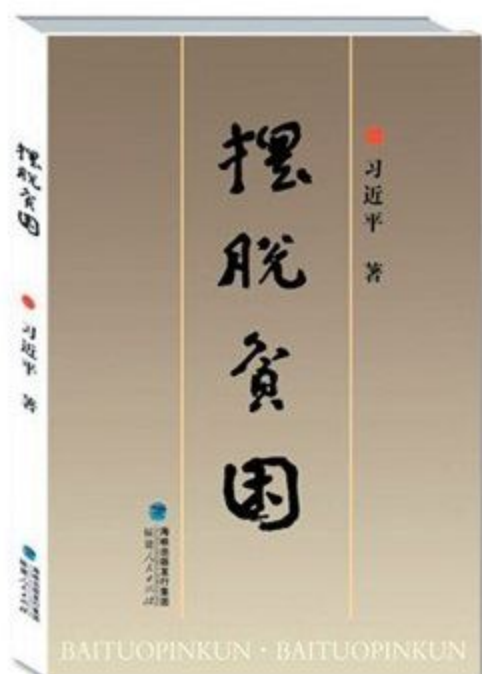
三角桌的第二层放的是几个会议专用瓷杯；第三层是脸盆，脸盆边搁着毛巾。靠近中间隔墙的是两张皮革沙发。房间的左侧，又是一个摆满书的大书柜，书柜前是一张深棕色木制办公桌，桌面堆着一摞摞公文、书籍，摆着一个茶杯。习坐过的椅子是把藤椅，靠背是圆形的。对面放的是一张藤椅和两张沙发，是汇报或交谈的人坐的。

习近平那时住在机关家属楼，因为在厦门时已经结婚，分给他的是一套二室一厅的小房子，外面还有个八九平方米的接待室，但彭丽媛是军旅歌唱家，军职在身，很少到宁德来。

地委几个副书记和专员都带着家属，习就一个人住，还是单身汉的生活，家里洗衣



▲▼ 上图 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
下图 习近平所著《摆脱贫困》一书初版于1992年，围绕闽东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习近平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诸多富有创见的理念和方法。



服、打扫卫生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宁德老地委机关那时有四五个单身汉，习跟他们几个凑在食堂里，打个饭自己吃。林爱国的厨房跟习的窗对着窗，有时做饭时，看到习晚饭后自己在洗碗。

彭丽媛一年来不了宁德一两次，一次是休探亲假，住了十来天，还有一次在福建附近演出后路过。偶尔来了，也是自己上街买菜，戴着墨镜，人家还会认出来。习家的厨房设备很简陋，只有一个液化气煤气单灶，没有蒸煮的器具。彭来了，炊烟袅袅晚饭时分，彭还会问，“林书记，晚上你做什么吃呀？”

以后福建省委为加强宁德干部队伍，

又调了几个领导下去，也是单身汉，晚上没事有时会 and 习一起打上一盘“争上游”。习下围棋很好，棋圣聂卫平跟习近平算是“发小”，可惜当时行署机关围棋会下的不多。

习近平的牌友没有别人，一个是他的秘书徐凯薪，一个是办公室的黄春光，从北京下来在宁德挂职副市长和外经贸委主任，牌友不够时，常叫邢常葆凑一角。

习近平认识邢常葆是在来宁德后的第二个月。只要没有开会的时候，习近平会走访大院里的每一个机关单位。习近平那年走进邢的办公室，邢常葆在编一个《太姥情》的电视艺术片，习看了比较满意，就此

1989年1月18日，习近平看望宁德市九都乡九仙村少数民族群众。



熟识了。邢常葆是宁德地区电视宣传中心站的负责人，手下加他共三人，主要拍摄和后期都是一个人做到底。

“我打牌臭，就跟他讲，领导我跟你打不了。为什么？我这个人手气不好，我没有炸弹怎么出；我炸弹多了，你牌也出不了，我乱出也不行。”邢常葆推说打牌不行，自告奋勇地去煮宵夜，“你去你去，”习便让邢拿点什么东西去厨房加工一下。

2000年前后，沿山而建的宁德老行署机关大院曾一度传言要拆除重建，消息传到当省长的习近平耳里，习对宁德的官员说，宁德地区经济还不发达，我看还是不拆了好。老的宁德行署机关大院现在还保留着，原汁原味，没变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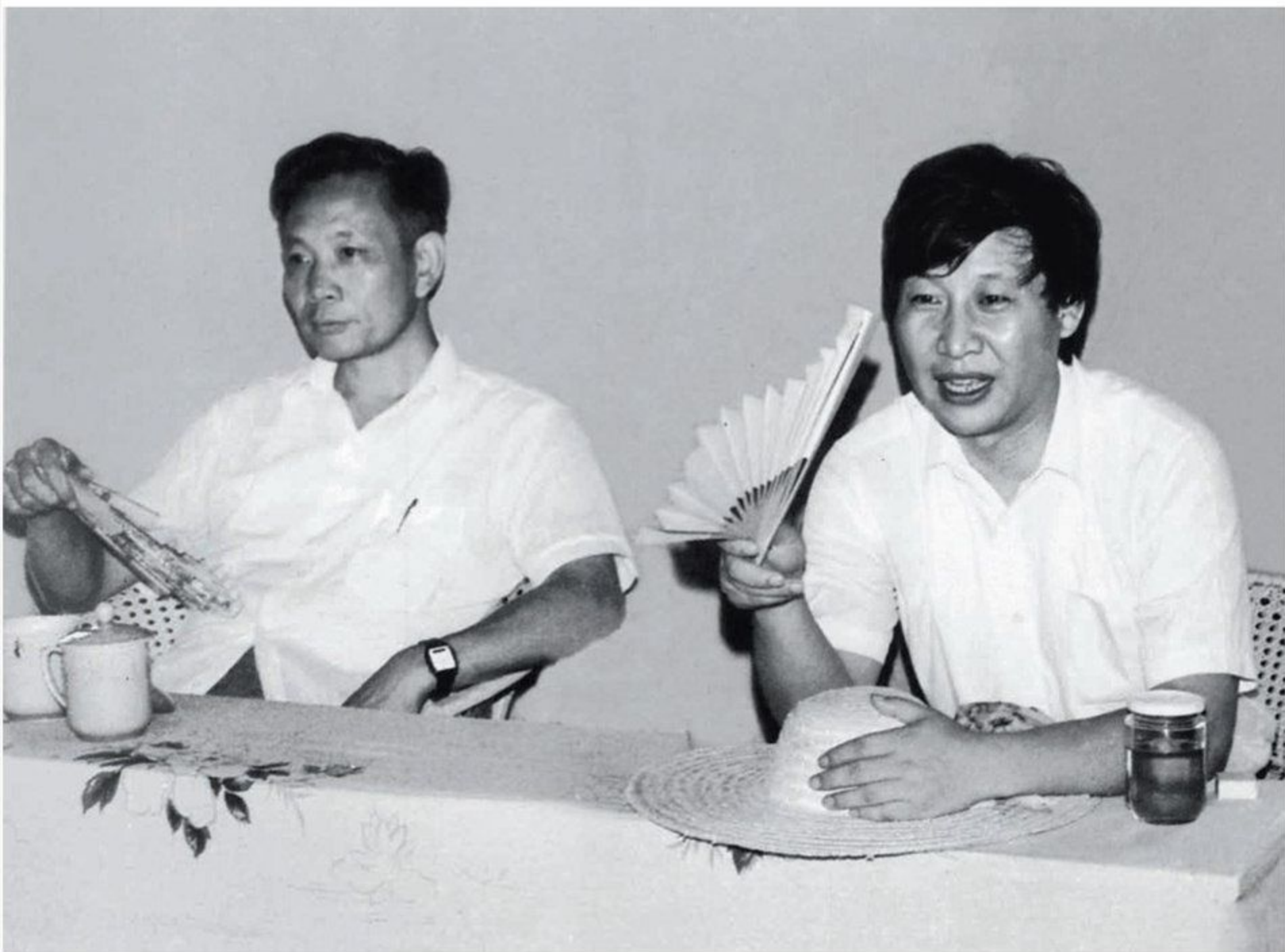
鸿鹄之志

习近平到宁德任职后的第二年，母亲齐

心到福建看望。齐心当时在中央党校任行政秘书，千里探儿，事出有因。

习近平刚到宁德没几月，趁着到北京出差，回了一趟家，随手还带去了反映宁德地区贫困落后面貌的专题片——几盘记载宁德革命老区边远农村群众缺衣少吃、贫困落后、交通困难的录像带，内容诸如“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之类的”。这是宁德无奈向上级首长机关伸手要救济的

▼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



明代写《警世通言》等“三言”的冯梦龙曾在寿宁任知县。冯梦龙去上任走了半年。“当时我就一个感慨，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怎么千辛万苦都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

法宝之一。这之前，宁德地区的官员还把片子送给在武夷山视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看完后，中央给了一些钱、衣服和粮食。

习近平的本意或是将专题片带到北京去，拿给一些熟人、朋友看，好让他们支持宁德。孰料在家里一放，齐心和习近平的姐姐齐桥都看了，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太艰苦了。看完片子，齐桥桥哭了起来，觉得弟弟在

这么偏远落后的地方任职，真是不容易。齐心也心疼儿子的辛苦，萌发了要来宁德看看的念头。习近平见状，竭力跟家人解释：宁德那个地方风光还是挺好的，有山又有海，挺漂亮的，还不错。

1980年代后期，从北京到福州再到宁德，路途数千里，来一趟宁德很辛苦，单是从福州到宁德的路程都要走三四个小时，还是泥泞的山路，走完一身尘土。齐心不顾劝



阻，终于到宁德。地委书记的母亲来看望儿子，几乎没惊动大院什么人，只有秘书等非常小范围的人知道，习近平也不事张扬。齐心来看了看儿子生活、工作的地方，还由秘书带着，到周边的几个小公园走了一走，停留很短的时间就回北京了。

慈母思儿，人之常情。在宁德的一两天里，她还亲自下厨做饭，对前去看望她的习的同事说，“近平很年轻，请大家多关心他，多帮助他。”她除了担心儿子生活、工作太辛苦，专程前来给他打打气亦未可知。

林爱国曾长期在三明地区任职，习近平便问他三明的老鼠干你吃过吗？林如实说吃过。三明的一个县曾流行吃老鼠干，将田鼠抓来，内脏挖掉、皮剥掉后，烤着吃，以为美味。习近平同林爱国说他很神往，也想吃吃看。林不信，问你敢吃吗？习回答，“我

敢呀，我生猪肉都吃过。”

习说，早年在延安插队的时候，整整八个月没吃到油腥的东西，每餐都是咸菜疙瘩加干粮。有一次他挑了一担谷子走了几十公里到公社的粮站，把谷子卖掉之后换了几块零钱，买了一块猪肉回来，回到家里，来不及下锅煮，几个知青就围上来生切着放进嘴里就大嚼特嚼起来，旁边大人们赶紧制止，不能这样吃，要生病的，煮熟了再吃，但已有小半猪肉入肚。

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出席正式场合，习近平总会穿着那年月流行的涤纶卡其布的蓝色中山装。跟随习近平下乡的邢常葆有一次发现习的中山装的肘部已破损，零落的衣服上毛须挂落下来，甚为惹眼。手头没有剪刀，邢就说，“我用打火机帮你烧下吧！”邢用打火机把衣服挂落的毛须逐一烧烬。

▲ 1988年8月10日，习近平在霞浦县调研工业。

➤ 1989年8月，习近平与地、县领导在寿宁县山村。

习见此夸赞：“阿宝好不错嘛，没有把我给烧进去。”邢常葆吹嘘：“我这个技术还可以的嘛！”

从中南海大院走来的这个地委书记，跟其他的宁德干部有些不一样。青年时期的习近平中规中矩，绝不逾越半步。这与习家从小严格的家教或许有关。

习的生活要求非常随意，下乡从来都是跟下面的人坐一桌，煮上三四碗菜。到乡镇去一般一碗面条了事，但就是一碗面条他都要交伙食费。下乡调研一天，正餐1块5、早餐1块钱。习近平有一次去乡镇发现，秘书没有按规定交伙食费，严厉地批评了他。这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习惯，在正



1989年1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
看望老同志并听取意见建议。

定任县委书记时，不论是陪客还是下乡吃饭，他都无一例外地坚持交纳饭费。

习近平那时是司局级，一月工资才170多元，因为常下乡，扣除一天4元的伙食费，所剩无几。据邢常葆介绍，习近平那会儿抽烟，在河北正定时习抽的是荷花牌香烟，到宁德后改抽南方人流行的健牌。这种口味比较冲的烟每包5块多，习一天要抽一包多。离开宁德半年时间，习戒掉了烟瘾，那是习近平一次下乡，受凉重感冒，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此后习再也没有碰烟。还有一种说法来自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他曾向《凤凰周刊》透露，“习近平主席是在彭丽媛大使（控烟形象大使）的劝说下成功戒烟的。”

有时下乡，习还要拿工资接济困难户，这样一来，习的账务几乎月月见底，甚至赤字。亏空的生活开支由彭丽媛补齐，当时彭收入比丈夫高。对于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习近平在后来关于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中解释为“当干部的宗旨首先就是奉献，就是讲服务”，“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

“没有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期待飞得持久，‘扶摇直上’是困难的。”习近平写下这篇文章是在1988年的9月，距他到宁德不足半年，离他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则差24年。

宁德时期的习近平正是其仕途起步之际，除了偶尔的打牌娱乐，多数时间他晚上没什么事，吃完饭便沿军分区的操场小路绕上两圈，大约二十分钟后回到宿舍。下班后习的业余活动，就是看书。“他的书多得实在不可思议，托运来的行李主要是书，他来宁德的时候都是叫几个年轻人帮他扛上去。”习近平住家属楼三楼，林爱国住二楼，林对这个小自己几岁的同

僚顿生几分好感。

习近平到宁德下面的寿宁调研，原寿宁政协主席连德仁在日记中记载：习书记每次吃完晚饭后，第一件事就是逛书店，到书店而且一定要去认真看，不是逛一逛就走了。有一次还发现有一套书，福州城里书店也买不到，在寿宁县书店却买到了。

习有上床之前看书睡觉的习惯，每天要坐床边看上一个小时才睡觉。在宁德老地委班子的几次聚会中，林爱国发言说，习近平当上党的总书记后，现在讲话还可以听出当初的国学根底，这与当年的苦学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曾参军入伍，做过耿飚的秘书，到宁德当地委书记时，又兼任宁德军分区第一政委，因此分区发了一件军大衣给他。上任一年多后，习近平拿出这件崭新的军大衣送给副手林爱国。他说，“爱国，这件大衣给你，我们宁德的山区很冷，下乡的时候披一披，挡挡风，晚上如果招待所被子不够的时候，当被子盖。”

习接着话锋一转，讲起毛的故事。毛泽东当年也有一件军大衣，毛岸英从苏联回国要下基层搞土改去，未婚妻刘思齐也一起去。毛泽东把身上的军大衣给了毛岸英，叮嘱说，白天你穿，晚上给思齐当被子盖。

闽东山区的冬天确实很冷，下雪天结冰很厚，石头房子里冷得刺骨。习近平一米八几的大个，却不太习惯南方的冬天，配发的被褥又薄又轻，盖头不盖脚。大陆互联网上流传一个故事，说是习近平到宁德第二年，彭丽媛在北京特地做了一床加大加厚的棉被。正巧她要外出演出，先去东北，最后回到福州。她就背上大被子上路，沈阳、长春、鞍山，走一路背一路，辗转几省，千里迢迢才将被子送到宁德。

习近平对妻子和家庭的温情也无时不



下乡调研一天，正餐1块5、早餐1块钱。习近平有一次去乡镇发现，秘书没有按规定交伙食费，严厉地批评了他。



在。调任福州后，习近平与彭丽媛的孩子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出生了，接生的是省妇幼保健院的老医生陈素清。陈素清有一次亲眼看到，习近平在彭丽媛生育后第一周亲自帮她泡牛奶，当时没有一次性纸尿裤，陈看到习自己搓洗女儿的尿布。那时习近平已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

小孩满月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妻俩又

一起来到省妇幼保健院，在医生的办公室搞了一场“演唱会”答谢医护人员。说是演唱会，只是在医院提供的磁带配音下，彭丽媛拿着麦克风唱了几首歌。

君子之交

宁德的老地委班子主要成员中，常务副书记林爱国长习7岁，专员陈增光当年50多

岁，习近平最小。这位年龄最小的“外来单干户”重情重谊，成了圈子里人们的共识。

“你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家里有什么困难，没空不会问你，有空就会问你了，‘你老家在哪里，几个兄弟，家里有什么困难，有没有组织上能帮的什么事？’你说了，他能做的会给你做。但你不能说你要给我多大的官什么什么的，他会不高兴的。”



↑ 原宁德市直机关行署办公地及内景，习近平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习近平从厦门到宁德带来的秘书徐凯薪，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习对他很欣赏和信任，徐也是有个性的年轻人，头脑很好用，遇到有观点不同的地方，两个人都会争执起来，但习还是很喜欢，一直从宁德带到福州。

习的一位故知称，习当年虽只有30多岁，却好像有50岁的政治头脑和处世方式。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各级官员，因生活与工作机缘与他走近的人，都十分惊诧这一点。

宁德市地委班子成员姚大姐原来是海岛女民兵出身，后来从妇女队长、民兵副营长、大队书记到县妇联主任，一步步成长为领导干部。她原来在宁德罗源县当县委书记，回到宁德后是地委委员。姚的婚姻生活不和睦，她的前夫一直纠缠着不放，姚当时与前夫已有三个孩子，她自己也不敢离婚，担心各种闲言碎语，“你是干部，老公是渔民，人家会讲这个人当了官把老公都扔了，

孩子都不要了。”

姚觉得家丑不可外传，生活过得很压抑。习近平无意中知道后就对她讲，“姚大姐，这个事情我前段不知道，这一次我了解了，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你真的是有困难，需要离婚，你大胆提出来，我们组织上给你出面。你不要搞得压力那么大，该组织出面，你就离掉，这个怕什么呢？”

姚后来顺利地摆脱了婚姻的枷锁，若干年后她跟人说，“习书记这个人真好，我当时那个家庭情况真不好意思，压力又很大。他就说，‘不要紧，你这个是事实，你大胆点，我们走向法律，你需要我们地委出面就组织出面，这样子把你解脱掉，然后全力以赴工作。这很正常的，怎么能凑合在一起呢？’”

习近平到宁德第二年，宁德部分地方乡镇撤并新建，宁德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寿宁县代表团杨奕周站起来，当着地委书记一干领导的面“开炮”，“你们地委要加强对

我们新成立乡镇的政策倾斜，我们现在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无法开展工作！”杨奕周是寿宁下党乡党委书记，这个乡刚设立没多久，山远地偏，条件艰苦。习听了决定亲自去看看。

习近平去了一趟下党乡，前后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此后他和杨奕周成为莫逆之交，“习觉得地方干部在这么边远穷苦的地方实实在在地工作，他很感激，把他当做自己的兄弟朋友一样。”邢常葆说，习近平以后不管是在福州市、福建省委，还是浙江任要职，杨奕周什么时候来找，他有一点时间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接待，不会推托忙借故不见。

杨奕周的儿子那年高考，考完分数不行，进二本的分分数都差很多，老杨去找习近平。习近平那时已是福建省省长。秘书跟习讲老杨找你。习近平见到杨奕周后问什么事？杨说，没什么事，小孩念书考得不好，没书念了，你能不能挤一两个大学名额念



一下？习听了迟疑片刻说，“孩子念书是大事，不能没书念，但成绩不好，高考是有规矩的。这样子吧，你先放下心来，我等会儿再给你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习见杨一个人从宁德跑来福州，当天眼见回不去了，于是说，“这样子，我家里家属也没来，今晚你就住我家，不要住外面了。”习叫秘书带老杨到家里，吃住在自己家里。习近平明白，杨奕周这次是因私事来找他，不好公费报销，而一个偏远地区的乡镇干部也没多少钱，住在自己家里，还能帮他节省开支。

杨奕周之女杨世凤回忆，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任职，习近平多次通过秘书打电话到家里，询问下党乡脱贫发展情况，关心老杨的家庭状况。2007年前后，杨奕周患病住院，习近平亲自派人派车把他接到浙江治疗，当年6月老杨病逝后，习还特地发唁电向他的亲属表示慰问。

也有人曾问邢，“你能不能一句话概括习近平？”邢自忖，也真的不好说，你说他是伟人？他现在当领袖了说人家是伟人有点拍马屁的意思，习是很不喜欢这一套的。但他这人确实“很朴素、实在，应该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邢说，工作以外的交情，只要投缘，完全是君子之交。

务实随和，不喜作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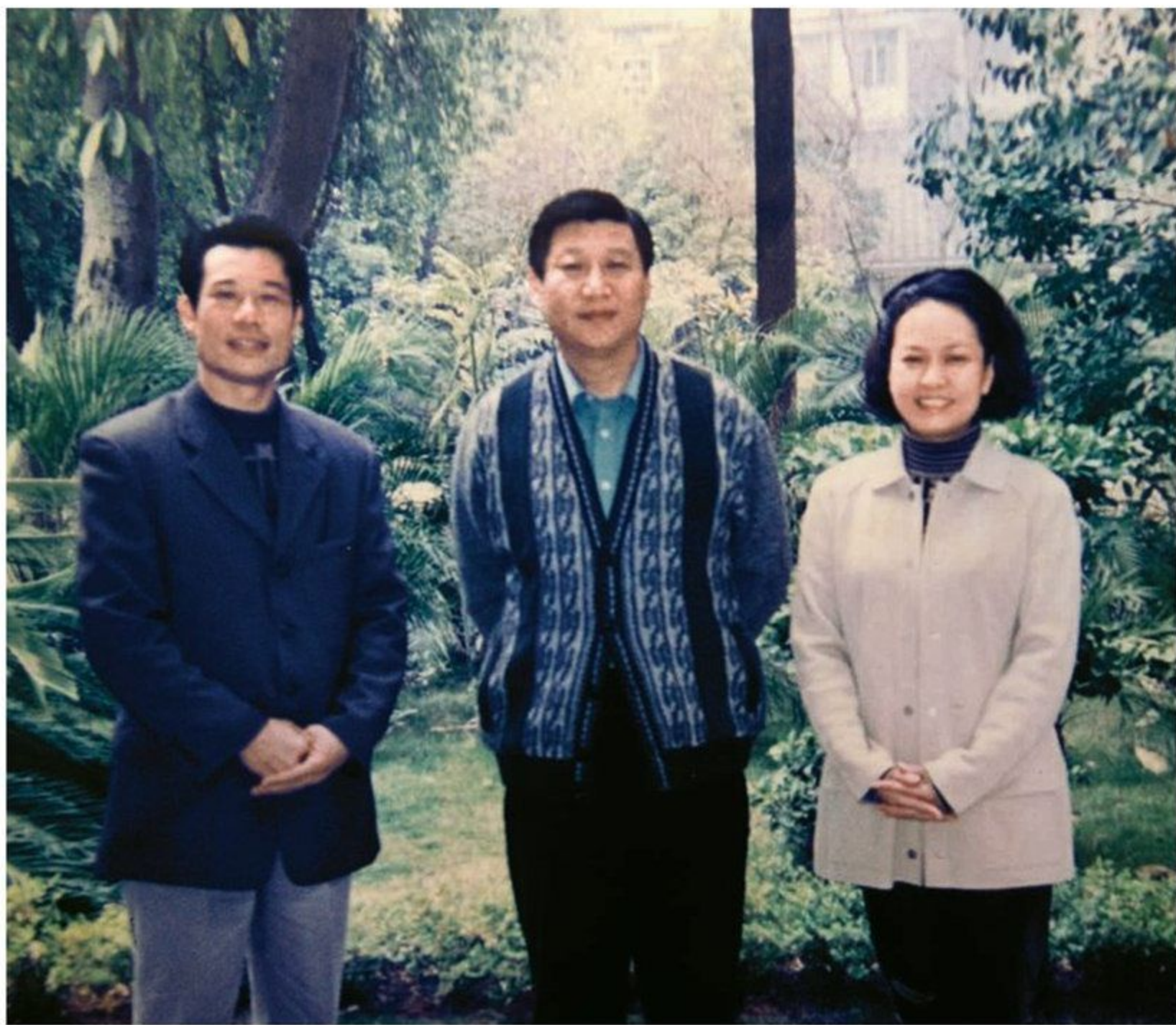
在过去很多时间，彭丽媛是“鲜花”，丈夫习近平是“绿叶”，他却甘之若饴。九十年代末，分管农业的习近平一次下去调研带着探夫的彭丽媛，他对大家开玩笑，“今天我是随军家属。”福建省发展研究中心杨益生第一次看到“比舞台上更漂亮的彭丽媛，而且一点架子都没有”。

那天晚上彭丽媛很高兴，宾馆的服务员拿着菜单叫她签名，习近平见到后笑着说，“今天晚上来者不拒，大家尽可以随便签。”他说彭比他值钱。杨益生觉得跟彭在

一起，没有那种官太太的样子，也没有领导带着家属给大家的压抑感，和习近平夫妇俩的交谈不是仰视，而是完全平等，没有被居高临下的感觉。

而这之前，“闽江第一漂”的组织者之一的杨益生曾见识过习近平的另一面。1994年，老将军叶飞的女儿协同几个文化人筹划“闽江第一漂”，从福建的浦城、三明的建宁源头出发，一直到福州马尾的闽江口，这是一个纯民间活动，不仅仅是漂流探险，还有对闽江沿岸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

习近平主动找到杨益生说，闽江漂流、探险活动，他也喜欢，因为这是勇敢者的游戏。习提出也很想参加，但受身份所限，不过他可以对连江、长乐、马尾沿线的县市打招呼，提供一切尽可能的方便。得到习支持的“闽江第一漂”文化经济考察活动在历时1个月、漂程近千里之后，于闽江口外川石岛宣告收桨。



↑ 习近平、彭丽媛夫妇和邢常葆合影。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二次回福建时，政务繁多，他依然把过去共事过的人的名单交给办公厅，让办公厅的人打电话问候。

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他的搭档林爱国在他之前调任福建省广电厅厅长。习近平有次把林爱国叫去，说自己很想拍一部反映爱国题材的中法马江海战的电视剧《马江之战》。习对林说，你福建电视台来拍，我给你当后盾。林爱国当时跟他开玩笑，福建台可以拍，但有个条件，主题曲叫小彭来唱。习说可以。这部十几集的电视剧拍了年把时间完成，片头显示习近平是总顾问，彭丽媛是主唱，可谓极为罕见的夫妻档电视剧。

习近平任福建省专职副书记时，长期兼任福建预备役高炮师第一政委，与军方人士交往很多。退役的福建省军区政委陆凤彬

少将与习关系甚笃，陆凤彬的老家是江苏南通市，被称为中国建筑之乡。有一年南通市的建筑公司一年连续拿了三个“鲁班奖”，当地官员找到陆凤彬，想请陆通过习近平请彭丽媛来南通捧场唱歌，并且请彭帮助请几个演员。

习近平很认真地听了，也不马上承诺，而是答应过几天给他回个话。最后答应，当年正月十四的时候，彭丽媛去南通。彭还帮请了其他几位演艺明星。陆凤彬又跟习近平说，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到我家乡去看看。习近平说好呀，但这个要跟省长书记请假的。陆说我给你去请。陆于是替习到陈明义书记和贺国强省长那边请了假。

正月十四那天，陆凤彬带着习近平到了南通。习近平跟陆说，这是彭丽媛下去演出，作为丈夫的他第一次来外地看她演出。

但凡与习近平有过私交的他的过去同僚都称，习调子不高，为人务实随和，不喜作秀。他一般不表态，但是他答应的事，肯定给你落实。

“习就是很本分的人，不搞拉帮结派，非常重规矩。”福建省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室主任江典辉眼里的习近平，可能跟家传身教有关系，“他老爹也是一个很规矩的人，他的家庭生活很简单，这样的人很孝顺很传统。”习就是如邓小平所说的不左不右，实事求是地照顾到各方需要，同龄人中很少有他这种格局。

不忘旧交

1990年代开始，习近平从宁德调任福州，2年后女儿木子出生，习近平的生活趋于规律。女儿木子出生后，习近平的岳父母常过来帮他带小孩，有时习的小舅子也过来，帮助照料，住在左海公园附近的省政府家属楼里的一家人其乐融融。

知道习有了女儿，习近平的过去同事都去看望，但所有的同事都没有送礼，大家明白他不会要。宁德的老地委书记特地来问林爱国，他说，说起来我是习的长辈了，他问林看看送什么合适？林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就按民俗给孩子送点银锁之类避邪的东西就可以，那位老书记过后就买了一套银的挂锁送给习的女儿作为见面礼。

邢常葆将宁德土特产一箱地瓜扣（粉扣）送去，这种东西民间常作为火锅配料，一斤没几块钱，弄一箱子才百来块钱。邢算是老熟人，就是这样，送到习家，秘书照例还是按规定要登记。

离开福建到浙江任职，包括邢常葆在

内，他福建的一些老友陆续都去杭州看望他，习近平一般都是叫秘书在西湖边安排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带着岳父母、女儿一起到那个地方，大家一起吃个饭，低调而又节俭，不事排场。

随着习近平职务越来越高，老朋友们联络他越来越不方便。2007年春节，邢常葆还收到习近平寄给他的一张贺年卡，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转年习就赴职上海，邢常葆和徐凯薪还给彭丽媛打祝贺电话，想去上海看望习近平，彭丽媛回答说，老习刚来上海，这里一套房子还没修整好，“等春节前搞好了，你们一起到上海来过年吧。”

但这年的9月，习已调到北京任职，两人只得作罢。

2010年9月5日，习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身份到宁德，这也是他离开后的第一次回福建。计划中要会见现任宁德常委领导班子。一早，邢常葆跑去看这些老领导，让他们等下见到习主席，传个话给他，就说阿宝在外面。

中午习近平接见了宁德领导并合了影，1点多，大家才坐下来吃饭，没人再提这个茬。席间彭丽媛问到，这一次大家都见到了，有没有看到阿宝在宁德？有人说在的，早上还跟我们说，很想见主席。彭说我现在讲也不算数，这个事要问老习。彭走过去跟习说，阿宝在外面，你看？习说可以，你叫秘书打电话给他。

通过宾馆外的严格安保，邢常葆进去见到了习近平，看到这位过去的下属，习呵呵笑言，“阿宝会煮菜！”时光荏苒，显然他对宁德老地委大院的那段时光记忆犹新。

邢指着窗外说，“你今天看到没有？原来我们上山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房地产

了，你都认不出来了？我也认不出来了。”习说是，宁德变化很大，但是整个跟发达地区相比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得加一把劲。

此前，习近平回福州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让福建省委办公厅逐一通知在宁德共事的人要见个面、吃个饭，也通知到了林爱国。在福州宁德宾馆，已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再一次与老同事们见面，大家相谈甚欢；习近平当晚住在福州国宾馆，按照习近平给定的名单，福州、福建省的同事，包括过去服务过他的秘书、驾驶员、服务员一批进去，一批出来，习跟过去的这些老朋友、老同事、老下属们都见了面。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二次回福建时，政务繁多，他依然把过去共事过的人的名单交给办公厅，让办公厅的人打电话问候。“当时正好过年，我们知道他来了很忙，没想到，省委办公厅打电话来，”林爱国说，电话里说，“我是省委办公厅，转达习总书记对您的问候，习总书记公务很繁忙，这次不可能拜访您们了，谨代表习总书记向您表示新年问候，健康长寿！”

习担任总书记后的2013年，新华社发了个通稿，说是对所有国家副国级以上领导，习近平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新春慰问。

林爱国突然想起习近平那年刚到宁德第一次跟地委干部做报告时说的一番话，“宁德是个革命老区，我也出身于陕北革命老区，所以心里很有亲切感，宁德革命老区的老前辈是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习接下来，逐一点名对宁德地区老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那会儿，习才来没几天，他事先已把宁德地区老同志的名字都问过了，“他一贯就是这样的人”，林说。◎

□ 编辑 崔世海 □ 美编 青年

郴州“寻官启事”的背后

政府登报寻找失踪官员，这样的黑色幽默已屡次发生，未来大陆相关部门可能进一步明确“失联”预案。

记者/邱锐

物 价局找不到副局长，只得登报寻人。这一幕充满黑色幽默的场景，发生在湖南省郴州市。8月20日，郴州市物价局在《郴州日报》刊登了一则“寻官公告”：“袁国富，男，汉族，湖南省临武县人，身份证号码432801197005012072，家住郴州市北街张家巷1栋601号。你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请于2015年8月28日前回单位人事科报到上班，否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83条第五款‘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超过15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规定，予以辞退。”公告落款“郴州市物价局，2015年8月8日”。

袁国富失踪前担任郴州市物价局副局长，自7月末该局并入郴州市发改委后，袁国富就再没来过单位。在发现其失踪后，发改

湖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9月13日，袁国富在珠海市被抓获归案。至此，袁副局长“失踪之谜”得以破解。而在纪检部门看来，袁被找回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他并不具备“玩消失”的条件。

“闻风潜逃”？

袁国富在郴州当地几乎没什么声名，有关他的公开信息，也不过是该市物价局网站上一则调研信息。“寻官启事”之后，袁国富才在当地引发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

据湖南媒体《潇湘晨报》报道，1969年出生的袁国富，从大学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毕业后，1991年分配到郴州市房产局，2007年左右，被提拔为副局长。2013年，袁国富调任郴州市物价局副局长。2015年7月，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郴州市物价局

以目前的反腐态势、监督力度以及技术水平，像袁国富这样的官员在被核查期间成功跑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袁国富真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身份证，用先进的人像比对技术也能发现其踪迹。

委纪委曾找过袁国富的亲属朋友，终未寻到袁国富，只能发布“寻官启事”。

启事没有任何效果，8月31日，袁国富仍未回单位报到上班，于是郴州市物价局启动了对“擅自离岗”副局长袁国富的辞退程序。

近半个月后，袁国富终于现身——据

并入发改委，但袁国富并没有被安排具体职务。

一位熟悉当地物价局的人士分析：“袁国富没有被安排具体职务”，是他官场不得志的表现。“从调入物价局后，他就不受重视。”其原因，或许与他曾和该市原纪委书



记曾锦春来往密切有关，后者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于2008年被处以死刑。

袁国富是郴州临武县人，曾锦春曾任临武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在袁国富就职于郴州市房产局期间，该市曾爆发震惊全国的“郴州腐败窝案”。该系列案件的导火索是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树彪因贪污、挪用上亿元公积金于2009年被处以死刑。受此案件牵连，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郴州市宣传部长樊甲生等当地政界商界158人先后被查。最终，2006年年末，曾锦春落马。2007年，袁国富升任房产局副局长，但此后再未得到升迁。

逃不过的纪检监督

目前,郴州市检察机关宣布已对袁国富立案侦查,并称其是“在郴州市纪委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初步核查期间”擅自出走。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此前纪委机关曾收到多份针对袁国富的举报,举报的内容有可能为袁国富任郴州市房产交易与权属登记管理处主任时收受贿赂。

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袁国富或许拥有两个身份证。“在那个年代,公安局管理不严,不少人、尤其是一些官员都办了两个,甚至多个身份证,为了在出国或办其他事情时都方便些。”该人士说。从《潇湘晨报》报道袁国富出生于1969年,但《郴州日报》的寻官启事上刊登的身份证信息却显示袁国富出生于1970

年,两者并不相符。

在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看来,以目前的反腐态势、监督力度以及技术水平,像袁国富这样的官员在被核查期间成功跑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袁国富真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身份证,用先进的人像比对技术也能发现其踪迹。“只不过难度大一些”,陆群说。地方政府机关登报寻人并非袁国富这一例。2012年2月24日,郴州市农机局在《郴州日报》发布“寻官公告”,找他们的副局长王昌宏,当时王昌宏已经失踪3个多月。登报寻官前,郴州市农机局曾花费大力气找人,一名科长甚至整理出了一本《寻找副局长日记》。去年9月,广东省阳江市地税局也曾登报寻找该局程村分局局长林其军。

陆群介绍官员失踪的应对流程为——所在单位向上级组织反映情况,纪检监察机

关得知情况后,进行初步调查了解,找所在单位及当事官员的同事、家属和亲友等了解情况,同时根据其工作性质进行研判:如果其工作与财务相关,就要怀疑其是否存在携款潜逃、挪用公款等可能性;如果失踪的官员是党政一把手或要害岗位工作人员,就要考虑其是否有贪腐行为。但如果最终发现,消失的官员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一般不会进行反腐败立案或启动追逃程序。“此前,湖南衡阳市某区曾有一位常委、宣传部长,在因私赴英国旅游期间滞留不归,但经过缜密调查我们没有发现其有贪腐行为,所以在将其开除党籍和公职后暂时予以搁置。”不过,陆群强调:“作为党员干部,如果擅离岗位不归,甚至跑到国外去了,肯定是要受到严厉的党纪政纪处分。”

□ 编辑 路琰 □ 美编 黄静

博识天下
一扫尽知

一码不扫,何以扫天下!



瞬息万事

信手可得

不信?来扫!

大陆经济学研究 需要多元化

中外经济学者献言中国

记者/李克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表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也无法为经济复苏和运行提出有效的政策药方,许多公理化的经济学原理不再适用或过时。同时,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奇迹”,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经济学需要发展和创新,已成为新世纪经济学界一个世界性的呼声。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由十年前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转为今天较之前几乎增速减半,大陆经济学界也开始重新反思现有经济学框架,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大陆的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干预模式的前途与影响。实体经济受挫、股市动荡、人民币汇率下行,中国经济在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亟须经济学思想的突破。旨在推动大陆经济学

研究的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今年9月在北京成立,该基金会由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与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共同发起成立,并举办了首届思想中国论坛。众多中外经济学家亦借此时机,提出众多现代经济学发展,以及大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在论坛开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曾接受《凤凰周刊》记者访问。

莫里斯:中国通过减税来刺激国内消费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见效,而与此同时减税也会带来政府赤字的增加,这样就造成一个相当矛盾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部门事实上处于盈利的状态,因此除了一方面减税之外,也需将国有企业一定的利润纳入到中央的预算当中,但做这样的决定需要非常谨慎。一些人或许会担心,这样会挫伤国企高管的激励机

制,但国企高管的晋升薪酬可以进行一定调整,仍然保持与营收挂钩。不过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与其金融统筹联系在一起,与银行的协调也会必不可少。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现代经济学长期以来基于西方发展的经验而建立,但在把这些理论运用到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却屡屡出现问题。因此经济学也需要更加丰富,更具多样性。理论的重要性来自于其解释国家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便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中国问题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有益,也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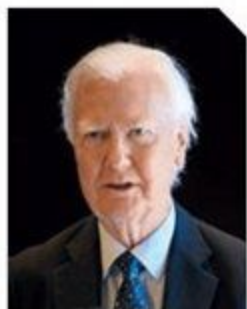
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社会政策协会经济思想史委员会主席**Michael Trautwein:**今日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过于碎片化,特别是现有的模型已经很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奇迹”,提出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经济学需要发展和创新,已成为新世纪经济学界一个世界性的呼声。

难解释一些跨国组织和非国家机构的经济行为。另外,网络对经济的效应、中国股市发生的变化,也还没有在微观经济学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经济学需要把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思想综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如此大而独特的中国来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副教授**Terry Peach:**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需要贯穿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不同的经济流派、不同的经济学思想之间。经济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受到经济的变动的不断影响。现今的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2009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这也促使在英国一部分学者开始发展经济学的新方向,比如危机后的社会经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中国经济学界现在如同中国其他领域一样面临严重的问题,一些人守不



莫里斯



林毅夫



Michael Trautwein



Terry Peach



张曙光



许小年



许成钢

住为学做人的底线，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是被权力牵着鼻子走，就是被金钱牵着鼻子走，要么被大众牵着鼻子走，总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偏好和爱好去做事。

中欧商学院教授、世界银行顾问**许小年**：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独立于权力、资本与民众，更应要独立于海外主流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如果不能独立于国外的潮流，也是无法做出成就。现在西方经济学唯模型是从，那些无法被数学模型进行描述的问题，比如创新以及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制度问题，都没有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关注领域，现实的问题因为工具的限制而被抛弃。

今日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并不缺少理论数据和模型，而缺少一些容易被忘记的常识。这些常识包括：中央银行印钞票仅仅是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转移价值，并不能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它也不创造价值；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




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由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而创新则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中国经济的研究实际上要超出经济本身，这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一个最突出的困难，因为中国有着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非常不一样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和中国独特的历史联系的。一个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一个是中国从苏联照搬来的模式，还有从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一定的调整。如何认识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系列

现象，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里非常重要的挑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最近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显示，在现今顶级金融学的14部期刊中，有77%的论文用的是美国的数据，只有23%的论文用美国外的数据。中国今天在大量引进海外人才的同时可能也需要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的修正。然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还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除了一个学者要纠缠于各种行政事务以外，还要面临的一个是数据获取的困难，一个是制度的不透明导致的观察和度量的困难。这也需要学者去和真正对制度有了解的人交流学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今天中国经济学已经较之30年前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在国际会议上国内学者已经很难发现还有什么没有

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了，而这在一二十年前还经常出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问题导向和工具驱动两个方向。现在国内经济学工具的掌握较好，同时受到工具驱动的影响很大，变成了根据工具去找问题。而经济学者，特别是资深的经济学者，更应该聚焦在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上。资深学者有责任把研究与中国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问题、长远的问题、与现实相关度不那么直接的问题放在首位。并且，研究中国不能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而要从中找寻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并且，基于中国的问题要想让人信服，必须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应该是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



白重恩



钱颖一



曼谷爆炸案尘埃未定

外媒指出，如果此事确为维吾尔极端主义者所为，则将是已知发生在中国境外的首起维吾尔人实施的恐怖袭击。这一事态的发展或将威胁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的安全。

记者/吴如加

发生在曼谷四面佛景点的爆炸案过去一个多月，泰国文化部下属的艺术品部门修复了四面佛金身上12处在爆炸中受损的部位，尤其是被炸掉的下巴。

尽管泰国警方逮捕了两名参与实施袭击的嫌疑人，但真实动机一直处于迷雾中。直到9月15日，泰国警察总长颂育对外表示，袭击的起因是“人蛇集团”，“他们将维吾尔人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我们摧毁或妨碍了他们的人口走私生意”。

此前，泰国警方对袭击者的动机一直语焉不详，竭力试图避免谈及维吾尔人与爆炸案的关联。这是一个月来警方首度松口，但与此前表态一致，泰国警方始终将爆炸袭击者的身份锁定在“人蛇集团”上，避而不谈跨国恐怖主义组织涉案的可能。

缜密且残忍的袭击

四面佛位于曼谷市中心地带，是泰国香火鼎旺的神坛之一，尊奉着印度教创世神梵天——其在佛教信徒

中颇受尊崇。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海外游客前来瞻仰四面佛，其中又以中国游客居多。

8月17日晚，放置在神坛边长凳下的爆炸物被引爆，从而造成泰国史上最惨烈的爆炸案。3公斤TNT炸药共造成20人遇难、12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7名中国公民。袭击者的目的十分清晰——造成尽可能多的平民伤亡。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一爆炸事件背后的筹备工作之缜密，涉案



人员之复杂，均超出了此前的预想。据泰国警方推断，此次爆炸案至少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准备，超过10人参与其中。

8月29日，一位名为阿德姆·卡拉达 (Adem Karadak) 的男子首先被捕。警方在他居住的寓所内查获了制作爆炸物的原料。经查，这些原料与四面佛爆炸案中所使用的原料类似。

卡拉达持有土耳其护照，签发地为伊斯坦布尔，但护照上有明显的错误，警方因此认为该护照是伪造的。同时，土耳其驻泰国大使馆也否认该疑犯为土耳其公民。在卡拉达身上还发现了大量伪造的土耳其护照，泰国警方据此认为卡拉达参与了协助非法移民获得假证件的偷渡活动。不过直到9月下旬，泰国警方未透露卡拉达的真实国籍。

9月1日，第二名疑犯、25岁的米

尔艾力·玉素甫 (Yusuf Mieraili) 在泰柬边境地区被捕。他的指纹与警方在首名被捕疑犯住所发现的含爆炸物容器上的指纹吻合，身上还持有一本签发地为新疆的中国大陆护照。而据《曼谷邮报》披露，米尔艾力向警方承认，他的父母在中国新疆居住。但有大陆媒体引述相关部门的话透露，米尔艾力并非从中国出境直接到泰国实施暴恐行为，此嫌犯2013年从中国出境后，2年内再没有回过中国。

据泰国《泰叻报》披露，警方宣称要依法将米尔艾力遣返回中国大陆，因为害怕被遣返，于是供出更多的案情和涉案人。泰国警方透露，米尔艾力会说土耳其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在审讯过程中，需要借助翻译。但他拒绝食用警方提供的清真食品，坚持要回教徒为其烹煮。

米尔艾力向警方坦言，他受人所雇，从曼谷民武里的商店购得化学材料，之后在房间里用这些材料制造了爆炸物。民武里的监控摄像头曾拍到米尔艾力在7月21日及8月12日两次到商店购买化学材料。

据其供述，他在8月17日袭击发生当天完成了爆炸物的制作，随后前往华龙蓬 (Hua Lamphong) 火车站，将装有爆炸物的黑色背包交给一位黄衣男子。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黄衣男子将背包放在长凳下后迅速离开，随后爆炸发生。

米尔艾力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名黄衣男子，也不认识其他涉案人。据其所述，一名化名为艾山 (Ishan) 的男子在袭击策划中承担了分配任务的主脑角色，他通过社交网络 WhatsApp 向米尔艾力下达采购材料及运送爆炸物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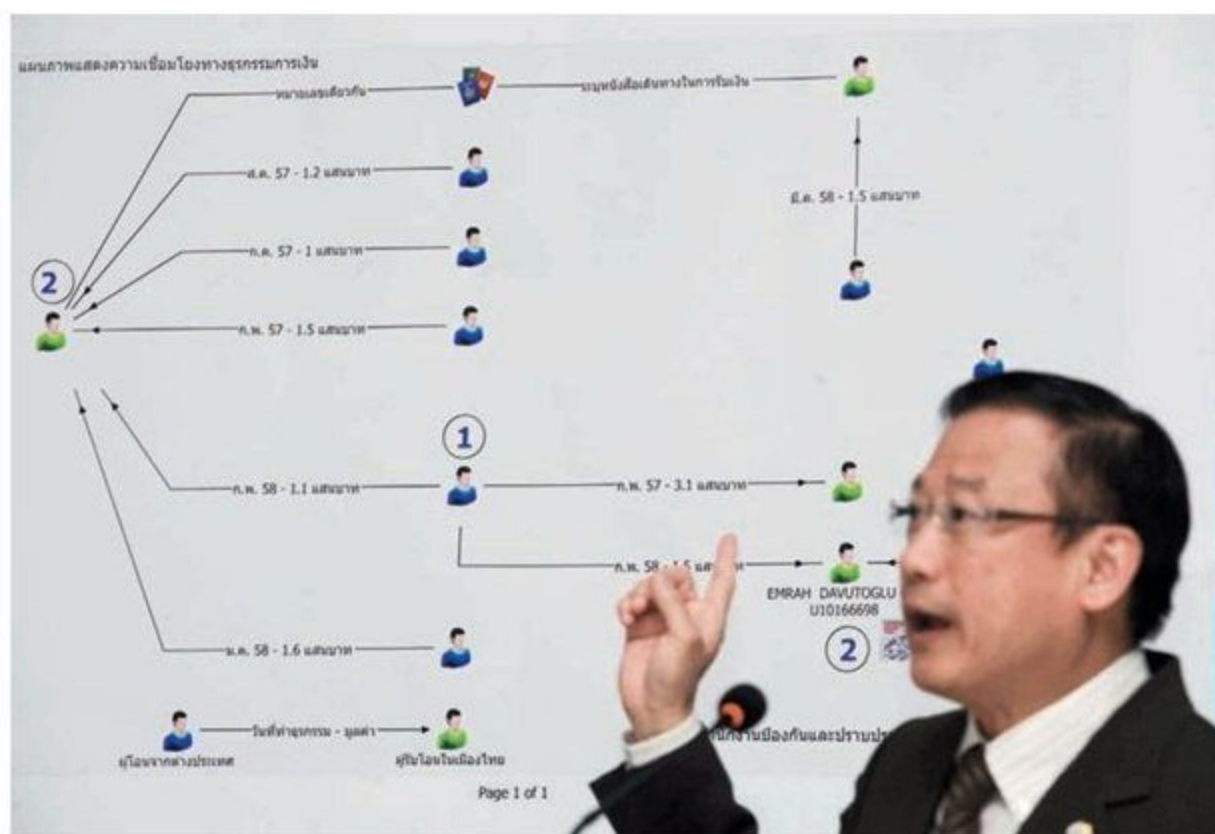
警方指出，艾山在袭击发生前日离开泰国，前往孟加拉，一度被认为逃往中国。但泰国及孟加拉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他于8月30日离开孟加拉，经新德里及阿布扎比，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但一名土耳其政府高层官员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没有疑犯进入土耳其的记录，并称“我们现在想知道，泰国政府为什么坚称土耳其公民和袭击有牵连。截至目前，和土耳其有关的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之后据《曼谷邮报》报道，艾山持有中国护照，曾多次进出泰国。其护照显示，艾山全名为 Abudurehman Abudusataer，27岁，来自中国新疆。目前，泰国警方正在全力对其实施追捕。

除此之外，一位叫萨瓦纳 (Wanna Suansan) 的泰国妇女及其丈夫也遭到通缉，被捕疑犯藏身的公寓为她所有。泰国反洗钱机构查

1/2015年9月4日，第一位被捕的曼谷爆炸案嫌犯阿德姆·卡拉达被送到曼谷市中心的大都会警察局进行法医测试。

2/2015年9月8日，第二位被捕的嫌疑人米尔艾力·玉素甫在泰国警方的陪同下前往位于曼谷市郊 Nongjok 区的公寓指认现场。他的指纹与警方在首名被捕疑犯住所发现的含爆炸物容器上的指纹吻合，身上还持有一本签发地为新疆的中国大陆护照。



↑ 2015年9月11日，泰国反洗钱办公室主任希哈那解释四面佛及沙吞码头爆炸案背后的资金链。

明，萨瓦纳与丈夫的银行账户从今年2月开始有外币汇入，款额有时高达40万泰铢。据调查，萨瓦纳丈夫的账户收过四次汇款，最后一次在8月17日，即爆炸案当日。而从今年2至3月汇入账户的款额共逾100万泰铢。

但萨瓦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否认涉案并对自己被列入嫌疑人名单表示“震惊”。她承认，被警方搜出制造爆炸物的公寓是由她出租的，但强调已搬离上述公寓近一年。她在三个月前来到土耳其，目前与丈夫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她表示正与泰国警方接触，并乐于回国协助调查。而萨瓦纳也是爆炸案调查至今，唯一的泰国籍嫌疑人。

截至目前，泰国当局已就此案

发出12张逮捕令。9月16日，泰国警方表示，已经确认了在四面佛附近放置炸弹黄衣男子的身份，他曾多次持中国护照进入泰国，相信作案后已潜入马来西亚。负责调查的警长称，如今他很可能已经离开了马来西亚。而据《曼谷邮报》报道，上述黄衣男子进入泰国时所持的护照显示他来自新疆。

案发后，泰柬边境的5名移民事务警察被调离岗位，据美国《外交官》杂志披露，这5名警察此前接受了第一名落网疑犯的贿赂，在没有适当旅行证件的情况下，将其放入泰国境内。

泰国警方的含糊表态

由于有外国人在袭击中大量伤亡，泰国警方对案件的侦办从一开始就处在国际聚光灯下。然而，泰国警方对案件信息的披露显得颇为含糊，甚至混乱不堪。自案发以来，泰国警方一直拒绝将爆炸归类于恐怖袭击，并且审慎回应有关外国人涉案

的问题。

爆炸案发生之初，警察总长颂育被问及此次袭击是否有外国人参与时表示：“我从未说过这是一次由外国人犯下的罪行。我所说的是，警方会对每个侦破方向都给予同样的重视，直到有足够的证据指向其中一个，或者直到案犯被逮捕。”他甚至说，嫌犯可能通过对面部进行伪装，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外国人，因此“不会回答媒体任何可能引发国家间矛盾的问题”。

首名疑犯落网之后，颂育说：

“他（疑犯）是一个外国人，但不像是一个跨国恐怖主义者，而是报私仇。他因为朋友和家人的遭遇而愤怒。”泰国外交部长塔纳萨上将则呼吁媒体应对文章负责。“你们应该等待官方的调查，等待证据……我不会提及任何一个国家、群体或宗教的名字。”

泰国当局的态度显而易见——将爆炸事件作为国内事件低调处理，避免被扣上国际恐怖主义的帽子。

据《纽约时报》报道，泰国领导人下令政府官员将此次袭击定性为“干扰”（disturbance），并命令政府部门“避免使用诸如‘恐怖主义’（terrorism）或‘蓄意破坏’（sabotage）”等词语进行描述。泰国内政部也要求官员避免“提及此次事件与维吾尔人的任何关联，以避免制造新的问题，放大国际影响”。

因此，泰国官方持续强调，袭击者是出于个人动机或“个人复仇”。根据颂育的说法，袭击者发动爆炸袭击是为了报复泰国警方对人口走私活动的打击，他甚至将一个月前泰国驻伊斯坦布尔领馆被冲击一事也归结为相同原因——“人蛇集团”的报复。

外界认为，泰国之所以回避维吾尔人和恐怖主义出于多方面考虑：首

英国安全问题专家戴维斯认为，此次袭击很可能是由多个组织团体，包括泛突厥主义极端团体、境外恐怖组织中的维吾尔人以及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蛇集团，联合谋划后实施的。

先是为了不伤及本国的经济支柱：旅游业。泰国当局尤其不希望吓跑中国游客——一个迅速增长且有消费能力的群体。2014年5月，经过长达数个月的动荡之后，泰国军方宣布接管政权，军政府誓要使国家重归稳定。因此，军政府希望迅速地解决此案，以示其有能力维持首都的治安与秩序。同时，当局也对爆炸事件可能对旅游业产生的影响非常警惕。

9月11日，泰国旅游业协会主席伊提立表示，今年9月中国游客受曼谷爆炸案影响或减少20%-30%，

“但这只是短期效应，如国内无恶性事件发生，今年第4季度将恢复正常”。

“目前对国家形象最要紧的事是重塑人们对安全的信心，”泰国文化部长威拉·诺帕那拉对媒体宣称，“要恢复(泰国)人民和游客的信心。”

另一个顾虑在于，泰国政府不想因提及维吾尔人因素而伤及与北京的关系。泰国政府曾对取道本国的维吾尔偷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去年军方通过政变接管政权后，泰国政府希望能提升与中国的关系。

去年3月，泰国警方拘留了约300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他们欲取道泰国偷渡往土耳其。土耳其外交部长曾公开表态，愿意庇护这些被拘留的维吾尔人。经过数月交涉，泰国政府采取折中方式，批准其中的173名维吾尔人于6月30日前往土耳其，被批准者主要为妇女和儿童。剩下的109名维吾尔偷渡者在7月9日被遣返回中国。消息公开后，一些愤怒的土耳其人打砸了泰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馆。

联合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布都卡德尔·亚甫泉甚至对实施遣返行为的泰国发出威胁：“对泰国的罪行，我们会寻找适当的

时机反击，这是不可饶恕的。”

许多安全专家认为，此次发生在曼谷的爆炸案，很可能是针对此次遣返的报复。而这恰恰是泰国军政府最不愿意面对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分析认为，任何将爆炸案与遣返维吾尔人一事联系起来的线索，都可能将军方置于批评声浪中——人们会认为，军政府的外交政策招来了对四面佛的袭击。

凶手究竟是谁？

不过，“人蛇集团”复仇的故事，有着显而易见的漏洞。英国简氏信息集团安全问题专家戴维斯(Anthony Davis)撰文指出，“任何一个犯罪集团在面临执法机构的打击时，通常的做法是保持低调，等风头过后重新开张，而不会用一场可怕的恐怖主义暴行使事态持续激化。”

另一个可疑之处是，如果袭击只是为了报复警方破坏“人蛇集团”的生意，何必选择中国游客众多的四面佛作为目标。戴维斯认为，挑选四面佛作为目标，可见袭击者希望尽可能多地伤害中国游客——因此这次的复仇不仅针对泰国，也针对中国。

由于至今尚无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海外舆论对袭击者身份的猜测从未停止。军政府的政治反对派、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者、同情维吾尔人的土耳其右翼团体“灰狼”、维吾尔人的极端组织，都在这份嫌疑名单上。

对此，戴维斯指出，“我从未见过这样针对外国人的杀戮，泰国政治团体不会以外国人为目标。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此次袭击不是由泰国任何一支政治派别发起的。”此前泰南分离主义者的袭击通常规模较小，并且从无在泰南以外地区发动袭击的记录，也没有袭击游客的历史。

曼谷爆炸案时间线



8月17日 19点

曼谷市中心四面佛景点发生爆炸，20人遇难。

8月18日 13点

一枚爆炸物在 Sathon 码头附近河面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表示，该枚炸弹与前一日在四面佛的炸弹属同一类型。

8月31日

阿德姆·卡拉达供称他使用了假护照，但在支付约2万泰铢的赎金后，获得沙缴府移民局职员放行。同日，泰国警方将泰国籍女性 Wana Suansan 列为爆炸案嫌犯，但该女子否认涉案。

9月1日

第二名嫌犯米尔艾力·玉素甫在泰柬边境地区被捕。他身上持有中国护照，签发地为新疆。

9月7日-9日

米尔艾力·玉素甫配合警方进行犯罪现场重现。



9月12日

泰国警方对曼谷爆炸案的主要组织者 Abudurehman Abudusataer (艾山) 发布通缉令。据信艾山在8月16日离开泰国前往孟加拉，后于8月30日离开，经新德里和阿布扎比转机，于8月31日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9月14日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立德在吉隆坡表示，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3名嫌犯以协助泰方调查爆炸案。

9月15日

泰国警察总长在记者会上表示，爆炸案是帮助中国维吾尔族偷渡赴土耳其的人口走私集团，为报复取缔而犯案。

9月16日

泰国警方表示，已经确认在四面佛附近放置炸弹的黄衣男子身份，他进入泰国时所持的护照显示其来自中国新疆。

来源：综合网络资料，2015年8月17日-9月17日



↑ 2015年9月4日，已修缮完毕的泰国首都曼谷四面佛神庙举行宗教仪式，为民众和国家祈福。

土耳其的“灰狼”成员在打砸泰国驻伊斯坦布尔领馆时表现得很激进，但其所属党派“土耳其民族主义行动党”是国内主流政党，对其活动有一定约束力。而近年来“灰狼”除了在街头与反对者发生冲突外，并未实施任何恐怖暴力行为。

更多的猜测集中在维吾尔人的极端组织身上，例如“东伊运”组织。不过，有人对维吾尔分离主义者能否组织起这样一次高技术含量的袭击表示怀疑。毕竟“东突”组织在过去针对平民的袭击中，技术含量普遍不高，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往往是一把砍刀。而在历史上，“东突”组织从未在中国之外发动过袭击。

“他们没有能力去组织这样的行动。如果真是他们干的，这也算是

泰国当局的态度显而易见——将爆炸事件作为国内事件低调处理，避免被扣上国际恐怖主义的帽子。

他们在能力上的一次大跃进。”英国记者大卫·艾默 (David Eimer) 在土耳其媒体撰文说。《外交官》杂志也提到，遣返泰国维吾尔偷渡者发生在7月，而袭击在8月紧随而来，“一个月要策划并实施这样一场复杂、缜密的袭击，对如今式微的‘东突’组织而言，难度非常大”。

因此，戴维斯认为，此次袭击很可能由多个组织团体，包括泛突厥主义极端团体、境外恐怖组织中的

维吾尔人以及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蛇集团”，联合谋划后实施的。

“如果此事确为维吾尔极端主义者所为，将是已知发生在中国境外的首起维吾尔人实施的恐怖袭击。”

《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一事态的发展或将威胁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的安全。“这起爆炸事件意味着维吾尔人中的极端主义者放弃了此前的一贯做法，即使用刀具作为袭击工具。如果维吾尔人是幕后主使，他们可能得到了精通炸弹制造的盟友的帮助。”

《曼谷邮报》则发文呼吁，现阶段各国进行反恐合作“不仅值得，而且必要”，然而“(泰国)当局仍然不愿意以开放的姿态，从他国处寻求有效的援助和建议”。🌀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俄“远东梦”且行且艰

俄罗斯学者指出，目前影响中国企业参与俄远东开发热情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安全问题及土地租赁问题。在系统解决所有问题之前，中国投资商不会大批过来。

特约撰稿 / 吴敏杰

9月初，为期三天的首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落下帷幕。闭幕式上，俄政府副总理兼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总结说：“本届论坛共签署80多个、总额超过1.3万亿卢布的投资合同。这是个不错的结果。”

虽然1.3万亿卢布与8月31日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卡透露的4.7万亿卢布签约总金额预期相差很远，但借助该平台展示俄远东经济开发项目的目的显然已达到。有俄媒评价道，“官方在论坛上宣布的一些大型项目实际上都是早已定下的‘面子活儿’，为俄远东超前发展区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招商引资，才是论坛举办方的真正初衷。”

打造超前发展区

为落实去年12月出台的“俄联邦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法”，9月2日俄政府下令在远东发展部属下成立两个独立的非商业组织：远东引资与扶持出口署及远东人力资源开发署。前者负责招商引资、刺激和推动远东地区企业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后者负责综合解决远东联邦区的投资项目和劳动力资源，并通过吸引外来定居者，实现向远东地区的移民。

2013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咨文时首次提出在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建立“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

（下称超前发展区）网络，为包括出口导向型企业在内的非原材料生产企业提供特殊条件。按当时的说法，对入住这些区域的企业应实行5年减免利润税、土地使用税和财产税等税收方面的政策，通过实施这些优惠政策创造可与亚太主要商业中心地区相竞争的营商环境。

普京提出相关建议后，远东发展部开始研究中国、韩国及日本的相关经验，并参考日本战略经营区政策，筹备超前发展区法案。2014年12月29日，普京签署《超前发展地区法》，该法于2015年4月1日生效。按照规定，在该法实施的前三年只能在远东地区设立超前发展区，第三年后将适用于俄联邦的其他联邦主体。计划第一步在远东地区设立14块该类超前发展区。根据《超前发展地区法》所规定的优惠政策，免除联邦利润税（利润税为20%，联邦征收2%）五年，前五年的地方利润税不超过5%，后续五年不超过10%。

由于远东市场容量有限，俄远东发展部从最初拟定的14个超前发展区方案中筛选出9个。

由于进驻超前发展区的公司将享有关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引起亚洲和澳大利亚投资人的广泛兴趣。加卢什卡表示：“自颁布《超前发展地区法》以来，我们发现外国投资者的兴趣发生了质变。俄罗斯的投资者也表现出极大兴趣。”

今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届RASIA国际创新论坛上，加卢什卡指出，该部已与亚太地区的“大投资方”签署了超过20个备忘录。而吸引直接投资司司长通基赫也透露，今年年底将有至少5家境外企业进驻超前发展区。针对俄政府推出的超前发展区机制，俄“费纳姆”投资控股公司分析师瓦库连科指出：“远东因自然资源丰富以及邻近发展迅猛的亚太地区拥有很高的经济潜力。政府正在通过包括建立超前发展区刺激经济活力的特别方式来发挥这些潜力。”他认为，俄有加快发展某一地区的经验，即索契筹办2014年冬奥会发展机制。

俄“金融鉴定”公司副总经理巴依穆拉托夫则认为：“政府希望借鉴亚太地区最成功国家的经济特区经验，通过创立具有一整套特惠政策的超前发展区等方式，将为投资者在远东创造有利的投资条件。”不过他认为，与索契不同的是，俄此前的地区发展方式效率均不高，现在谈远东实施鼓励投资措施的成效为时尚早。

人口和基建难题

“设立超前发展区并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在吸引亚洲投资者方面，可谓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日本东京基金会俄罗斯项目主任阿比鲁在接受俄《生意人报》采访时说。不过他同时指出，“划定特区在

俄联邦社会经济超前发展区

今年6月26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正式启动首批三个超前发展区

1 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位于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投资6.2亿美元，重点是建立新企业，将在冶金、运输和物流领域新增3000个工作岗位；

2 共青城超前发展区，位于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投资2.1亿美元，发展航空产业园，将在飞机制造业创造超过3000个工作岗位；

3 纳捷日金斯卡娅超前发展区，位于滨海边疆区，投资1.2亿美元，重点是交通物流和农业开发，将在运输、物流以及食品加工工业创造1600个工作岗位。



↑ 2015年9月5日，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来自中国西北省份的代表出席首届东方经济论坛。据悉，此次中方参会企业总数约150家，成为该论坛的最大参会国。

政府吸引境外投资和引进技术的政策中并无新意。因此外国公司还需要在实践中观察，俄在远东设立的超前发展区与经济特区到底有何不同。”

相比而言，日本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贸易协会主任冈田邦夫则显得很悲观：“就目前而言，俄远东地区作为生产基地对日本企业是没有吸引力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稀少、市场规模小且劳动力成本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即便俄政府有能力改善商业环境，招商引资也相当困难。”

“人太少了！”加卢什卡并不回避远东开发面临的人力困境：“很明显，从中长期看这是主要限制因素之一。”据他介绍，为扭转远东人口状况，政府已决定出台远东土地免费配发法案，计划从2016年起为迁居远东的俄公民免费租赁1公顷的土地，租期5年。承租人可在该地块从

事任何合法活动，如对其加以利用，租期满后即可获得土地所有权，否则将被收回。

这一政策似乎颇具吸引力。今年7月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实施免费土地配发政策，可考虑永久性移居远东，其中愿意移居人口中青年人所占比例超过50%。根据这一结果，加卢什卡推测：“免费土地配发政策将成为俄开发远东土地的强力举措，也能让当地人口实现根本性增长，增幅有可能达到5倍，即从640万增至3600万。”

基础设施落后也是制约俄远东开发的老大难问题。为此，普京在前年提议建立超前发展区后，又在去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承诺赋予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简化海关制度”的自由港地位，目的是把它打造成远东

地区类似于香港和新加坡那样的运输和物流中心。

7月14日，普京正式批准由杜马讨论通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案》。根据该法案，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未来70年内实施自由港制度，而且该期限可以延长。它包括四个区域：港口和机场区、工业区、科学促进区和旅游休闲区。

该法案规定，在自由港区域实施8日内“落地签”、自由关税区和入驻企业税收优惠制度。入驻企业开始赢利后的前五年将可享受5%最小利润税，随后5年为12%。其中入驻企业税收优惠包括免征房产税和土地税，预算外基金提留比例也从30%降低到7.6%。加卢什卡说：“这是对投资者的一种特别保护。管理公司不仅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还是诉讼过程中的‘政府监察员’。”

目前,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已引起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兴趣。据俄媒体透露,中俄两国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建设框架内,加紧推进俄滨海边疆区与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相连的“滨海1号”和“滨海2号”运输走廊建设,完善与俄远东地区港口的中俄跨境陆港通道,并着手打造“中俄中”(双向)、“中俄外”(双向)运输模式。

据悉,“中俄中”(双向)运输模式是指从牡丹江或绥芬河将国内货物运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再运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运输方式,反向亦然;“中俄外”(双向)运输模式是指将东北亚地区国家或美洲的货物运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再运至牡丹江或绥芬河的运输方式,反向亦然。

中国的机遇与风险

作为俄远东招商引资的一项标志性举措,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外穆拉维伊纳亚湾滨海博彩特区的首家娱乐综合设施Tiger de Cristal计划9月开业。据滨海边疆区旅游局局长舍斯塔科夫介绍,围绕滨海博彩区建设项目,目前已签署22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联邦政府迄今拿出650亿卢布用于博彩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设拥有120间客房的赌场酒店。

滨海博彩区由澳门凯升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东方第一博彩公司承建,项目投资由世界最大的赌博业代表美高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和金界控股集团负责。根据建设规划,这里将建设16家3-5星级宾馆(含赌场)、游艇俱乐部、可容纳65艘船舶的码头、高山滑雪道、贸易展览中心、行政办公中心和其他设施。

滨海博彩区赌场税率仅1%,远低于澳门赌场的39%,优惠的税收政

策引来新的投资巨头。据称,博彩区第二家投资商钻石财富公司已计划在2016年上半年开始建设金门综合娱乐中心,第三家投资商皇家时代集团预备在这里修建一座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的“火鸟”综合度假区。“选择这个名字不是偶然,火鸟或者凤凰是一种在烈火中重生的鸟,对亚洲文化来说具有象征意义。”负责该项目的美国Steelman Partners事务所欧洲项目负责人别林斯基解释说。

俄“费纳姆”投资公司分析师尼格马图林认为,出色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亚洲潜在客户,滨海博彩区在俄同类特区中将最具发展前景。而俄远东发展部的研究数据显示,滨海博彩区收入估计可达12亿美元,未来十年后可增至52亿美元。

面对俄开发远东的热情,中国同样给予积极回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庞大代表团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外,还率团出席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方合作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东方论坛举行期间,中国举办了第二届北京国际经济论坛(BIEF-2015),主题为“俄罗斯-中国·两国同心,互利共赢”。

短短几天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重大合作与投资协议,其中包括:中石化和俄石油《共同开发鲁斯科耶油气田和尤鲁勃切诺-托霍姆油气田合作框架协议》,中石化购买俄天然气加工及石化产品公司西布尔集团股份的签订战略投资协议,中国华泰汽车公司与俄罗斯卡玛斯签署了成立联合企业的协议,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俄远东发展部在远东阿穆尔共青城超前发展区投资建设航空装备工业园协议等。

对此,俄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拉林指出:“此前俄中双方已在

此前中俄双方已在远东展开部分合作,在东方经济论坛上签署的项目说明双方的合作迈入务实阶段。未来随着这些新项目推进,它们或将发育成中俄合作的新亮点。

远东展开部分项目,在东方经济论坛上签署的项目说明双方在远东地区的合作迈入务实阶段。未来随着这些新项目推进,它们或将发育成俄中合作的新亮点。”

不过,由于中俄两国法律、环境、经济运行机制等的不同,中国企业参与远东开发也存在风险和挑战。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夫多库申指出,目前影响中国企业参与俄远东开发热情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安全问题及土地租赁问题。“有人认为要缩短租赁时间,这样对农业生产非常不利。”阿夫多库申认为,“在系统解决所有问题之前,中国投资商不会大批过来。”

阿夫多库申还以同江大桥建设工期严重滞后来说明俄远东地方行政当局的官僚作风。同江大桥是连接黑龙江省同江市与俄下列宁斯阔耶的中俄首座跨黑龙江的铁路大桥,于去年2月动工,目前中国境内段早已完工,但俄方一直以缺少资金为由尚未开工。据阿夫多库申透露,实际上他们不是缺钱,而是当地政府拿联邦政府的部分拨款去干了别的事情。“我觉得当地政府根本不够重视,(他们)觉得没有大桥也没问题”。

另据俄罗斯《导报》9月8日报道,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透露,中国“丝路基金”近期将向俄罗斯提供大笔投资,投资项目之一就是同江大桥。“而这意味着这将是中俄合作项目,而是中国单方项目。”

□ 编辑 涂菲 □ 美编 虎妹



澳洲政坛再遇“知华派”

澳洲媒体称，陆克文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国家领导者中最了解中国的人，而特恩布尔对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理解丝毫不输于陆克文，更可能在他之上。

特约记者/蔡源（发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澳大利亚又一次发生了“宫廷”政变——9月14日晚，通讯部长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成功挑战了托尼·阿博特，成为执政联盟党领袖。在澳洲威斯敏议会内阁制度下，执政党魁顺理成章成为澳大利亚新一任总理。这是澳洲过去两年来的第四位领导人，因而有分析认为，一向政治稳定的澳洲越来越像日本和意大利了，走马灯似的换总理。

“我们确实换总理了，但我们（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有着巨大潜力，我们将共同努力实现这些潜力。”刚刚走马上任的特恩布尔9月1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试图打消外界顾虑。而在这天的议会问答环节，特恩布尔阐述了他的一些政策主张，扩大对华合作是其中一大重点。

特恩布尔上台后，其所属政党自由党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前澳洲

驻华大使、经济学家邵若素（Ross Garnaut）向《凤凰周刊》表示，“特恩布尔纠正了阿博特的错误，他会采用更加温和、中立的对华外交政策。很多中国人认为，前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在华盛顿制定的。”

无所畏惧的人生赢家

特恩布尔与阿博特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悉尼大学和牛津

大学的毕业生、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都信奉天主教，一个较保守而另外一个较自由；都当过记者，甚至在同一家杂志社工作过；两人还均为宪政改革运动中的领军人物——阿博特是坚定的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特恩布尔则是澳洲共和运动的发起人。特恩布尔还曾在杂志上撰文称，“新南威尔士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是20岁的阿博特。”

不同的是，虔诚的阿博特大学毕业不久后就去了神学院，他当时想成为一名神父；特恩布尔则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让他名声大噪的一个案子是1987年在“捉间谍”案(Spycatcher)中为前英国军情六处特工赖特(Peter Wright)担任辩护律师。

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想阻止赖特出版回忆录，因为他在书中指责前军情六处处长Sir Roger Hollis是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法庭内，特恩布尔质问时任英国内阁秘书长卢杰·阿姆斯特朗爵士，让其解释什么是“误导性印象”和“撒谎”。在特恩布尔连珠炮的问题下，这位久经沙场的英国高官颜面扫地。

特恩布尔的这次胜利迫使英国政府推动了一系列关于情报部门的改革，而此时的他还不到30岁。英国剑桥大学情报史专家Christopher Andrews评价说，“特恩布尔太出色了，女皇陛下的政府从来没那么丢过面子。”

澳洲前总理保罗·基廷同样对特恩布尔赞不绝口，但他指出，“特恩布尔无比聪明，无所畏惧，但是缺乏判断力。”这位眼光毒辣的工党元老说得没错，特恩布尔在担任反对党领袖时由于急于求成，因一封据称涉嫌贪腐的电子邮件向澳前总理陆克文发起攻势，但事后证明文件系伪造，导致自身名誉受损。

因“捉间谍”案一战成名后，特恩布尔开始担任澳洲富豪帕克家族旗下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此后，特恩布尔开始了商人生涯。和在学术、新闻和法律领域一样，他很快达到了商业的珠穆朗玛峰。

1994年，特恩布尔投资了一个名叫澳伊媚(Ozemail)的公司，这也是澳洲历史上第一个互联网服务公司。五年后，当初50万澳币的投资翻了114倍达到5700万澳币。1997年，特恩布尔加入全球著名投行高盛集团，担任澳洲区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一年后成为高盛全球的合伙人。

虽然一路顺风顺水，但特恩布尔内心的最终夙愿还是进入政坛。据其一位前同事回忆，某次跟特恩布尔谈到竞选首相的话题时，“平时循规蹈矩开车的他似乎被一股电流刺激到，突然开始加速”。

其实早在1981年，特恩布尔就有意参选议员，但初选时没能成功。直到2004年，他才成为悉尼Wentworth区的自由党候选人，并在大选中成为议员。之前他还担任了自由党智库的主席。他的政治理念属于中间派，更接近19世纪的英国自由派。

成功进入澳洲联邦议会后，他的政治前途也是平步青云。竞选成功后不久他就成为总理霍德华德的国会秘书，相当于一个副部长级别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一年后他成为内阁部长，负责环保。

2007年澳洲大选，工党领袖陆克文当选总理。2008年，特恩布尔打败时任反对党领袖尼尔森，成为自由党领袖。但后来他由于支持执政党推行的碳税政策得罪了党内保守势力而被迫辞职。值得玩味的是，当时接替他的恰好是阿博特。

心灰意冷的特恩布尔一度考虑离开政坛，但包括前总理霍华德在内

的自由党元老都劝他留在议会。之后自由党重新执政，他被任命为通讯部长，负责建设价值几百亿澳币的国家宽带项目。此后他一直担任该要职，直到最近成功挑战阿博特。

公开批评美国对华政策

对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澳洲政治家应该是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前总理陆克文。老陆不但会讲中文，而且有一位中国女婿。这位新总理虽然不会中文，但曾在中国投资矿产，还有一个中国儿媳。早先有澳洲媒体爆料特恩布尔的亲家有中共高官背景，最后被证实只是中国社科院的学者。

离开自由党领袖位置后的2011年，特恩布尔在英国和澳洲发表了两篇对华外交的讲话。在伦敦政经学院，他发表了主题为“同床异梦，亚洲崛起的澳洲视点”的讲话，基本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势力虽然在不停增长，但是除了想统一台湾之外，并没有扩张主义的打算。

特恩布尔还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中国的评价说，和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兴趣出口价值观。他还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进出口占到GDP的55%，如果发生战争，中国将会是最大输家。对于未来的东亚格局，他认为，将来最现实的是各国之间达成战略平衡，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家独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怀特提出过解决中美在亚太地区可能发生冲突的方案，并表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和中国在亚太地区分享领导权”。

对此，特恩布尔表达了异议，称更赞同基辛格的观点，即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加，中美两国会在

2015年9月15日，特恩布尔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后，抱着孙子和家人合影留念。此前澳大利亚联邦自由党通过党内投票，特恩布尔以54比44的票数击败阿博特，挑战成功担任党领袖，也自动成为新任总理。

澳大利亚政党轮换(2013-2015):



朱莉娅·吉拉德
(Julia Gillard)
◆ 2010年6月24日—2013年6月27日
◆ 来自 工党



陆克文
(Kevin Rudd)
◆ 2013年6月27日—2013年9月18日
◆ 来自 工党



托尼·阿博特
(Tony Abbott)
◆ 2013年9月18日—2015年9月14日
◆ 来自 自由党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
(Malcolm Turnbull)
◆ 2015年9月14日当选
◆ 来自 自由党

过去24年,澳大利亚共有3位总理被自己所属政党和同僚“抛弃”,包括1991年基廷取代霍基、陆克文和吉拉德之争,以及本次特恩布尔取代阿博特。基廷政府在1993年赢得大选,是工党换党后唯一成功的一次;吉拉德击败陆克文组建少数派政府,最终输掉大选;陆克文反击成功再任总理后,2013年也不敌自由党而败选。

不知不觉中达成一种力量平衡。“一定角度来说,华盛顿对中国的关注相当于承认了中国的地位。”

两个月后,他在澳洲也发表了类似演讲。不同的是,这次他公开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发言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洲议会高调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表示2012年起将向澳北部首批增派200-250名海军陆战队员,最终规模达2500人。

特恩布尔认为,澳洲政府对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是不合适的,“奥巴马对华秀肌肉的发言适合他在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但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他还警告本国政客,不要因为向自由世界的领袖抛媚眼而忘记澳洲的国家利益。“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的失业率是美国和欧洲的一半,这都靠中国所赐。”

这两次演讲也给其引来不少非议。澳洲知名外交评论员、《澳大利亚人》编辑 Greg Sheridan 批评说,“特恩布尔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但不是自由党的主流价值,同样也不是澳大利亚的主流价值。这两篇演讲只能证明他是个糟糕的党魁。”

熟稔中国近代史的人

2015年,随着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改变,特恩布尔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最近一次

澳美领导人对话论坛上,他公开批评中国在南海强硬的外交政策,并称“中国处理海洋领土纠纷的强硬方式是适得其反的,中国的行为会让其邻居认识到,他们是多么需要美国在该地区承担战略平衡力量”。

即便如此,由于过去的表现,特恩布尔仍被大陆媒体冠以“亲华”标签,并被评价为“在中国话题上思考深、说话也有水平,表现出熟稔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澳大利亚《商业评论》更称,陆克文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国家领导者中最了解中国的人,而特恩布尔对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理解丝毫不输于陆克文,更可能在他之上。

2014年,特恩布尔出席澳大利亚-中国商务周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中国是澳大利亚在二战时的坚实盟友,如果不是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二战的历史有可能被改写。这番发言在澳洲华人圈产生轰动。一位华侨当即流下眼泪并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澳洲政治家理解并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

今年8月6日,当日本民众纪念广岛原子弹轰炸70周年之际,特恩布尔在悉尼洲际酒店发言时再次说到同样的主题。“没有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坚韧和勇气,我们的战争历史将以完全不同的形式结束。”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在敌人已经抵达我们家门口、

我们的城市遭受直接的军事袭击之时,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是我们坚定的盟友。”在9月北京举办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堪培拉派出了部长级代表出席。

特恩布尔这番发言的灵感来自于牛津大学学者拉纳·米特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友》。除了对中国军民在二战中的牺牲表达敬意外,他在2011年的发言中也对鸦片战争表达了同情,“你们能够想象哥伦比亚毒枭把军舰开到华盛顿,迫使美国政府取消禁毒署吗?”与之相比,前总理阿博特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时,大力赞赏日本军人的荣誉感和技巧。当时他的言论引起华人社区和澳洲退伍军人的强烈不满。

而在9月15日的议会问答环节,刚刚成为总理的特恩布尔初步阐述了他的政策主张,还高度评价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他敦促澳大利亚人抓住机遇,并特别敦促议会通过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一自贸协定“是关乎澳大利亚未来繁荣的重要基石之一”。

分析人士表示,在政策方向上,特恩布尔更加收敛在意识形态上的关注,并倾向于务实的途径。因此,可以预料他将较少关注社会保守人士关心的事项,而是全力重振经济,抑制住现在美国和欧洲出现的趋势。●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FENDI



产品垂询热线: 8621-53859078

日美部署水下监听系统剑指中国

虽然冷战期间日美曾在津轻、对马海峡部署过监视苏联潜艇的旧版SOSUS，但提及存在针对中国潜艇的SOSUS尚属首次。

特约撰稿 / 田聿

9月9日，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及海上自卫队消息人士的话说，为应对越来越活跃的中国海军，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以冲绳为据点，部署大范围水下声呐监听系统（SOSUS），理论上可覆盖“第一岛链”中西南诸岛的水域，探测经由东海、黄海进出太平洋的中国潜艇。共同社强调，虽然冷战期间日美曾在津轻、对马海峡部署过监视苏联潜艇的旧版SOSUS，但提及存在针对中国潜艇的SOSUS尚属首次。

SOSUS并非“新鲜玩意”

据日本海自干部透露，SOSUS是在海底敷设电缆，通过水下听音器来搜集潜艇发出的声纹、磁场数据，继而通过复杂的运算和数据集成，探测水下目标的行动轨迹。沿西南诸岛部署的最新式SOSUS以冲绳县宇流麻市美军白滩基地内的海自冲绳海洋观测所为据点，两条电缆由此向海底延伸数百公里，分别指向九州南部和台湾海域，每隔数十公里就会设置一台水下听音器等传感器。

据日媒透露，曾当过潜艇声呐员的海自干部及美国海军军人、文职人员在观测所工作，全面共享SOSUS所搜集到的情报。最新型SOSUS被视为“日美安保体制内的最高机密”，铺设时间不得而知，海自也仅向首相、防卫大臣等少数政要透露了概要。

有军事专家指出，SOSUS其实没有那么玄乎，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显露雏形。当时为了应对苏联迅猛发展的潜艇力量，严密守卫绵延的海岸线，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太平洋底“打主意”，研制并铺设一种固定阵列系统，专门监听水下潜艇的动静。

1954年第一批阵列系统下水，安置在美国东海岸外缘的大陆架上，此后SOSUS网络日益扩大，把格陵兰、冰岛和英国三者之间的水底空隙结合部全都覆盖起来，这恰恰是苏联潜艇驶往美国的必经之途。上世纪60年代后期，该系统得以进一步改进，铺设范围也大为增加。从美国顶端的阿拉斯加开始直延伸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又从太平洋沿岸再向外伸展，形成一圈长达2000公里的环形地带，连夏威夷也包含在内。另外还有一套阵列系统，也是从阿拉斯加开始，由阿留申群岛一直贯通到千岛群岛西侧。这一套阵列系统掌握了当时苏联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军基地驶出的潜艇动静和在鄂霍次克海潜艇的出海情况。

从共同社披露的信息看，最新版SOSUS结构上与旧版区别不大，只是通过灵敏度更高的传感器、运算能力更强的计算机来完善系统功能。据分析，美日联合操作的SOSUS设备包括一整套阵列系统，其中涉及数以千计的水下监听器。只要将这

些水下监听器逐个放在水底传达声音效果最佳的部位，然后用水底电缆把它们串连起来，从任何远处传来的水下声浪，只要一进入这个阵列系统的范围，都会被水下监听器察觉。而根据不同水下监听器先后察觉的顺序，还能判断声源的方向。

就海洋监视系统而言，音响监视系统比雷达要强，因为一般雷达测不到海平线外的水面舰，但水却是很好的传音介质。像美国海军常用的SQR系列舰载拖曳阵声呐，整个缆线拖出去有1900米长，听音器段就长达900米，沉在水下2-3米，就可以确定两百海里开外的舰艇方位，是雷达探测距离的六七倍。如果换到体系更复杂的SOSUS身上，探测距离和精度更会上一个台阶。

在作战使用上，SOSUS主要通过电缆将水下监听器密闭盒相互连接，每盒内置几十个监听器。监听器收到信息后，由电缆网传至岸上设备，经加工整理成为可用的情报。经加工整理过的情报信息，再通过陆地线路或者舰队卫星通信系统传送到主要评估中心，中心将各处送来的情报信息集中、印证、核实、并联，然后定出重点，追踪潜艇目标。

根据素材加工后的情报积累，逐步掌握对手潜艇或水面舰的声呐回声，发动机、冷却系统和螺旋推进器转动时所产生的不同噪音特点，译析并归纳成为进一步辨认和识别的

音响监视阵列系统(SOSUS)

该项目刚开始研究时代号是“凯撒”，最早是由美国海军所提出的一种声呐系统设想，委托贝尔电话电报公司负责研制和安装。最终目标是沿着海床、海底岩石和大陆架、全面铺设长串的传感器，并相互联结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监听体系。

信号依据,从而通过声音就能很快知道对方是什么潜艇,甚至还能进一步辨认出是“某某号”。

此前有本港杂志透露,围绕SOSUS声呐数据分享,美日还曾在“数据库”问题上纠缠过。冷战时期,日本海自下北海洋观测所到北海道东部海域也敷设过一条电缆,主要监视苏联潜艇的动向,与美国在“第一岛链”北段配置的SOSUS形成互补。据悉,美方代表曾多次讨要日方声呐数据库,直到拿出一些机密情报作为交换,才换回部分声音档案,并以“Library”(图书馆)代号作为掩护。

中国反击:可复制俄经验

客观而言,SOSUS具备在近百公里半径范围内和远至数千公里的距离内找到潜艇的能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SOSUS性能的研究报告说,只要环境条件良好,即使相隔距离1.5万公里,也能发现那些噪音较大的潜艇所在,范围不出方圆15公里。如果把距离缩短几千公里,同时把潜艇所在范围扩大到40公里,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一找就准。

当然,SOSUS并非“金刚不坏之身”。据专家透露,与SOSUS打过多年交道的俄罗斯海军就采取过积极和被动的反击方式,逐步消弭其“隐性威胁”。从80年代以来,俄海军四大舰队都部署了规模庞大的拖网渔船队,但他们并不是进行捕捞作业,这些渔船配备了特制的电控钢钳,专门搜寻和定位SOSUS的水下电缆,一旦发现就用钢钳扭断系留缆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听音器拿走。除了伪装渔船,俄军的小型潜艇也能到处转悠,专找水听器阵列系统的位置。

据美国退役海军军官透露,俄海军高明到在割断电缆并破坏功能



后,在外观上恢复原状,一点不露破绽,就算美军查出毛病,看起来也是意外事故而非人为破坏。无奈之下,美国海军只好成立一支电缆修复船队,加强巡逻,及时抢修。这支船队的代号是“T-ARC”,由美国军事海运司令部领导。

至于被动反击,俄海军的“撒手锏”是发展高静音潜艇和远程潜射导弹。2012年8月,俄海军一艘971型攻击核潜艇在墨西哥湾的公海水下秘密活动数周,都没有被美国海军的SOSUS反潜网发现,直到离开后才被发现航迹,这表明俄罗斯在潜艇静音降噪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与此同时,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俄制潜射导弹的射程越来越远,这样俄海军潜艇便无需携带导弹、冒风险远涉重洋去逼近美国本土了,只需在家按动电钮就可以给美国以致命打击。

从以上事例来看,中国海军完全可以复制俄海军的成功经验进行反击。共同社援引日本海自干部的话说,中国以海军基地、重要港口为中心,向东海和黄海部署了反潜探测网。美国“战略之页”网站也提到,中

国早在2011年就开始在沿海设置水下被动声呐基阵,暗示解放军已能监测出现在其近海活动的外国潜艇。

本港《亚太防务》杂志称,中国在1996年开始的“十一五”计划中,就纳入“863计划”的海洋监控系统项目,核心是积极推动海洋监测技术的发展。考虑到中国在卫星、水面雷达站台与水下听音设施方面的快速发展,中国海军已初具像美军那样的立体监视侦察能力,特别当“北斗”系统成为国际间第三套被承认的海事卫星导航系统,无疑提高了中国的海洋监视能力。

2014年,中国“竺可桢”号远洋综合调查测量船在印度洋执行搜索马航MH370失联客机任务时,日本《军事研究》杂志就指出,“这不仅代表中国初步掌握该区域布雷、反潜等作战行动所需参数,也包括潜艇要长期侦察巡逻所需的潜航图像资料。”由此可见,中国已释放出在太平洋(“第一岛链”外)与印度洋展开深海潜标基阵布放的信号,未来还将展开进一步的探测行动。

↑ 2014年8月21日,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斯特蒂姆”号的作战指挥控制中心内,美国海军和日本海自成员正在进行反潜联合训练。

俄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情

俄罗斯突然介入叙利亚战事，无疑提高了美国推翻叙利亚政权的门槛，因而也成为了俄美外交博弈的“新戏码”。

特约撰稿/田聿

近几个月来，叙利亚战局出现新变化：美军空中掩护叙温和派武装向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军展开全面攻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和“基地”分支“胜利阵线”（Nusra Front）也加紧行动，消耗叙政府军有生力量。

为了挽救盟友，从9月开始，俄罗斯突然深度介入叙利亚冲突，大批俄罗斯军事人员抵达叙利亚，在叙政府控制的基地内安营扎寨。另外，俄运输航空兵的伊尔-76机群正加班加点地向叙境内输送军需物资。

9月14日，美国五角大楼指称，卫星图片显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城市拉塔基亚附近计划建造一个“转运空军基地”。军事专家称，俄军可能采取空袭和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式，粉碎IS和“胜利阵线”对叙政府军的夹击，维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地位。美方则担心，俄罗斯军方或同在叙利亚活动的美军和盟国发生直接冲突。

俄军未必充当主力

据以色列《DEBKA情报》周刊透露，2014年12月以色列空军袭击大马士革郊区，炸毁叙军新拿到的俄制防空雷达，自那之后，俄罗斯连续多月未向叙利亚提供武器支援，甚至在2015年8月初考虑进一步撤离常驻叙利亚的本国公民。就在外界盛传俄罗斯和伊朗准备抛弃阿萨德时，俄罗斯突然

于8月底快速恢复和增大在叙军事存在，并迅速与一直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政府商议如何联手“护盘”。

按照俄外交部的说法，俄罗斯只是帮助阿萨德总统打击国内恐怖主义，所提供的军援和相关技术人员不违反国际法。但美国认为，俄武装力量“基本可以认定”参加叙国内冲突，“刺激了恐怖主义的蔓延”。

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视频，带有欧洲人特征的军事人员操作着BTR-82A装甲输送车、T-72B3坦克以及设有机关炮的卡车进行射击，而这些武器之前从未出现在叙利亚战场，还恰恰属于俄军制式装备。据悉，自今年8月后，俄罗斯加快向叙利亚交付武器的步伐，阿萨德政权甚至只需交付约4000万美元的订金，就可提取储存在塔尔图斯码头（那里是俄海军物资保障站）S-300PMU2防空系统。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玛利亚·叶菲莫娃指出，俄美围绕叙利亚问题展开新一轮军事对抗，这有可能葬送掉俄罗斯刚刚提出的组建新国际反恐联盟的倡议。但对莫斯科而言，叙利亚局势已经恶化到自己“必须公开出手”的地步了。由于美国加大对叙温和派反政府武装自由军的支持，加之极端组织在叙东部、中南部持续取得进展，阿萨德政府军的“基本盘”已然岌岌可危。鉴于

战况需要，俄罗斯遂以“保卫在叙侨民”和“民间志愿军”的名义，以明暗两手向叙利亚输送军事人员。

路透社援引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搭乘伊尔-76运输机和黑海舰队运输船的俄海军陆战队已完全接管塔尔图斯码头和大马士革近郊的一处军事基地，它们也变成俄军在当地的大本营。

据悉，这些陆战队员来自俄独立第810海军陆战旅，他们曾在2014年“接管”克里米亚的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擅长小分队行动和平叛作战（COIN），是莫斯科实施“混合战争”的绝佳工具。有专家指出，俄军未必充当叙内战的主力，阿萨德更希望他们接手部分战线，集结起足够数量的机动兵力，从而在不同战略方向上实施重点突击，避免被反叛武装“各个击破”。

更重要的是，俄军介入叙地面作战，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使阿萨德乃至他所代表的中东什叶派阵营士气大振。莫斯科则希望通过有限的兵力参战，既解阿萨德之困，又激发叙政府军及其同盟者的战斗热情。

俄美博弈“新戏码”

就叙内战总体态势而言，阿萨德政府军处于四面包围中，只能依托主要公路实施内线机动作战，维持各大战场的联系。美国积极扶植的世俗派自由军只敢在IS等势力的缝隙

中过活，依靠美国领导的多国空军掩护维持生计。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今年6月以来，叙内战焦点开始集中到北部阿勒颇和中部扎巴达尼两个地区——前者由自由军与政府军反复拉锯，IS则在外围囤兵伺机“摘桃子”；后者则是“胜利阵线”与政府军争夺交通线、谋求在叙黎交界地带获得控制权，继而稳定地获得外援。

耐人寻味的是，当俄罗斯8月初显露出抛弃阿萨德政权的迹象时，一直与叙利亚、伊朗保持密切关系的黎巴嫩真主党却突然将其最精锐的拉德万部队投入到扎巴达尼的战斗，将“胜利阵线”驱离贝鲁特至大马士革高速公路沿线。据美国《全球安全》报道，拉德万部队成立于2010年，其名称是为了纪念2008年2月被以色列特工暗杀的真主党秘密战专家阿迈德·穆尼耶（化名拉德万）。该部队接受伊朗革命卫队的严格训练，相关武器全由伊朗包办，是中东地区少有的特战力量。

前以色列哥兰尼旅指挥官本·耶胡达分析，拉德万部队的介入很可能是伊朗与俄罗斯进行协商后做出的决定。受西方制裁，俄罗斯在乌克兰、高加索方向分身乏术，但无论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都不可能接受俄罗斯在叙利亚“离席而去”的损失。因此它们通过主动派遣精兵参战，向莫斯科表达“打到底”的决心，进而刺激俄罗斯采取“有限军事介入”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和以色列，避免阿萨德政权倒台。

俄罗斯、伊朗、真主党三方介入后，阿萨德政权至少在短期内得以维持，这也为后续国际斡旋提供了时间。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拉开“参战”架势，无疑提高了美国推翻叙利亚政权的门槛，因此也成为了俄美外



交博弈的“新戏码”。

叙利亚面临分裂险境

对于俄罗斯的举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尔比9月8日表示，俄罗斯若真想为打击叙境内的极端组织，应立即停止向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援助。

在打击IS的问题上，美国一直选择支持反对派而非叙政府军，因此其担心俄罗斯介入叙内战将使地区局势恶化。但实际上美国在意的是，如果俄全力打击IS等极端武装，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或出现分裂。与此同时，美国也害怕俄军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追剿叙反对派自由军——这支军队虽不堪一击，却是美中情局直接训练的。如果俄军动手，美国是否能像当初扬言的那样“在空中进行掩护”，恐怕也是巨大考验。

然而，俄罗斯国际问题观察员伊莲纳·切尔涅尼科指出，俄美其实都不愿在叙利亚问题上撕破脸皮，双方“秀肌肉”之余也在寻求某种妥协方案。鉴于叙利亚局势复杂，俄政府正在考虑挽救阿萨德的“最终方

案”，即一旦他被反对派从首都大马士革赶出来，俄罗斯将帮助他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袖珍的阿拉维派国家。

但如此一来，叙利亚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将被终结。俄罗斯中东问题研究所所长萨塔诺夫斯基曾预测，叙利亚最终可能肢解成几块飞地或六个国家，比如逊尼派控制区、阿拉维派控制区、库尔德人控制区、基督教控制区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指出，如果阿萨德建立起准军事性质的“阿拉维共和国”，“除了可以保证自身安全，也能确保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东地中海的利益”。

目前阿拉维派占优势的叙利亚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且有两个重要港口——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后者是俄海军基地，随时能得到俄军保护。

另据俄媒披露，以色列私下曾向俄罗斯承诺，它不会阻挠阿萨德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上述阿拉维国家，因为这将使未来叙利亚收复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变得毫无可能，毕竟一个分裂的叙利亚是不可能再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



胡适
(1891-1962)



鲁迅
(1881-1936)



蔡元培
(1868-1940)



钱玄同
(1887-1939)



刘半农
(1891-1934)

知识分子，为解答时代疑惑、解救落后中国与解放禁锢思想所做的诸种贡献和努力。

与西方不同的是，这场启蒙是在列强铁蹄蹂躏之下进行的，带着民族自觉与救亡图存的紧迫和焦虑。今日视来，其部分言论或许带着口不择言的『过激之词』，有失先贤之光辉睿智，然若能明白时人之改造国家与国民之急迫，当能给予同情之理解。

胡适所谓『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乃对新文化人自我要求之高标。然诚如陈平原先生所言，新文化运动是播种的时代，非收获的时代，无需用今日之『典藏』标准来衡量昔时之作品。真正收获的，应该是聪明且勤奋的后来者。

今日，吾辈于此祭奠缅怀，非独为致敬与追忆，更是为时下学人重唤治学为人的标杆，重举激扬文字之风尚，重振自由独立之精神。

陈独秀 (1879-1942)





周作人
(1885-1967)



陶孟和
(1887-1960)



沈尹默
(1883-1971)



高一涵
(1885-1968)



李大钊
(1889-1927)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一百年前的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这本日后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带着朝气蓬勃的鲜明主张和拥抱西方的文明立场，逐步成长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刊物，并掀起震撼古今的『新文化运动』。

这场运动是由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少数先行者领导的『东方启蒙』，他们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主张打破封建伦常的枷锁，号召个人的独立自由与思想解放，将普世文明引入老大中国。

回顾百年前新文化人所提出的宗教、伦理、文学、民主、科学、法治等议题，仍可感受到那个时代活跃在学界、传媒界、出版界、政界的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不是一个收获的时代，不应该用今天“典藏”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作品。真正收获的，应该是聪明且勤奋的后来者。

记者/徐伟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是由一本杂志及其主创人员引领的，那是一个报刊尚为新生事物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智未开、等待启蒙的时代。《新青年》的创刊，既顺应时势潮流，也为潮流推波助澜，它成为文学、礼教、宗教、伦理、婚姻、贞洁、戏剧等一系列文化议题的主导者与参与者。通过设置议题、激发讨论、传播常识，开启了一场震撼古今的文化启蒙运动。

在清末民初的报刊热潮中，《新青年》为何能一枝独秀，成为潮流的引领者，受到智力、主张、文本、策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新著《“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中，将《新青年》置于报刊大潮中进行考察，从大众传媒的视角，分析文化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将人们的视野拉回现场，对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解读，得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新文化运动”由何而来？

记者：今年，学界隆重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但对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似乎仍存争议，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如何界定，取决于论述者的理论预设和学术视野。历史事件和运动趋势是两回事，要认定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比如《青年杂志》创刊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那很容易，因这个时间点是明确的。但像新文化

运动这样具有趋势性的社会思潮，对其如何起承转合，需要视谈论的内容和解释的方向而定。

比如，谈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不一样的，前者偏重于政治抗争，论述者会强调其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再到政治抗争的全过程。而谈新文化运动，一般会从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创刊或者1917年白话文运动兴起算起。

不过，我个人的学术立场会和很多学者不一样，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我曾强调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共同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从戊戌变法到1920年代中期，思想的、语言的、文体的、媒介的、教育的一系列变革，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有意识地借助大众传媒来改变中国，是戊戌维新开始的。当然，在此之前已有报刊出现，如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等，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大的思潮。

记者：“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据可查文献，最早是什么时候？

陈平原：我没有做过全面检索，不能

新文化运动并非某一个人的奇思妙想，或偶然出现的一篇好文章，它包括旗帜的高扬、同道的呼应、社会的接纳、读者的追随。

确认谁最早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专门谈这个问题。此时，“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已经很流行了，陈独秀只是赞成而已。五个月后，胡适发表公开演讲，干脆拒绝承认自己从事的就是“新文化运动”。鲁迅也曾在《热风·题记》中提及，“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外人给取的，最初甚至不无嘲讽的意味。只是新思潮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词逐渐普及，最后连胡适本人也都接受了。因此，即便我们把20世纪最初二十年的报刊全部检索一遍，寻出谁最早使用这个词，也都意义不大。关键是辨析这个词的具体内涵，以及推动这个词流通开来背后的力量。

大众传媒视角里的《新青年》

记者：您在新著《“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中，将《新青年》放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大潮中讨论，特别强调其“大众传媒”的性质，选择这样的视角用意是什么？

陈平原：今人谈论《新青年》的时候，容易走向神圣化和污名化两个极端。在我看来，必须将它还原为一本杂志，才能对其准确定位，明白其文章的特点和用意，并对其不足予以同情之理解。

包括陈独秀在内，几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业之前，都曾参与报刊这一新生的文化事业，并多有历练。如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办《警钟日报》、吴稚晖办《新世界》、章士钊办《甲

新文化运动前后部分刊物



《甲寅》
1914年5月 日本东京



《青年杂志》(新青年)
1915年9月 上海、北京



《每周评论》
1918年12月 北京



《新潮》
1919年1月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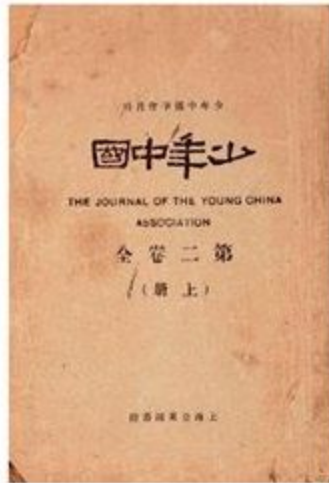
《国民》
1919年1月 北京



《新教育》
1919年2月 上海



《星期评论》
1919年6月 上海



《少年中国》
1919年7月 北京



《曙光》
1919年11月 上海



《学衡》
1922年1月 上海

寅》、钱玄同办《教育今语杂志》、李大钊编《言治》、周氏兄弟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撰稿并积极筹备《新生》杂志。《新青年》的作者群及编辑思路，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我们今天重新评估《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还原为一本报刊。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新青年》正是同人杂志的最杰出代表。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同人，是一个有共同理想，但又倾向于自由表述的松散团体，他们借报刊为媒介，集合同道，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后来，“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的大众传媒，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世人心中的“《新青年》同人”，已经不

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

记者：在当时的报刊潮中，《新青年》能脱颖而出并引领新文化运动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陈平原：在清末许多早期启蒙者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能找到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是，出现思想萌芽与形成一种文化思潮，不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并非某一个人的奇思妙想，或偶然出现的一篇文章，它包括旗帜的高扬、同道的呼应、社会的接纳、读者的追随，这些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所谓“运动”。

《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和北京大学结盟。《新青年》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中间的第三卷到第七卷，那时候，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最开始的两卷虽也有一定影响，但它

之所以能风靡全国知识界，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与北大结盟。在结盟前，其作者群主要是陈独秀的《甲寅》旧友，结盟后则基本上是北大师友；结盟前，其发行陷入危机，结盟后发行量陡增到1.5万份，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本身还可以盈利。到第四卷之后，甚至对外宣称“不另购稿”，也就是说，对于世界、对于时事、对于文学革命或思想启蒙等各方面议题，其同人作者群都能完成。与北大结盟后，《新青年》的整个学术影响力和思想洞察力，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说，陈独秀的北上是关键一步。

记者：与一般的时评杂志相比，《新青年》有何突出特点？其所发起和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孔教、礼教、戏剧、婚姻等问题讨论，都是当时急迫的社会热点问题，这些议题产生的背景是怎样的？

陈平原：《新青年》的突出特点，在于



←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 1917年，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出任文科学长。这是教育部批准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函件，现藏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的情形，一是国势危急，时不我待；二是大家都还没掌握好大众传媒的特点，说话容易过火。至于《新青年》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他造成压迫，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对其“垄断舆论”的批评，需做具体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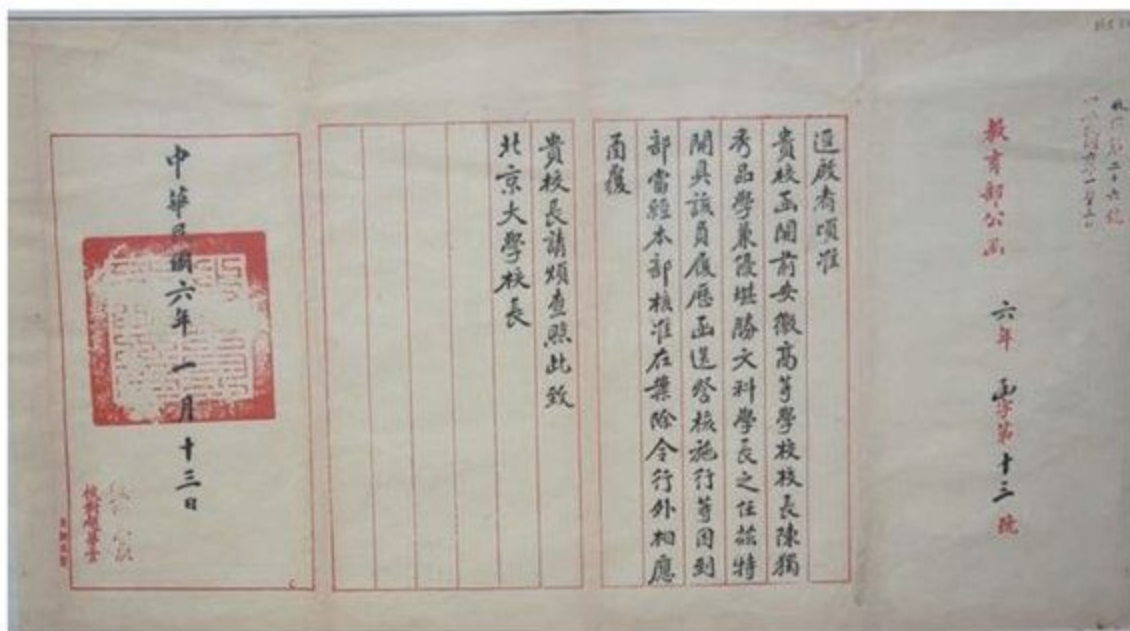
记者：从当时的销量来看，《新青年》并不是销量最大的媒体，鲁迅小说的发行量甚至不如张恨水的小说，但为何《新青年》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其主要撰稿人会成为运动领袖？

陈平原：谈论文学史或思想史上的影响力，不能单纯从销量来判断。在我看来，有两种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和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他们不只是阅读，还批评、传播、模仿、再创造。当年张恨水的读者确实比鲁迅多，但这只是短时间内。因为，他们的读者素质是不一样的，鲁迅的读者有评论、传播以及模仿写作的能力，而张的读者只是将其当消遣读物。

另外，鲁迅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发表两三年后就可能进入了中小学教材，或被选入各种选本，很快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张恨水的小说从来没有进入中小学教材，差别就在这儿。谈影响力，不能只看图书销量，必须把教育考虑在内。除了中小学教材，大学里的课堂讲授，集体住宿制度，还有社团活动等因素，都使得同样一本书，卖给一般市民与卖给大学生，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是不同的。因此，我才会特别强调《礼拜六》和《新青年》的读者构成不同，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

也谈新文化人的学养问题

记者：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但学者秦晖提出，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真正谈民主共



它比别的时评杂志更有学问，但杂志本身又是直面当下的。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议题，《新青年》都有所涉及，他们把学理和大众需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读书人参与时代议题，可通过演讲、著述、教书或与大众传媒结合等形式。陈独秀曾说过，他办杂志有两个特点，第一，“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第二，“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前者凸显同人杂志的精神，后者则指向同人杂志的形式。既要有学问，又要愿意跟公众对话。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称帝问题、妇女问题、孔教问题等，都是沿着这个思路被提出来加以探讨的。

我所强调的，要从杂志的角度来理解《新青年》，还包括理解其表述的“极端”与“过激”。不仅是在今天，当时就有人批评《新青年》“好骂人”、“说话太极端”。实际上，《新青年》同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从杂志经营的角度考虑，就会明白这正是大众传媒的特点。杂志不是结构严谨、论证充分的著作，也没希望“藏诸名山，传之后世”，而是要每时每刻都面对公众，回应当下的热点问题。而大众传媒要想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夸张的语调、杂文的笔法，乃至“挑战权威”与“过激之词”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办刊策略。当时

和、宪政法治的很少,更多的是谈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思想解放,这与他们主要是留日有关,在学养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其实,应该这么提问,为什么那时的读者对宪政、法治之类的话题不太感兴趣,而更关心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某种程度上,主要不是作者的学养,而是读者的趣味和接受能力决定了杂志的编辑方向。我们不能用今天专家的眼光来苛求当时的作者与编辑。其实,这些问题都有人谈过,但不受关注;而没有进一步的追问,也就难得深入展开。虽然陈独秀说过,办刊必须“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但杂志多少还是受制于读者的能力和趣味的,当主编的,会根据读者反馈不断调整议题和编辑策略。

此外,五四新文化人和1930年代以后的读书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不够“专业化”,其趣味接近于百科全书派,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学,但不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专家。专业化是1930年代以后的大趋势,如果用专门家的标准来评价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那会不准确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饥不择食地吸收各种知识,他们读书不是为了拿学位,撰稿也不是在做博士论文,学到了新知,赶紧用它来改造中国。如此学以致用,不免急功近利,读歪了,或解偏了,那是很正常的事。

至于说整个作者群的知识结构是什么样子,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的学者,学养大都不如晚清及五四的新文化人。我们确实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只知道自己专业领域的那一点东西,只能做一些专家之学;专业以外,若需发言,往往捉襟见肘。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人是开疆辟土的一代,而我们基本上是守成,做些局部的调整或反拨,意义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必须明白当时读者的水平,

“新文化”那代人的意志与激情,立场与胸襟,以及学养与情怀,都是今天的读书人所缺乏的。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理解杂志的关键。杂志编辑乃作者和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作者立意太高,那就压一压;读者水平太低,那就提一提。为什么《新青年》谈法治、谈宪政的文章很少,因这类话题当时不太受关注;为什么谈婚姻、谈贞洁能引起全民大讨论,因那是广大读者的切身体会。成功的杂志,毫无例外的,作者和读者必须不断地相互调试。

记者:可见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兴起,与其注重与大众的结合互动,并在语言和文本上进行改革有莫大关系。而此前维新派的思想萌芽,还是停留在知识精英阶层,未能形成大的社会思潮。

陈平原:形成思潮是有条件的,不只是见解高低的问题。某一个时期,若大家都在关注某个话题,那必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是偶然的。有一些话题,确实是主编预先设计的,但操纵得动操纵不动,除了主编及作者自身的才华,还牵涉读者的接受能力。

一百多年后,我们回头看晚清及五四的报刊,还会有新鲜感。因为,那时的新文化人,几乎把每个有趣的话题都提出来了,但每个问题都没说透,遍地开花,却很难结果。必须等后来者追上来,在遍地野花中选择一朵,摘下来,插在头上,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不是一个收获的时代,不应该用今天“典藏”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作品。他们播下那

么多种子,良莠不齐,过了三四十年甚至一两百年,我们不断跟他们对话,调整自己的方向与步伐,真正收获的,应该是聪明且勤奋的后来者。

记者: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回顾和纪念这本杂志和这场运动,其主要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对当下中国的学人有何启示?

陈平原:谈新文化运动那代人的姿态,会让今天的读书人感到惭愧。那代人的意志与激情,立场与胸襟,以及学养与情怀,都是今天的读书人所缺乏的。如何选择一个独立思考的位置,获得一个自由辩论的平台,回到坚持自家理念而又能够充分表达的理想状态,对于今天中国的读书人来说,还是颇为奢侈的。

今天中国的读书人,不太敢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非常直率、表里如一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困惑和追求。有领导在场和没领导在场说话不一样,人前和人后说话不一样,在媒体上发言、在课堂上讲话和在朋友圈中聊天也不一样。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五四那代人挺可爱的,他们的见解不见得高深,但文章读起来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谁都明白,说得到的不见得就能做得到,但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相信的观点,还是很令人羡慕的。我们今天缺的,或许就是这个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当时的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保持不断的对话。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实习生钱薪宇、谢忱对本文亦有贡献)

□ 编辑 陈祥 □ 美编 虎妹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

继上世纪80年代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后，这几年，对它的责难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主义的起源”。愚意以为，这些都是对历史的误读和不公正，必须澄清。

文/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思想、文化进入变革和发展的新阶段，民间掀起办报办刊热潮。

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异军突起，高举人权与科学（1919年后改为民主与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大旗，经过几年奋斗，引领400家以上报刊参与的新文化运动大军，推动我国思想、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繁荣茂盛，百家争鸣。史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数史家至今仍称许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罕见的“黄金时代”。

然而，思想不可能统一，观点总是多元的。继上世纪80年代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后，这几年，对它的责难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似乎20世纪中国的苦难，都是这个运动的恶果。

如鲠在喉，有话要说。愚意以为，这些都是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误读，是对历史的不公正，必须澄清。

何谓新文化运动？

时至19世纪，中国面临非变不可的困境。可是，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除个别别人外，仍然呼呼大睡。引导国人了解世界现状和文明的进展，推动中国学习和接受现代文明，转化为富强、文明国家，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真谛。

一批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有机会接触现代文化的中国人——魏源、徐继畲、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通

过各种途径大声疾呼，传播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他们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如果这个界定没错，就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

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现代报刊的开端，这份杂志介绍：英吉利“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

作为国基的“自主”，现在翻译为“自由”。它准确介绍了公民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自由、法治、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它还介绍“国之公会”（国会）理国之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指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国家才会有“旺相”。

为了帮助中国人摆脱对世界现状和文明进展茫然无知的状态，他们还着意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介绍各种科学知识。

传播这些知识、观念和制度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吗？

甲午战败后，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史称戊戌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后则掀起人们称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是，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其中奥秘无非是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民富国强的文明国家，就必须实现人的解放，让国民享有现代公民应有的各项自由，并建立相应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保障这些自由。只要

社会和国家制度转型没有完成，为其开路的思想文化变革——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止息。离开这个历史大框架，思想文化变迁失去本源，就无法理解其脉络。

五四新文化运动戕害思想文化？

现在学界和民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焦点在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文化大潮，还是戕害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逆流？

应该毫不含糊地回答，与一些人的臆断相反，这是摧枯拉朽的历史洪流——清除大清帝国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遗毒，为民主共和制度夯实基础。

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文化也有重大变化。1912（民国元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这一年2月，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汪精卫等26人受孙文委托，从上海坐船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船上，他们通过充分讨论，认为国民素质跟不上共和制度。于是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号召“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提倡“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变革的纲领。

其二，改革教育内容，剔除腐朽的旧文化，纳入新文化。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践履社会改良的措施，下令废除读经；确立新的



↑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届毕业摄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教育方针，“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剔除这陈腐内容；提倡自由、平等、亲爱（博爱）为新的道德规范。新文化的要求纳入了学校教育。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历届北洋政府，总的说来没有废除这些改革成果。

这两件大事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准确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2年。

新阶段涌现引领思想文化前进的新领袖，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人成了冉冉上升的新星。上一阶段的启蒙大师梁启超褪色，与袁世凯携手，开创了中国式参政党特色——笔锋为秩序与传统转动，忘记了批判与监督。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直接继承章士钊《民立报》和《甲寅》的锋芒。它的思想旗帜：“科学与

人权并重”和“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敬告青年》），与先驱的追求无异；成效则前所未有的。其荦荦大端，有如下几项：

1.从文言到白话，实现了语言和文字的合一，文字从社会精英垄断的工具，变为大众交流的媒介。人们交流的自由度迈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晚清白话运动的延伸。19世纪末甚至更早，为了“开民智”，许多有识之士尝试改革远离大众的文字表达方式，办白话报，成为一时热潮。陈独秀办了《安徽俗话报》；胡适则是白话报刊《竞业旬报》的重要支柱，而他们不过是白话文运动的后进。

2.文学革命：用白话文写作和表达人性与人的自由诉求成了文学艺术的主流。“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褰旗作健儿……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青年胡适的豪气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一脉相承。

3.致力于普及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基本知识，启迪公民认识自己应有的权利（陈独秀称之为伦理觉悟），力图为巩固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堵塞专制统治复活夯实思想基础。他们强调“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己之权利，以支柱国家；牺牲一己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故国家职务，与小己自由之畛域，必区别条理，各适其宜。”（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新青年》第2卷第2号）



蔡元培
(1868-1940)



胡适
(1891-1962)



鲁迅
(1881-1936)

4.清理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集中力量批判三纲。

5.打退孔教入宪的政治图谋。

以上变化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有两条是普适性的。

一是人的自由权利。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与之互为表里的是人际关系的巨大变革。核心是社会生活各大领域要有足够的自由,臣民向公民转化,要求确立和维护自己应有的自由权利。

二是语言和文字合一,交往工具通俗化。这是经济发展、人际交往频繁的必然要求。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白话文运动。欧洲各国就经历了从使用拉丁文到各民族文字的诞生和发展。

而陈独秀他们面临的特殊性也有两条。

一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青年杂志》诞生于袁世凯称帝丑剧进入高潮之

《新青年》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关系。当时辩论的是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追求怎样的思想文化。

际。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如何巩固?他们三箭齐发:

1.通过国内大事记,连续以《国体问题》为题,跟踪丑剧上演过程,并在通信栏中驳斥筹安会主张复辟的所谓“理由”。

2.发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论述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公民才是国家主人等根本观念。

3.提倡个人的独立、自由,人际的平等;提倡以世界文明进展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准绳;提倡科学-理性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方法变革;摧毁为专制开路的错误思潮。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都不愧是当时最坚决、最有理论深度的民主共和制度捍卫者,启迪公民意识觉醒的先锋。

二是在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下,以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席卷全国。

正副大总统、各地督军、社会名流和昔日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异口同声,要有国教,应该以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中说:孔子是“全国人之魂”,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国民党与进步党联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则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



刘半农
(1891-1934)

修身大本”。

《新青年》痛击了这个错误思潮。陈独秀指出：“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之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在反复辩论下，以后的宪法草案或完成制宪程序的宪法都删除了有关儒学的内容，设立国教和用儒学教化全国的中世纪图谋被挫败。

传统污垢该不该清理？

时下对蔡元培的改革赞扬之声不绝，

而对《新青年》掀起的狂飙，则质疑甚多。

回到本原，《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错了吗？

不要忘了当时的情景。

俯看上层，正如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袁世凯是大总统，“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大典大法，置之土苴……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而其他军政大员，行事风格绝大多数与袁世凯无异。

俯览社会，看看胡适写的《李超传》和巴金的《家》吧。

前者不是小说，家产丰厚的一位广西梧州女孩，到广州、北京求学，家里不给钱；婚姻则当家的兄长“但论财产”，本人“则重学行。用是各执意见，致起齟齬。妹虑家庭专制，恐不能遂其夙愿，缘此常怀隐忧，故近来体魄较昔更弱”，辗转至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罹染肺结核，无钱医治，二十三岁就病死了；为其打抱不平的嫂嫂被逼上吊。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家长专制，女儿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男尊女卑。

巴金则更详尽地再现了一个大家庭的真实情况。巴金在《家》的代序中说：“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当时的家庭和家族状况正是三纲支配一切的实景。

横看那些鼓吹国情特殊论的精英，他们要把中国的发展指向何方？

1911—1920年间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认为：西方文明破产了。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发展经济限于自给自足，不

要生产市场需要（“给人足人”）的商品和奢侈品，不能以求富为经营的目的，“凡可以手工制造者，勿以机械代之”！（《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并用中国传统文明统整世界文明，用东方文化拯救世界！

张君勱后来更加明确说：“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确认三重网罗（指上述三特征）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科学，冀图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迥异的东方国家。

《新青年》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关系。当时辩论的是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追求怎样的思想文化。

陈独秀如实地指出，中国眼前的许多社会现象，西方过去也有过；当下东西文化关系实质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古今关系。在制度层面，陈独秀把《新青年》同人与现代文明抗拒者的分歧界定为古今之争，客观地说，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三纲。家庭、家族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身处地，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致力于批判阴魂不散的中国专制主义——三纲，揭露传统家族制度的荒唐，究竟有什么错误？

再看看中国的现实吧。

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怪现象之一，是所谓“国教派”的兴起。他们不惜使用伪书，歪曲历史，把西周封建制度说成是现代宪政；把秦以后的宗法专制制度美化为分权治理的典范。于是，专制皇帝的工具——臣子，被描绘为与皇帝共治的强大力量；宗法专制的家族秩序，则成了基层自治的典范。因此，当社会治理方法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之际，他们鼓吹用“贤能政治”取代民主制度；恢复家族制度和士绅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石。可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秦以后中国哪一朝代的政府和社会不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又有哪一部传统法典不是严密地维护三纲？

与此同时，他们混淆明清儒家宗法专制制度与作为先秦儒家的主张和设想，把后者的思想描绘得无比美妙。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对先秦各派思想的解释，人言人殊，都是论者心中的块垒；读者各取所需，一笑可也。民国初年，陈独秀他们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明清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顽固残余。

深入一层思考，今日国教派及其盟友赖以忽悠大众的，不就是在个人、社会、国家关系上制造种种迷雾吗？

抚今追昔，陈独秀等先驱的思想精髓，仍然有掩不住的光芒。

《新青年》的新罪状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时至今日，悬在新文化运动头上有三大罪状。有的是误解，有的是故意制造的混乱。

第一大罪状，尚有许多人在起哄，称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

这是没有认真阅读有关文献的误解。

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指出：“明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予删除。同时明确表示：“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蔡元培全集》第2卷）对孔子、孔教的慎重态度溢于言表。



梁启超
(1873—1929)



刘文典
(1889—1958)

陈独秀则反复说：孔子是当时的伟人；传统文化中许多精粹可以和应当继承；需要反对的仅是孔子之道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

两大领袖的观点是主流。个别参加者的偏激言论是思想文化浪潮中常见现象。钱玄同鼓吹废除汉字，后来成长为著名的文字学家。饱读古籍的鲁迅扬言不要读线装书，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他整理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化的成就，有目共睹。

思维最忌笼统。新文化运动确实把锋芒指向传统的一部分，却不是全盘。反对者的失误，是混淆了儒化社会制度与非制度性的儒家观念文化。

秦以后，儒家思想逐步固化为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特征是：从家到国的宗法体系；按照三纲体制，确立尊长层层专制；亲

疏有别，等级分明；服从，恭顺。从《白虎通义》、《唐律》到《大清律例》一脉相承，记录了这个社会严密的规则体系，成为中国强盛和衰落的制度根基。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在扼杀中国知识阶层创造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些思想家和繁盛的文学艺术成果。不能抹杀两者的区别，用文化儒学的亮点掩盖儒家制度的腐朽。

一些人拾人牙慧，无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成果，把传统制度的痼疾归咎于法家，说是“儒表法里”。而前人的研究成果早就说明，法家“一于法”，与传统律例明确规定亲疏、贵贱有别的儒家精髓格格不入。

全面地说，新文化运动只反对贯穿三纲的传统制度文化，对其他非制度性的文化，总的说来有承先启后之功。它也反对“旧艺术（中国戏）”，“提倡改良戏剧及诸



陈寅恪
(1890—1969)



梁漱溟
(1893—1988)



闻一多
(1899—1946)

朱自清
(1898—1948)

演唱业”等非制度性的文化，原因只在于它们是传播三纲观念的载体。

第二大罪状，是新文化运动导致文化断裂。

辛亥革命后的四十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奠基和发展时期，也是文学艺术的繁荣期。旧的没有丢弃。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长期被忽视的诸子研究硕果累累，哪里有什么中断？白话文地位确立后，中小学的传统语文教学所占比例比较合适，文化传承也没有中断之虞。引进来的新的学科、文学、艺术，正在生根、成长。学界誉之为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再现。民间风俗、文化正在自然演变，政府和民间都没有用暴力干预。文化断裂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新文化运动是推动这一繁荣局面的动力，千万不要颠倒黑白。

第三大罪状，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和极权主义的起源。

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搭界，却偏偏有人这样鼓吹。这是逻辑混乱的典型。他们完全不考察实际情况，在书房中给新文化运动制造罪名。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政敌，铲除他们想象中的敌人的文化基础，树立“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新文化运动为的是摧毁与共和制度不相容的三纲，建设新的自由文化。文革的手段是领袖权威加暴民专制；新文化运动则是各方自由发表言论，读者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只靠说理服众，没有任何强制性。前者的后果是一亿人受折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遭浩劫；后者是出现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两者有什么可比性呢？

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两个不同的

运动。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五四发生的爱国运动，是时间和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前者是思想文化运动；后者是走上街头的政治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正义的，也收到良好效果。不过，它出现了火烧赵家楼的不幸事件，破坏了法治，而得到很多人喝彩；从而开启了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连绵不断的暴力行为，带来恶劣的后果。就暴力和脱离理性而言，它和文革有交集点，但与新文化运动完全没有关系。即使暴力行为两者也有区别，文革无论手段和内容都是义和团运动的延伸。那才是文革的真正起源。

至于说新文化运动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更加离奇了。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持如是观，也值得注意。这个罪名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一是声讨《新青年》，却割裂《新青



◀ 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社团，1917年恽代英在湖北发起成立互助社。图为互助社部分成员的合影。前排左起：汤济川、杨理恒、恽代英、萧鸿举、林育南、刘仁静。

▶ 新文化运动使科学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图为1918年，全国性科学机构中国科学社与工程学联合会的合影。



例如，陈独秀的一句话：“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被戴上“反法律主义的倾向”的大帽子。陈独秀的原话是：“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动，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有什么错误？学界的共识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是有没有引起当下社会危险；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都是可以自由批评、讨论的。

《新青年》的真正失误在哪里？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抵挡住破坏法治的逆流。以“革命”、“爱国”或其他貌似正义的名义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公私财产，是辛亥革命前后一些革命党人反复发作的幼稚病，常被极易激动的年轻人继承。

五四当天，激愤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社会精英们面临大考：如何区分学生的爱国壮举和违法行为，分别采取适当的态度？《新青年》旗下的《每周评论》既为爱国示威喝彩，也对越轨暴行曲为辩护。梁漱溟维护法治的呼声，被爱国压倒一切的大合唱淹没，成为20年代学生运动失序的先声。

在校内，学校失去稳定的教学秩序。走向校外，在有政治雄心的各色人等策划、操纵下，文武高官被抄家屡见不鲜；内政外交大事失去冷静辩论的机会，天真的莘莘学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合己意的报刊，如著名的北京《晨报》，干脆一把火烧掉！天下从此多事！执政者缺乏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当然应该担负主要责任；头戴众多正义光环的一方也责无旁贷！尽管胡适等人

年》群体，只挑出陈独秀一人来吹毛求疵；高一涵、胡适等人完全被屏蔽。

二是不顾“公同意见”，以偏概全。与梁启超办的《庸言》申明由“梁启超主干”，所有文章“皆经启超校阅，负附带之责任”不同，《新青年》内部也有不同主张。直至1919年12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才发表《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被论者断定《新青年》是极权主义的主要根据，是陈独秀累累发表反对政党和议会政治的言论。《本志宣言》已明白宣布：“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运用政治的应有方法”。论者说：“国民政府时代，年轻学生愤怒批判‘国民党专制’，殊不知，这个专制恰恰是

“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动，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

《新青年》所主张的取消议会政治的结果。”不过，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师承的是苏俄，与《新青年》全力提倡的言论、结社自由和公民的独立自由是完全相反的。

三是歪曲文意，把正确说成是错误。



1919年6月4日，学生被捕，清华学生挥舞条幅抗议。

当时一再谴责和提醒学生，他们的行动侵犯法治、践踏民主；但风气已成，迟敲的警钟，已无济于事。当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识破民粹思潮的危害，失去思想家应有的敏锐，亦难辞其咎。

只要法治健全，自由讨论中有任何错误或偏激言论都不足惧，而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多数公民养成了倾听和讨论的习惯，才会趋于理性和成熟。

1920年开始，《新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此后的言论和陈独秀如何转舵，都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课题。它关注的主要是政治而非思想文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转到胡适及其朋友手里。这个转变既由于同人杂志内部制度不健全，《新青年》与陈独秀仿佛合二为一了；也是冲不破民粹思潮藩篱的后果。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最大的教训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混淆。本文不涉及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后的是非得失。辛亥革命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卓越而偏激的思想家，却是蹩脚的政治家。他的朋友们跟着他上演了一些笑剧，好在这些

朋友没有选择从政而避免了更大错误。

1999年，在台北和北京分别举行的五四80周年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便涉及这个问题，请允许笔者抄抄自己的旧稿：

“1919年6月五四运动进入高潮和尾声。6月9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研究后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为英文，并连夜印刷多份。6月10日，陈独秀等到中山公园等地散发这份传单。11日，陈独秀与胡适、王星拱、高一涵、邓初、陈演初等一道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附近一家四川菜馆晚餐。餐后，胡适与高一涵先行离开；陈独秀和邓初到新世界散发这份宣言；王星拱则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场散发。陈独秀上到屋顶花园向地下正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撒传单时，当场被警察逮捕。

这件事非常值得注意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这是一个《新青年》编辑部主要成员都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前面不厌其烦讲述那几天他们的活动细节，为的是证明那不是陈独秀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代表了当时主要思想家的认识水平。

二、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在北京夺取政权的纲领。

这个宣言首先提出对日外交和免除六位官员职务的要求，要求市民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怎样达到这些要求呢？一是解散旧的武力，‘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二是‘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我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三、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空想计划。一个警察将陈独秀拘捕到警察局，肥皂泡就吹破了。

从康、梁开始，近代中国历史大转折中涌现的政治家，几乎都染上了这样的幼稚病，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历练的机会。潮流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经验和知识却不足以应对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接踵而至的是种种阙失乃至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专制政治的后果，是告别黑暗的代价。”

这是书呆子的政治幼稚病，与新文化运动无关了。⑥

（感谢李浴洋、王佳琪为本专题提供的图片支持）

□ 编辑 徐伟 □ 制图 美编 虎妹

最严第三方支付新规将面世

超5亿用户受影响

记者/曹蓓

并不是所有习惯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转账的用户都知道，他们部分免费、快捷的优惠券即将面临到期。

7月31日，央行推出被市场称为“史上最严厉”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8月28日结束意见反馈期。开户多重验证、支付限额、超过200元额度需银行验证、不得向他人借记卡转账等条款广受争议，这意味着，已经频繁使用第三方支付的用戶，将在转账汇款、购物、理财等多方面受到影响，而尚未使用第三方支付的用户，也可能在今后准备开户的时候，遇到比此前更多的“麻烦”。

根据9月15日易观智库发布的《2015年第2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市场的份额排名前三位分别为：支付宝74.31%；财付通（微信支付+QQ钱包）13.18%；拉卡拉6.33%。支付宝相关负责人对《凤凰周刊》称，目前实名制用户已超过4亿；来自拉卡拉的数据称其个人用户达到1亿，而财付通方面则没有发布相关统计。

据此粗略估计，这份即将出台的管理办法，将影响至少5

亿国内用户的正常金融生活。

规范还是束缚？

就在央行这份征求意见稿发布不久，浙江易士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易士公司）的《支付业务许可证》被吊销，原因是该公司存在大量违规挪用客户备付金，伪造、变造支付业务，超范围违规发行网络支付产品等严重违规问题，这也是首个被注销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机构。

这正是监管层一直以来对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担心。

2010年6月，央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将第三方支付行业纳入监管，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需要按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2011年5月26日，央行向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等27家公司签发首批《支付业务许可证》。据统计，截至目前，央行共计发出270张支付牌照。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此份征求意见稿已经酝酿多年，修改多次。此次的征求意见稿共57条，行文极为谨慎，但即便如此，仍然引起市场极大的争议。

大陆官方媒体总结了最受争议的几方面：

首先来自开户门槛。征求

意见稿称，可用于消费、转账以及购买投资理财产品或服务的综合账户需要面对面核验身份，或者用至少5种方式来进行交叉验证身份。即用户必须提交身份证、工作证明、社保缴费单等多份证明。而目前主要第三方支付企业只需身份证和银行卡就能完成开户。

其次是目前可以免费转账的优惠将面临终结，因为按照新规，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之间的转账只限于本人同名银行借记卡，而无法向他人账户转账。

当然也有一些条文的误读，比如此前被市场解读为“单个账户单日累计支出金额应不超过5000元”，后被央行解释称，5000元的限额只是针对支付账户的扣款，在网购扣款时，当消费金额超过5000元，超出部分是从银行卡账户扣除。因此，消费额度实际没受影响，只是扣款渠道不同而已。但最新规定是，快捷支付如果超过200元，需要跳转银行去验证，这点确实较目前的便利性有所折扣。

更有舆论认为，这样的新规，是对冲击到银行业的第三方支付的打压。与普遍认为受到负面影响的第三方支付不同，银行被认为是此次新规的受益

者，至少因无法通过第三方支付向他人转账这部分业务，会增加银行的手续费收入。

“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无法预估最终的结果。”一家知名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

负责支付监管的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接受陆媒专访时称，央行作为宏观调控部门和整个支付行业的监管者，没有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的理由。政策目标在于全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在服务便捷与金融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在互联网金融为用户带来便捷和高效，从而迅速疯长的过程中，风险的确在持续累积和暴露。

央行相关负责人此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据统计，2014年至今，央行全系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受理的网络支付类投诉占互联网金融类投诉的95.06%。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发文指出，整体上来看，征求意见稿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树立了新的规则，满足了对互联网金融企业依法监管的迫切需要，有利于促进中国互联网金融规范和健康发展；但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全

局来看,第三方支付新规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适应移动支付的需要、完善当前的网络支付清算体系和协同监管等方面。

业内人士普遍的共识是,央行第三方支付新规,对现有规模较大的企业影响很小,更多欠缺规范的小企业将面临出局。

将促使行业洗牌

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央行此次发布的新规,涉及的是一个迅速发展且潜力巨大的市场。更多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看中的并不是支付通道本身,而是由此带来的互联网金融延伸业务的入口。

最新公布的央行《2015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第二季度,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206.60亿笔,金额11.0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2.14%和107.75%。

目前的竞争格局是,支付宝市场占有率将近75%,相比之后的财付通和拉卡拉具有绝对优势,而除了这三家之外,其他8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只共享不足7%的市场份额。

按照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的说法,互联网的商业逻辑其实是垄断。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曾对媒体表示,市场上不需要这么多第三方支付机构。按照成熟的欧美市场经验,一般行业前五名才会有生存的空间。

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企业,脚步并未停止,留给后来者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很多。



根据易观智库的分析,支付宝最新发布的“9.0”版本突出付费的“场景化”,线下场景的嵌入将引导其大量的线上用户下沉至线下。支付宝本次改版的战略是“支付工具”转变为“全场景金融生态体系”,实际目的是为了拓展移动支付市场。

紧随其后的微信支付通过与线下社区商户合作,发起“微信支付日”的扫码支付优惠折扣活动,并接入全家、7-11等便利店,O2O市场的扩张促进第二季度的交易规模。

当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家公司份额超过10%的互联网背景企业向线下进攻的时候,正在冲击排位第三、联想控股、以便民支付线下硬件刷卡起家的拉卡拉。

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陶然坦言,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有海量的线上个人用户,这是拉卡拉存在的不足。

近期,拉卡拉发布其全

景支付产品“考拉手环”,集多卡合一、空中发卡、空中充值等创新功能于一体,不仅内置有交通一卡通和中银通电子现金卡,也接入了理财、信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孙陶然认为,这样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线上入口,从而发展海量个人用户。

另一个思路来自连连支付,易观智库报告称,该企业为红岭创投、鑫合汇、宜人贷等P2P平台以及京东、蘑菇街等电商提供支付通道服务。二季度借助“互联网金融理财节”、“京东6·18周年庆”等活动,交易量稳定上升。在移动应用内支付交易份额逐渐扩大至9.64%,仅次于支付宝。

对于监管层来讲,更愿意让第三方支付机构回归小额和快捷支付的轨道,而禁止此前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业务层面的过度延伸。征求意见稿规定,支付机构不得为金融机构,以及从

事信贷、融资、理财、担保、货币兑换等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

范一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非银行支付小额、快捷、便民的特征,目前体现得很充分,虽然总额还不是很大,但对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便民服务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举了一个例子,称不久前在一家便民超市里发现一家支付公司不仅为超市提供一般收单服务,而且把公交卡充值、水电煤缴费、信用卡还款之类的便民缴费功能整合进来,“我看这就是支付机构找到合适的业务发展模式,提供小额、便民和普惠金融服务的典型例子。”

由此,监管层对于第三方支付的监管思路可见一斑,而这也或许也是未来第三方支付企业拓展的方向。



大陆地产业进入剧烈调整期

地产龙头万科遭遇最大股东易主风波，紧随其后的恒大、绿地正在快速追赶，“国”字头的地产企业进入整合通道，一切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期。内地房地产企业格局，或许正在面临未知的变化。

记者/曹蓓

种迹象表明，大陆房地产业正在进入剧烈调整期。

8月末，央企华润意外失去了其长达15年的万科最大股东地位。然而，仅仅两天后，华润就从民营企业宝能集团手中夺回了在这家大陆最大房地产企业的座位。无论这场股权之争是否仍将持续，对于中国房地产领域举足轻重的民营房企万科，都将迎来或多或少的变数。



这场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股权拉锯，其指标意义不可小视。

与之相呼应的是，一直以来相对稳定的房企排名开始出现些许变化。绿地、恒大等几家大型房企开始在某些指标上对此前稳居首位的万科发起冲击，正在改革重组的央企也被业内视为有望威胁大型民营房企地位的重要力量。

多路人马涌至的结果难有

定论，但对于整个行业最有变革性的因素则来自互联网。来自百度和淘宝的信息，多家房地产企业已与其展开合作，效果开始显现。

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中小房企将在这一轮大洗牌中消失，转型中的大型房企将是这场行业调整的间接受益者，而传统民营房地产企业的市场份额，将越来越多的受到国有资本、互联网企业的争夺。

万科争夺战

深圳市盐田区大鹏湾畔，地处亚热带海滨大梅沙、被称为“躺着的摩天大楼”的万科总部内，弥漫着与这一切截然相反的氛围。

8月26日，万科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宝能系旗下公司前海人寿、钜盛华当日增持万科5.04%的股份。加上此前的两次举牌，宝能系合计持有万科股份的15.04%，这意味着其已经超过15年稳坐万科第一大股东位置、持股14.89%的华润。

无论是否有意成为外界口中“门口的野蛮人”（出自布赖恩·伯勒的《门口的野蛮人》，后被华尔街用来形容不怀好意的收购者），宝能系的疯狂买入，让万科上下一夜之间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今年7月以来，宝能集团（以下简称：宝能）在资本市场上通过旗下前海人寿及钜盛华耗资约240亿元三度举牌万科。

这一举动显然不被万科管理层欢迎。股东分散且持股量低，万科很早就建立了职业经

理人制度，且管理层拥有相当的掌控力。根据最新的上半年业绩报告，万科前十大股东合计仅占37.23%股份。

王石在8月31日万科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开表态，万科已经适应了股权比较分散的结构，中小股东是最大股东，万科的管理层有绝对的发言权。而对于此前最大股东华润，王石的评价则是“没一味谋取利益，反承担很多责任”。

言语之间，亲疏可见。

华润也果然不负重望。港交所交易信息显示，8月31日和9月1日，华润耗资4.97亿元两度增持万科，最终以15.29%的总股本占比重新夺回万科第一大股东的位置。曾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前海人寿面对增持回应，投资万科“仅仅是财务投资”。但如此迅速和持续出手，显然难以抑制业内人士，包括万科高层的想象力。

2014年，万科也曾经面对过类似的局面。当年10月发布的三季报中，安邦保险通过旗下一只“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稳健型投资组合”产品持有万科2.35亿股，占其总股本的2.13%，位列第四，闯入十大股东之列。但据当时一位资本市场人士对媒体称，安邦出现在前十名股东名单中，此前是与万科集团有过沟通。

随后，在2015年万科的一季报中，安邦由于大幅减持，退出十大股东之列。有观点称，安邦自始至终都是财务投资者，但另一种观点更具画面感，称以王石、郁亮为首的强势管理层，逼退了安邦进一步的想法。

这样的判断同样延续至宝能系。虽然宝能系发力之初，让市场有了无尽猜测，但在记者的采访中，大多业内人士推测，宝能系很可能同样止步于“财务投资者”。首先，万科的管理层很难驾驭，其次，与这样风格的管理层相处15年相安无事的华润，也非等闲之辈。更何况，宝能系如果继续投入，则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

但无论宝能系接下来的动作如何，被券商分析师普遍定义为估值偏低、业绩可期、具有长线投资价值的地产龙头股万科，恐怕短期仍难平静。

行业分化加剧

地产业的调整不仅体现在地产龙头万科的股权之争，在整个行业内部，大型房企的竞争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延伸到资本市场等新领域，国有房企和国有资本频频发力，“内地最大房企万科”的称号，开始遭遇来自绿地、恒大、保利等发展势头强劲房企的冲击。

从去年开始，整个房地产行业面临深度调整，更多的中小房企在这一轮大洗牌中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转型中的大型房企成为这场行业调整的间接受益者，并开始在各种排行榜中展开争夺。

安信证券研报称，房地产行业集中度逐年提升，TOP22企业营业收入占比71%，净利润占比75%，比去年均提升约4个百分点；TOP10销售市占率已升至20.2%，较去年的16.6%提升3.6个百分点。在大型房企中，2014年，绿地销售额超过一直以来

稳居首位的万科，一度成为舆论焦点。虽然在亿翰智库发布的《2015年1-8月中国典型房企销售业绩排行榜TOP100》中，万科重回首位，绿地退居第三，恒大居于次位，但三大地产商均销售过亿元。

争夺还蔓延至资本市场，8月借壳上市的绿地控股总市值超越万科成为第一，随后股价震荡后，大股东耗资过亿元增持，力保市值第一。截至记者发稿，同花顺数据显示，绿地控股仍以A股1721亿元总市值排名首位，万科紧随其后。

在房企排行榜的第一阵营，同样是“国”字标的不仅仅是绿地。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2015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报告》，紧随万科，国有房企保利地产在综合实力、盈利性、稳健性等多项指标中位列第二。

此外，国企改革波及房企，各家地产央企开始整合重组，一家大型券商分析师对《凤凰

周刊》称，虽然有些央企拥有存量不多，但控制的泛房地产资源较多，不排除冲击大型民营房企的可能。

今年3月，历经近20个月的中建系房地产业务整合正式落地。中海地产控股股东中建股份拟将其持有的30个相关物业项目正式注入中海地产；保利地产与保利置业整合也传闻已久；中交集团通过收购，已持有绿城近29%的股份，成为绿城第一大股东。消息称，中交集团还将继续要约收购，未来中交集团将展开一系列的地产业务整合，绿城将成为中交集团整合房地产资源的重要平台；招商地产也在酝酿重大重组……

对于国有房企改组的冲击，业内也存在不同声音。虽然重组后的保利系、中交系、招商系将成为房企争夺的有力参与者，一旦地产行业出现制度性变革，国企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对于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地产行业

来讲，留给国企超越大型民企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国企在稳健性方面，依然比民企更具优势。”中投研究总部房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少明对《凤凰周刊》称。

融合“互联网+”

不仅是在房地产业内部，在“互联网+”的风口下，百度、淘宝等互联网“大鳄”已将触手延伸到房地产领域。面对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的冲击，传统房地产业务模式出现拐点，转型已是必然。在此背景下，多家内地房地产龙头企业纷纷拥抱“互联网+”并开展跨行业合作。

百度移动事业部首席产品架构师李明日前在2015百度世界大会上描述了跟地产商合作的过程，对于有精准需求的客户，比如在搜索某个楼盘，开发商在不同渠道投放广告，最终把用户转化回来，链条长、效果低，而且有很多支出的成本。通

过百度直达号，就可以在搜索后直接到所有与直达号有合作的开发商，另有优惠券、预约看房等。而对于潜在用户，比如搜索北京新房，没有明确哪些楼盘，就可以通过背后数据和行为的分析对其进行引导。

据透露，万科、万达是第一批跟百度直达号接触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从4月上线至今，由百度带去的IP流量量将近20亿个，在直达号产生的交易和楼盘预定占三分之一，目前百度直达号已覆盖十几家开发商和几百个楼盘。淘宝房产相关负责人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从4月1日至今，淘宝房产已与50多家开发商签订合作协议，业务覆盖60多座城市；据统计，约2亿元认筹资金进入阿里的金融产品余额宝中，购房成交总金额可达270亿元。成交总套数接近两万，主要分布在杭州、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万达、绿城相对成交量最大，万科、绿地也有不少。

与互联网的融合不仅仅体现在最前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和中国指数研究院于9月11日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报告显示，“互联网+”对房地产企业最彻底的颠覆来自于传统产业链的重构。品牌房企利用“互联网+”对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改造，打造新的商业形态。如万科6月宣布试水互联网家装，将触角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再如绿地联合平安好房推出首付贷互联网金融产品。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1-8月中国房企销售排行榜

★ 8月房企销售业绩环比7月增减参半。从标杆企业来看，排名前十的企业单月销售情况变化不大，个别企业表现比较突出，如碧桂园8月环比销售金额增长将近七成；整体来看，前十企业8月销售总金额环比持平。

★ 万科8月销售金额环比小有下降，但总金额依然稳居榜首。绿地在万科、恒大之后，成为第三家销售金额突破千亿的企业，稳居第三位。前九的企业排名没有变动，10-12名竞争激烈，企业销售业绩差别不大。总体规模在200亿-300亿元之间、排名22-37名之间的行业中间力量竞争进入白热化。

● 销售金额估计

● 销售面积估计

数据来源：亿翰智库



链接

国企改革30余年历程回顾

回顾国企改革历程，在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国企改革先后经历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战略性改组、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阶段。

放权阶段：1978-1984年

★ 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赋予国企自主经营权，同时推进利税改革，实现国企放权让利。

关键词：自主经营 利税改革 放权让利

权利分离阶段：1985-1992年

★ 1984年中央明确了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指出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沿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逐步推进政企分开。

关键词：所有权、经营权分离 政企分开

现代化阶段：1993-2002年

★ 1993年，国企改革开始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并在90年代后期经历了“抓大放小”、战略性改组带来的阵痛。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优胜劣汰 下岗分流

股份制阶段：2003-2013年

★ 2003年，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关键词：股份制

混改阶段：2013年至今

★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新论断，包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等诸多重要内容。2015年9月13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国企改革进入新时期。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

解读

淡马锡核心是完全市场化

【本刊综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以管资本为主、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国有资本改革、相对独立的董事会制度等意见。这被称为是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为蓝本的改革。新加坡政府拥有淡马锡控股公司100%的股权，其营业收入占到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从1974年成立初投资组合总值仅为3.54亿新元到2013年的2150亿新元，淡马锡控股的股东总回报率达到16%，被誉为国有资本运营的典范。中国部分领导层一直颇为崇尚淡马锡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蓝璐璐强调，淡马锡模式的核心是其严格遵循《公司法》规定，以资本为主成立相对独立的董事会制度，从而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完全市场化运作，同时在适当时机通过重组、上市等方式实现“国退民进”。至于中国是否该效仿淡马锡模式，她认为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具体如何操作和将淡马锡模式的精髓运用到中国国企改革中。

未来30万亿国资进股市

【本刊综合】随着《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国企改革的目标、步骤、方向、重点都将明朗化，发展实体经济是下半年国内经济发展重头戏，下半年国企改革将出现井喷式发展。有央企人士表示，国有企业改革将以市场化为导向，可能会有大量资产面临清理和退出，或者兼并重组，通过证券交易和产权交易将成为主要方式，但本次出台的顶层设计文件内容偏向于原则性、纲领性，还将配套具体的改革细化落实文件。安信证券研究报告梳理出四种国企兼并重组类型，在外向型国企重组上，包括“一带一路走出去”和“高端装备走出去”两项战略下的央企兼并重组；国内方面，包括“淘汰过剩产能”和“提高行业集中度”两类重组。“资产证券化未来将提速。”财富证券认为，目前国有资产资产证券化率只有30%不到，初步测算估计，未来几年内将有30万亿元之巨的国有资产进入股市。

焦点

国企改革顶层方案落地

【本刊综合】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未来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共分8章30条，从改革的总体要求到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等方面，全面提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意见》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意见》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是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为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意见》提出，强化企业内部监督，突出对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

为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意见》强调，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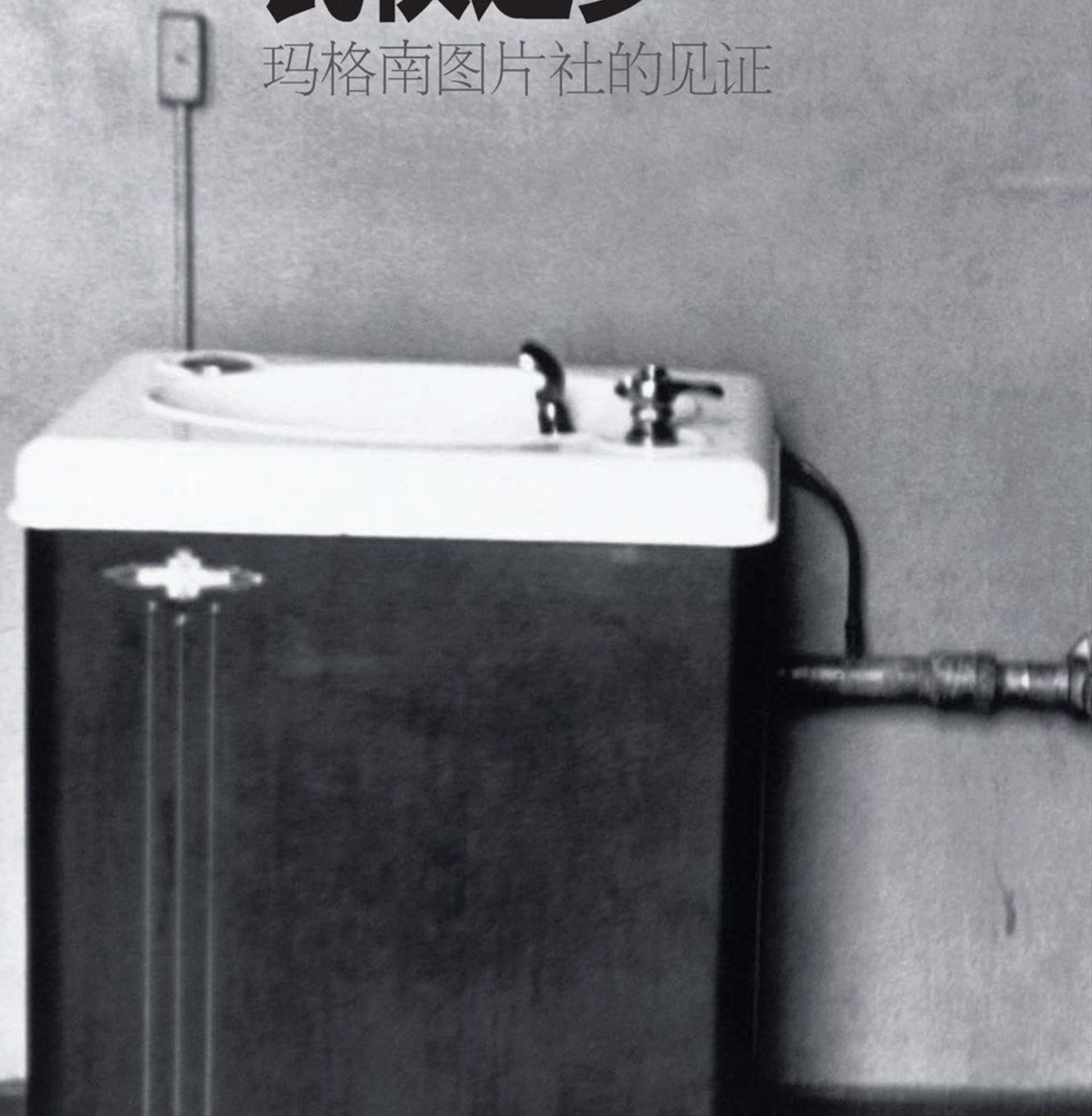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30
万亿元

WHITE

民权之梦

玛格南图片社的见证





COLORED

1950年，北卡罗来纳州，水龙头分白人和黑人使用。美国当时实行种族隔离的基石是由最高法院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直到1950年代，美国南部有17个州在公共设施方面实行隔离，包括学校、医院、剧院、餐馆、公共交通和其他很多地方。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标志符号，显示白人这边、黑人那边。有仅供白人使用的厕所和午餐柜台，有隔离的饮水台和候车室，车站里有“白人”和“有色人种”标志。在伯明翰市的一个歌剧院，白人观众可以通过前门进入戏院，而黑人观众必须绕过街角的一个巷子，从一个标明只有有色人种可以进入的戏院门口进入。



1965年，阿拉巴马州，从塞尔玛到州首府蒙哥马利的游行。马丁·路德·金与游行人士臂挽臂走在队伍里。此次游行旨在争取投票注册权。游行起初一度受到警方持续的暴力阻挠，后来在法院的许可下才安全进行。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第一次游行的八天后，约翰逊总统发表电视演讲，为自己向国会递交的投票权利法案寻求支持。他称：“塞尔玛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更大运动的冰山一角，它触及了美国各个州、各个部门。它是美国黑人为确保他们能够完全享有美国生活中所有恩典而做出的努力。他们的事业也必须是我们的事业。因为这不光是黑人，事实上这关系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必须战胜偏执和不公的劣根。而我们必将得胜。”

1955年3月，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名15岁的非裔高中女孩在公交车上拒绝起立给一名白人让座。她坐在一个指定给白人的公交车座位上。在她一次次拒绝让座以后，她被白人司机驱逐出公交车，并被赶来的两名警察逮捕。随后，她被控践踏种族隔离法和对他发动人身攻击。她叫克劳德特·科尔文。

9个月后，42岁的罗莎·帕克斯做了同样的事情。她是美国黑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蒙哥马利当地的活动积极分子。日后，她的自传记录道：“人们总是说我不让座是因为我累了，但这不是真相……仅仅是因为我对屈服感到厌倦。”帕克斯拒绝给白人让座，随后被逮捕，被控扰乱社会秩序并受审。她日后被称为“现代民权

运动之母”。

很快，蒙哥马利的5万多名非裔美国人愤怒了。他们在那一年掀起了抵制乘车运动。作为当地公交的主要乘坐人群，他们的抵制活动持续了380多天，严重打击了公交经济。直到美国联邦地区法院1956年宣布，“要求在公共汽车上进行种族隔离的阿拉巴马州的州法律和地方法律违宪”，且要求蒙哥马利公交车种族隔离制度终止以后，运动才告终。

一名26岁的牧师在那场抵制公交种族隔离的运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蒙哥马利的抗争运动中入狱，家也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炸毁。日后，他坚持主张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争取非裔美国人的基本权利，在全美的各个场合推动抗争。8年之后，他在

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他是那场民权运动最著名的代言人，马丁·路德·金。

如果从蒙哥马利抵制公交车种族隔离的那场运动算起，美国现代民权运动——这场美国黑人为争取与白人同等地位而发起的全国性非暴力抗议运动，已经过去60年了。这场运动持续了10多年，最后以民权法案的推出告终。法案结束了美国长期以来的黑白种族隔离政策，试图保障黑人的投票、住宅、公共场所享受同等服务的各项权利。众所周知，后来他们迎来了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奥巴马。

这是由著名纪实摄影图片社“玛格南”推出的，由多位摄影师定格记录的那场“民权之梦”运动。（曾鼎）



1965年，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围观到蒙哥马利游行的白人，他们在嘲弄游行人群。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得到了一些白人的支持，但也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很多白人居民憎恶这种对他们生活的改变，他们拒绝种族融合，认为只有待在一个有更多白人的环境中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这其中，美国的白人公民协会和著名的三K党甚至利用殴打、刺探、解雇、驱除和各种形式的恐吓与骚扰，来压制试图注册投票或争取社会平等的黑人。



1961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国民警卫队士兵进入公车，保护“自由乘车者”坐车前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自由乘车”是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在南方种族隔离的州际公车上组织的旅行，以测试此前不久美国最高法院在一桩案件中的判决（柏恩顿诉弗吉尼亚州案），该判决认定州际旅行中进行种族隔离违宪。在“自由乘车”运动当中，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试图打破各种族隔离的界限，比如使用“仅供白人使用”的设施。运动中，有人在蒙哥马利被大量白人暴徒袭击，甚至还有公车遭到火焰弹袭击。



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黑人学生在空降师士兵的护送下进入整合学校。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人不会对这一幕感到陌生。当9名非裔美国学生要求自己升入整合学校时，阿肯色州小石城爆发了危机。种族隔离主义者施加了巨大压力。阿肯色州州长福布斯召唤国民警卫队，阻止这些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心执行此前“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该案判决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艾森豪威尔命令将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命令他们回到驻地。随后，他命令第101空降师开进小石城，护送学生入校。



1964年，阿拉巴马州塞尔玛，黑人在10月7日“自由日”那天争取投票注册权。来自全美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SNCC）的抗议者举牌呼吁黑人投票注册。阻止黑人投票是当时白人至上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州要求交人头税、居民条件和文化考试，提高投票门槛，实际上将黑人屏蔽在外。此外，当时的一些暴力行为也阻止了黑人投票。到1963年，南方投票注册成为自由运动中废除种族隔离的一部分。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通过后，跨过州郡障碍、保护和维持投票注册活动成为运动的主要任务。这导致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出台，为所有公民合乎宪法的投票权提供了保障。

□ 图片编辑 丁大伟
□ 文字编辑 路琰
□ 美编 虎妹





1958年，弗吉尼亚州，整合学校里的白人和黑人小孩。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中，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并未提供黑人学生公平教育，公立学校对白人与黑人儿童的种族隔离对有色人种儿童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因此公立学校应该要种族整合。此后，一些城市宣布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开始对学校进行种族整合。不过，南方多地如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弗吉尼亚州也出现了“大规模抵制”活动，州内高官和民众都卷入了风波。在弗吉尼亚州，有的郡为了回避整合，甚至关停了公立学校。



1964年，华盛顿特区，8月28日，人群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广场，要求争取劳工权益和种族权利的平等。这一天的广场聚集了25万名民众，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的那篇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使民权运动登上高峰。这次集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受到联邦政府的密切关注，终于迫使国会在翌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并赋予黑人拥有平等选举权，这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史的关键事件。

揭秘伪满最精锐军事力量 铁石部队兴亡录

文 / 胡博

1946年1月5日凌晨，不顾严寒的长春各界人士纷纷齐聚机场。沦陷14年后，长春终于要迎来中国政府的军队。上午7时，18架载有200名官兵的C-47运输机在隆隆声中陆续降落。第一名带队军官迈出舱门时，整个机场沸腾了。热烈的人群手舞旗帜、递上鲜花，口中高呼欢迎之词。早有准备的媒体则不断按下相机快门，准备在当天以号外的形式报道。

然而面对长春人民的欢迎，走下飞机的200余名官兵内心苦闷，有人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讽刺。就在4个月前，他们都是“满洲帝国”的国军——铁石部队的成员。

代表关东军面子的伪军

时间回到1944年，在共产党冀东抗日武装的不断打击下，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武力“扫荡”冀东，但在制订计划时发现手头兵力不足，就向关东军发出“借兵”请求。关东军当时实力防住苏联军队都属勉强，但不便拒绝，考虑再三后决定从伪满军队挑选合适部队。

这支伪军不能丢了关东军颜面，所以关东军在给伪满军事部的“请求”中提出“必须是精锐部队，才能担此重任”。日方名为“请求”，实与命令无异，时任“军事部大臣”的邢士廉不敢怠慢，当即命令各军管区上报可供执行任务的团级部队。

经筛选，伪满军事部从备选的10个步兵和骑兵团中选定4个，即步兵第26团、步兵第37团、骑兵第47团和骑兵第49团。其中两步兵团合编为旅级规模的铁心部队，任命日本军人（在伪满军队的日籍军官都已加

入伪满国籍）栗野重义为部队长，刘德溥和日本军人南清一担任步26团和步37团上校团长。两骑兵团合编为旅级的铁血部队，任命日籍军人岩田熏为部队长，呼赫巴图和郭文通担任骑47团和骑49团上校团长。

铁心部队和铁血部队合编为铁石部队，取伪满军训中“铁石纪律”之意。奇怪的是，日方和伪满方都无意设立铁石部队司令部，只成立一个联络部，任命日籍军官南博彦任部长，另由关东军派遣一名大佐军官担任军事顾问。联络部下设机构与常规司令部无异，但为部长的南博彦却只是一名上校，而所属铁心部队长和铁血部队长都是少将，南博彦的职责也只是居中联系和调配两部作战事宜，显得十分怪异。

铁石部队装备之优良，在伪满军队中绝无仅有，直叫友军羡慕和嫉妒。此外，邢士廉还陆续组建起战车部队“铁虎部队”、通信营“铁波部队”、辎重营“铁轮部队”、由朝鲜人组成的独立步兵队“铁人部队”。它们被编入铁石部队，总兵力达16000余人。1944年12月7日，值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三周年，铁石部队宣告成立。选择这一天或许是为了让部队沾点喜，为今后作战开个好局。

21日，铁石部队在锦州接受第1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检阅。溥仪所遣特使中校侍从武官田宏图，代为宣读“圣谕”，要求部队能够“日满同心”、“发扬国军精神”。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则希望“日满两军本着同心容德，共存共荣的精神，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而努力”。检阅结束后，军方举办盛大欢送出征宴会，铁石部队中校以上军官全部参加，这

让不少经常被排斥在宴会外的伪满籍中国军官感到意外，但任凭宴会上日军代表如何吹捧，他们都对即将奔赴的冀东战场感到前途未卜。

狼奔豕突于冀东

1944年12月23日，部队陆续向冀东开拔。其中铁石部队联络部进驻唐山，受华北方面军宪兵司令官兼特别警备队长加藤泊治郎中将指挥，直属各部队分驻唐山和滦县，承担作战任务的铁心部队分驻滦县和迁安，铁血部队驻防滦南。

对于“邻国”友军的到来，铁石部队受到唐山日军的欢迎。铁石部队能不能承担起“冀东治安”的任务，加藤则表示怀疑。

以铁心部队为例，该部从1945年1月8日到8月15日，参与“扫荡”三十次，其中有重点进攻三次，可谓作战颇多。但用刘德溥的话来说，“由于解放区军民一体，组织严密，从未包围住过八路军。而广大人民群众，在同仇敌忾和坚壁清野的行动下，被包围住的仅是一些老幼妇孺……不论昼夜风雨，只要发现伪军行动的信号，全村居民则扶老携幼地向山里躲藏”。

铁心部队与八路军有过正面交锋。根据华北日军情报显示，冀东八路军主要集结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的东、西莲花院，这也是铁石部队进入冀东后的首要进攻目标。根据计划，由铁心部队负责进攻南莲花院，铁血部队负责进攻北莲花院，战车部队支援南北战场。

进攻开始时，铁心部队遭到八路军雷区的“热情招待”，一时间到处都是爆炸

声，步37团先头连有50余人或死或伤。遭此打击，任凭日籍军官如何呵斥鸣枪，士兵都不敢继续前进。等到工兵部队排雷完毕时，八路军主力早已转移。

1945年3月，步26团1营在下官营执行“扫荡”任务，突遭八路军伏击。营长李治唐反应迅速，命令一个连从右翼包围住八路军的伏击高地。根据火力推测，李治唐判断高地上的八路军顶多100人，便壮着胆子命令部队全力进攻，试图打出铁石部队进入冀东后的第一次大捷。

面对步26团的进攻，八路军不但数次打退进攻，还组织一次反击，并成功突围。当李治唐攻上高地时，只找到一名因负伤无法移动的八路军战士。即便如此，李治唐还是没能将其俘获，因为他等伪满士兵靠近后拉响了隐藏起来的手榴弹，这一事例给伪满士兵极大震撼。

如前所述，频繁执行任务的铁石部队

总反遭八路军伏击。每次战斗伤亡只有百余或数十，但数据累计起来就很庞大了。铁石部队的士气日益低落，日本军官的欺凌更是增长了中国士兵的抵触情绪。

1945年6月下旬，步26团2营外出征粮时在张庄子休息，突遭八路军三面进攻。日本营长高山急忙组织部队抵抗，并用无线电向团部报告发现八路军主力，请求增援。栗野重义认为是一次歼灭八路军主力的绝好机会，便命两步兵团倾巢出动。栗野没想到这是高山为了活命而谎报的军情，等到步26团主力靠近张庄子时，八路军已经撤退，被围的第2营也只是伤亡了20余人。

刘德溥解围成功后率部返回驻地，不想正与前来驰援的步37团遭遇。由于天黑视线不清，双方又没有及时沟通，致使刘德溥和南清一都认为对方是八路军主力，互相开火，直到靠近时才发现是友军。奇怪的是，这次夜战枪声虽然激烈，但却只有一人

负伤，这人正是南清一。南清一伤势不重，他在简单包扎后就带着部队返回驻地。铁石部队联络部长南博彦得知后却觉得十分诡异，枪声密集的情况下，正面交锋的士兵无人伤亡，阵后督战的团长却中枪负伤，南博彦判断是有不满日本军官的中国士兵所为，便下令调查。最终查不到确切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与铁心部队相比，铁血部队同样是四处碰壁。在1945年6月的昌黎“讨伐”中，铁血部队队长岩田熏亲自指挥所属两个骑兵团猛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骑47团在昌黎东北发现八路军游击队，团长呼赫巴图尔盲目命令所部实施追击，结果落入冀热辽军区新编第14团的伏击圈，当即伤亡20余人，损失军马50余匹。呼赫巴图尔生怕继续前进再有不测，急忙命令部队回撤。

↓ 一群正在列队的伪满洲国军队，这支傀儡部队将自己绑架在日本的侵略战车上，最终一起覆灭。



骑49团的遭遇更是成为笑柄。该团第1连途经一个村庄,发现村内空无一人,村外只有几名老百姓模样的人作观望状。日籍连长小泉和雄认为村内老百姓知道军队要来就全部逃跑了,便命令部队入村搜集柴草。不想突然遭到八路军的四面围攻,第1连大部分官兵还没反应过来就在30分钟内全连覆没。事后有日军军官笑道:“铁石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到现在还不知道,八路军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八路军这个事实。”

铁石部队进入冀东地区半年有余,不仅没有改变冀东战局,反使八路军活动更加频繁。对此,加藤泊治郎无奈评价:“堂堂一万余人,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只是告诉八路军,冀东地区是有军队驻防的,但其效用和草人有什么区别呢?”

抗战结束后的可悲命运

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铁石部队联络部向所属各部转达了军事部下达给各部队“星夜回国”的命令。消息灵通者已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不愿回到“满洲帝国”

**铁石部队进冀东地区半年有余,未能改善战局。
上级讽刺:“堂堂一万余人,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只是告诉八路军,冀东地区是有军队驻防的,但其效用和草人有什么区别呢?”**

继续效命,便开始谋求新的出路。

刘德溥从栗野重义处接到“向滦县车站集中,轻装上车回国”的命令后,便寻找各种理由拖延出发时间。他在得到栗野同意暂缓出发的命令后急忙返回团部,联合团部中国军官决定反正。

15日下午2时,刘德溥以栗野要来团里视察为由,将全团军官集中到团部。待军官到齐后,刘德溥一声令下,将所有日本军官逮捕,随后公布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并宣称自己早就与国民政府有联系,这次是奉命战地反正。刘德溥就这样掌握住了步26团。

步37团团长、团附、营长都是日本军官,直接收编势必引起抵抗。刘德溥决定仍然以栗野的名义邀请步37团军官到位于榛子镇的步26团团部开会,乘机将日本人逮捕,中国军官则动以情谊和反正是的光荣身份而将该团掌握在手。最后,光杆司令栗野重义也顺从地当了刘德溥的阶下囚。

铁心部队成功起义后,刘德溥自任旅长,他任命关瑞玺为步26团团长,申绍志为步37团团长,并派人寻找八路军表示反正之意。

与此同时,骑49团团长沙文通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不愿投降国民政府,也不愿接受八路军改编,他命令中国军官将日籍军官缴械,随后带部队迅速包围骑47团,并动员该团中国军官随他返回老家建设家乡。在郭文通的号召下,铁心部队很快抱成一团,随其回兴安各地解甲归田。郭文通则在内蒙参加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参事、人大代表,于1971年因病去世。

至于铁石部队联络部以及所属的其余

各级单位,则都在得知日本投降后作鸟兽散,不到两天就全部自行解散。至此,铁石部队剩下的“血脉”只有刘德溥这一支了。

铁心部队实力尚在,自然成为国共双方的争取对象。刘德溥本想投奔八路军,但随后决定投靠他所认为实力更强大的国民政府。刘德溥先行打出“榆关先遣混成第1旅”旗号,随即派人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取得联系,在熊式辉批准下将所部改编为东北保安第2总队。至此,这支伪满精锐摇身一变,来到国民政府辖下。

由于总队官兵都是东北人,他们都希望

开回老家,包括刘德溥。且部队在滦县驻防九个月,在当地名声实在不好。为此,刘德溥几次向东北行营提出返回东北的要求,一直被熊式辉拖延着。

转机在1946年初到来。国民政府在苏联军方告知即将撤出长春时,决定派兵正式接收。熊式辉本想派自己一手组建起来的老部队即第5师接受这一任务,却遭到第5师的上级第94军军长牟庭芳的拒绝。第94军隶属第11战区,熊式辉不便越权强行调动。就在这个时候,刘德溥发来请求前往长春的电报。熊式辉考虑到自己对刘以及保2总队有知遇和保全之恩,如放其返回东北必定更加感恩戴德供自己驱使,便同意了刘德溥的请求。

消息传到滦县,保2总队官兵一片欢腾,他们连夜乘坐火车抵达北平,随后于1946年1月5日凌晨乘坐飞机开赴长春。返回长春值得保2总队官兵兴奋,运输当中却厄运不断,首先南苑机场上发生了一架运输机滑出跑道撞上电线杆的事情,接着,长春上空又有两架运输机相撞坠毁,导致机上和地面官兵80余人身亡。

经过15天波折,保2总队的8000余官兵总算全部抵达长春。仅过了3个月,4月14日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长春时,他们便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猛烈进攻。刘德溥率部抵抗,在坚持4天后大部被歼灭,他只得带着残部突围。

一个月后,长春又重新被国民党军占领,刘德溥闻讯急忙带着残部“光荣”返回。此后他以长春为根据地,招收原伪满的失业军官和士兵以不断扩编部队。1947年9月,部队改编为暂编第56师,刘德溥任师长。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刘德溥的部队终于从地方保安部队转变为正规军。但他这个师长只当了3个月,就被外调到第49军去当有职无权的副军长,一年后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直到1975年被释放。暂56师则被留在长春,于1948年10月向解放军投诚,铁石部队的历史至此划上句号。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



(澳门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公司)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刊为此版所列航空公司航班和酒店商务客房指定读物



(鑫海锦江大酒店)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新都酒店)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银座泉城大酒店)



(深圳香榭丽宫酒店)



(深圳丹枫白露酒店)



(福州西湖大酒店)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



(四川峨山饭店)



(云南天恒大酒店)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丽江官房大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广东富盈酒店)



(君亭酒店)



(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南京中心大酒店)



(深圳维景酒店)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珠海度假村酒店)



(帝豪花园酒店)



(珠海华骏大酒店)



(深圳戴斯酒店)



(常州大酒店)



(上海市虹桥宾馆)



“流血星期日”，沙皇和工人都冤大头

1905年1月22日是星期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由加邦神父领导的“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组织彼得堡15万工人去冬宫向沙皇和平请愿。当队伍到达冬宫入口时被封锁住了，军警突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死伤达460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成

为俄国1905年革命的开端。

这场著名的流血事件，后世一般归之于沙皇的残暴以及加邦神父的阴谋。然而，后来有证据表明，沙皇和工人其实都是这一事件中的冤大头。

1996年，一位名叫伊·阿·伊萨柯夫的人，爆出了一位见证人玛丽娅·加

芙里洛夫娜·普拉斯季尼娜的一段自述：

“我当时19岁，是一个纺织女工。我是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的见证人。在拥挤的人群中，我被挤到了前面几排，直接面对着士兵的防线。混乱中大群工人走近了冬宫。这时候，一位军官穿过士兵的队伍走过来。我们这些工厂的姑娘都瞧着这个年轻、精力充沛、表情严肃、穿着笔挺的军人，特别欣赏他整齐的小胡子和不高军官帽。看起来，他不满意人群太靠近军队。但一切都很安静与平和。突然，人群中有一个穿戴齐整的人很快地向那军官走去，军官停下来并抬起头，看来好像等待来说什么或有什么请求。但来人迅速拔出手枪向军官射击。军官倒下了，与此同时士兵向人群和空中开枪。而我竟幸免于难。”

“所发生的这一切，晚些时候，在30年代，我曾讲给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俄国女革命家，十月革命后曾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那时我和她很熟。她很仔细地听我说完，说：‘玛莎，此事对任何人都不要再讲，弄不好，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此后，玛丽娅一直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直到1961年她才向伊·阿·伊萨柯夫秘密地讲述了当年经历的一切。



1905年1月22日，沙俄军警向示威群众开枪，史称“流血星期日”。

古代书生“十年寒窗”仅是入门

人们总爱以“十年寒窗”来比喻学习不容易，似乎在古代，一个书生寒窗苦读十年才能有所成。其实，十年寒窗在古人看来，仅是做一个读书人的入门而已。

按照元代程端礼所著《读书日程》中所说，一个读书人，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八岁入学后，依次读《小学书》《大学》《论语》《孟子》《中

庸》《孝经勘误》《易》《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三传》。十五岁开始依次读《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论语或问》《孟子或问》。有十年之功，才仅是“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之后才能登堂入室，真正去做学问了。

英国人笔下的中国私塾读书情景。



安徒生可能是国王私生子

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的安徒生虽然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但他的童年并不美好，是在贫穷和劳苦中度过。他出生于欧登塞城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父亲是鞋匠，母亲是洗衣妇，童年的他无缘接触教育，总要帮父亲母亲做活。闯荡世界的过程中，他更是饱受世态炎凉，险些饿死。不过，有人指出，这位出身贫苦、命运坎坷而一直保持赤子之心的大作家，很有可能是国王的私生子。

历史学家延斯·约根森写了《安徒生——一个真正的童话》一书，说安徒生其实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和劳尔维格伯爵夫人的私生子。出生后，王室把他安置在了一个欧登塞鞋匠的家中。作出这种推论的根据是，安徒生是一个鞋匠的儿子，身份低微，可是后来竟能进入上流社会，出入于皇家

剧院，甚至在皇家宫殿阿马林堡宫居住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王室的暗中帮助，这些是不可能的。丹麦作家皮特·赫固也支持此说法，并提出了另一种根据，一位海军上将的女儿亨丽艾特·吴尔芙1848年给安徒生的信中提到，安徒生自己也发出自己是“王子”的慨叹。

欧洲各国王室都坚持一夫一妻制，但享有权势和财富的国王们总会有很多情妇，留下私生子众多。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自然不能免俗，他确实有不少情妇，并有私生子。丹麦著名历史学家塔格·卡尔斯泰德翻阅了大量有关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档案，确认了国王有多位私生子。克里斯蒂安国王还曾专门照顾自己的一位私生子，将自己与一位挪威妇女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里德安排在王室猎场掌管狩猎工作。那



安徒生

么，安徒生受到王室暗中帮助便是有可能的。当然，很多人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认为安徒生足够伟大，没必要再寻找什么王室光环为其增光。

悲催的纳粹二号人物

执政德国时期，纳粹各大佬可谓风光无限，从希特勒算起，无论希姆莱、戈贝尔还是戈林，在败亡之前无不都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凡事总有例外，有一位纳粹党的大佬，且曾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却在纳粹党还是鼎盛时期便陷入了悲催的命运。这个人就是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

1894年，赫斯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德国商人家庭。1920年7月赫斯参加纳粹党，成为该党的第16名党员。1923年11月，赫斯追随希特勒进行了著名的“啤酒馆暴动”。暴动失败后，赫斯和希特勒一起坐牢，笔录了希特勒的名作《我的奋斗》。1925年纳粹党重组后，赫斯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2年12月，赫斯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中央政治委员主席。同年，赫斯成为德国国会的纳粹党议员，晋升为党卫军上将。继希特勒出任



德国总理、纳粹党登上国家权力舞台之后，1933年4月21日，赫斯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成为纳粹党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进而在1939年被希特勒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顺风顺水时，赫斯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二战全面爆发，英德两国大打出手之际的1941年5月10日，他独自驾机飞往英国，着陆后声称要完成一项和平使命。英方并没有将他视

风光时刻的纳粹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

为和平使者，而是将他监禁，并在1945年把他与其他战犯一起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即使一些和他一起审判的重量级人物如邓尼茨、斯佩尔、席腊赫得到释放后，他仍被关押。直到1987年，已经93岁的赫斯在狱中自杀身亡，整整坐了46年的牢。赫斯为什么飞英，已经成为谜案，要等到2017年英国相关档案解密才能大白于天下。

袁世凯之问： 共和需要多长时间？（上）

文 / 傅国涌（历史学家）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辞位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这样被全国上下接受了。

当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

“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袁、顾对话

几个月前，年轻的顾维钧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他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当他应时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之召回国，第一眼看到袁世凯，留给他的印象就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共和之问，他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

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对此颇有疑惑，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他回答：“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

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

这次谈话让顾维钧意识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顾维钧回忆录》）

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共和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袁世凯之问，真的无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还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袁确实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他只是以帝国时代丰富的从政阅历来思考问题，而举国上下又有几人真正明白共和到底是什么？

“共和”进入民国教材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帝制的循环中打转，一代代的哲人圣贤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中华民国诞生之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迅速推出的小学教科书，为顺应时代的需要，才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共和的课文。

商务印书馆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书干脆就叫《共和国教科书》，每年的发行数都在700万本以上。新国文初小第四册即有课文《大总统》，第七册有《共和国》《自由》《平等》等课文，第八册有《国庆日》《选举权》《法律》《司法》《行政》等课



袁世凯 (1859-1916)

文。《共和国》一课简明扼要，将共和的原则说得清清楚楚：

“共和国者，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一切政务，人民自行处理之，故亦谓之民主国。”

虽然，一国之人多至多，欲人人参与政事，为事势所不能，于是有选举之法，选举者，由多数人选举少数人，使之代理政务也。

共和国以总统组织政府，以议员组织国会，总统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职权、任期，皆有限制，故无专擅之弊。”

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小第八册也有《选举》《博爱》《平等》《自由》《好国民》等相关课文。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国体与政体》《民国成立始末》《共和政体》等课文，第二册有《人民之权利义务》，第三册有《国家》《国民》，第四册有《地方自治》《共和国之模范》《共和政治之精神》《临时约法》，第六册有《政党》等课文。《共和政治之精神》以“平等、自由、博爱”来概括共和政治的精神。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二册有《自由》，第四册有《博爱》，第六册有《人权》等课文。何谓人权？课文如此回答：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与民国同步诞生的中华书局，抢先推出适用于新时代的教科书，抢了商务印书馆的先机，得到了部分教科书市场。在《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孩子们也可以读到《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记》《国体之别》《政体之

别》《共和国之自治》《共和国之责任》《共和政治》等课文。

正是透过这些教科书，共和观念悄悄地渗透到千千万万少年的心中，与报刊等媒介中盛行的共和话语，与标榜民主、共和的政党一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浪潮。

共和国民如何养成？

对于在皇权意识中浸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共和”完全是个陌生的观念，有之，也不过是古老的“周召共和”。1903年，少年邹容鼓动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出现了“共和国”的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么是“共和”，是不是就是“周召共和”的那个“共和”。而辛亥革命造成的时势，却是一边倒的共和呼声。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谈起当年的选择，还充满无奈：

“当时华民醉于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满清之得力口号，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习惯，尔典与美使嘉

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少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

唐绍仪骨子里是个共和主义者，他倾向共和并非一时感动。袁世凯之接受共和确是时势造成，并非出于对共和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共和是什么？民国是什么？他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陌生。

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当大势所趋转向共和之际，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提出，“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度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国民程度不足，不宜实行共和，是当时包括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内许多人的看法。不过张謇很快发现国民程度确实不足，有些学生误以为共和就是放任，不要秩序。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报》发表文章批评这一现象，指出欧美养成共和国民，“惟以重公德、爱秩序为唯一之方法。”（《张謇全集》）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骏的对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议员席深感不满，他认为，

“我们已经走到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一切接受议会政体的地步，尽管亿万人民还远远没有达到实行代议制的程度。”他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我们当中多数人甚至不懂什么是宪法，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对于政府体制漠不关心。对政府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识，并使他们关心政治从而引导他们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过问政治。政府过去所做的只有使人民觉得，过问政治是一条可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险道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凯的器重，希望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袁。然而，这是袁不会去做，也不愿做



顾维钧 (1888-1985)

的。让国人关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识，也就是张謇所说的养成共和国民，这与袁的经验和认识距离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所以，我们只看到他下令改教科书，删除“自由”“平等”等课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设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内容都要被删去。（《钱玄同日记》）商务印书馆被迫将“共和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共和纪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这一纪念日就被废止，学校照常上课（1917年又恢复了这个纪念日）。毫无疑问，这些带有“共和”记号的课文、日子，跟袁世凯都显得格格不入。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袁世凯跟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几年后，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颁布的一个告示，对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试图肯定共和主义的信仰怎样深入遥远的边区，又要奖励那里刚刚归信的共和主义者：

据蒙藏事务局呈：科尔沁旗亲王伊锡海顺咨请该局转呈称，该旗呼图克图昆楚克楚隆木布尔率其部属拥护民国，请予褒奖。查该呼图克图率其部属效忠民国，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其乘坐黄缎蓬盖马车，以示宠荣。

透过这个文绉绉的告示，这位美国外交官发现，“这种承袭清朝的、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中国大部分社交礼节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到总统府呈递国书时，来接他的那辆庄严华丽的礼车用八匹骏马驾驶，车身涂着描有金饰的蓝珐琅，以极其豪华的帝国宫廷的排场，来迎接他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即满洲贵胄、清廷的陆军大臣。

帝制时代的老办法、老规矩、老仪式、老排场，都是袁熟悉的，他摆脱不了，也无意摆脱。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 and 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 and 了解。”

这与顾维钧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



旦有机会，袁世凯就要将反对派赶走，甚至解散国会。这一点，梁启超、张謇他们没有看穿，即使他在政治上的对手、对共和国抱有强烈热忱的宋教仁都没有看穿，他们对他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曾长期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的芮恩施，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黄浦江边曾有一个感觉，“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的种籽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究竟是一

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他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个人统治和帝制传统阻碍了中国人的这种努力，同时他们也缺乏经验来作指导；此外，他们还受到外国的怀疑和反对。”（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外国人对中国共和态度悲观

当时，有许多长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共和前景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对濮兰德的长篇采访，此人是英国人，自1883年以来长期在中国任职，曾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过，对中国相当熟悉，著有畅销书《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等。他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称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

“普选代议制并不是解决方案。在现今中国，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今后若干年也不可能实现。历史经验表明，相信中华民族会突然出现激进变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变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据这位“中国通”的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任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这与鲁迅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在他的系列小说和杂感中，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濮兰德断言：“这里并没有诞生一个‘全新的中国’。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中国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人类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表明，中国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绵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两年内或者一代人之内就发生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说，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是几个世纪来根植于英国民族内心、与生俱来的一

种精神表现。这种精神起源于英国宪章革命，通过移民由“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成为英美两国人民追求自由权利的基础。

“你不能指望仅仅通过大叫两声‘共和’，便可以把这种精神成功地灌输给那些从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人们。”（郑曦原编《共和十年 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这些看法即使到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1913年10月13日，在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长期研究中国事务的日本人佐原笃介，写信给袁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伪装的军事独裁的专制政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成其为共和国。……袁世凯现在尽管年富力强，但是不能指望一个血肉之躯永远活着。他死后谁能治理国家？我看最好是在他的背后建立一个由皇帝统治的好制度。”他主张把权力交还给宣统皇帝。（《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这些外国观察家的意见，袁世凯不会毫无耳闻。他称帝之前最担心的也不是国内的反应，而是外国能否接受。他在1913年迅速击败革命派，并将立宪派玩弄于股掌之上，共和体制在他眼中实在分量太轻了。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面向他表达英国的立场：“现行之共和，系世界所无之政体，既非共和，又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此种特别政体，断难永久维持。若早日议决正当君主立宪政体，则于中国

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缓和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社会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末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实际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

共和与君主立宪的较量

袁对内阁制一直深深怀疑，并一心予以抵制。这一点国民党人中具有洞察力的领袖宋教仁也早已看出。1913年2月1日，他在武汉写信给“北京国民党诸兄先生”说，“吾党形势，以此次选举观之，大约尚佳。惟可虑者，即将来与袁总统之关系耳。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政党内阁。近闻颇有主张不要内阁者，此最危险之事也。”（《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极力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政党内阁呼之欲出之际横遭暗杀，幕后主使者到底是谁虽无定论，而袁世凯不可逃避地成了嫌疑者之一。

围绕在袁世凯身边的梁士诒、周自齐等人都是共和政体的怀疑者，他们先后对

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一个因素。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负责。”（《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到了1916年6月4日，袁去世前二天，《纽约时报》还发表了梁士诒的署名文章《君主立宪制是中国的选择》，开篇即说：“中国到底应该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民会议的代表毫无异议地一致赞成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显然中国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他认为，“想要中国国体从根本上转变为共和制，就像强迫美国突然转变为君主制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他论证说，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宗教国家，基督教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将不同民族和地域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套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忠君”是维系整套国家政治体系的基石，也是国家建立“德政”的核心。他质疑共和制的致命弱点是不稳定性，中国如果想要在世界各国的残酷竞争中存活下去，注定要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共和十年》）

在赞成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发起人中，不乏胡瑛这样的革命党骨干。

让袁世凯无法理解的是，1915年12月举行的所谓“国民代表”投票中，1993人当中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明明是100%，想要求几张装点门面的反对票都不得。然而等到帝制真要登台，却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

其实，反对者未必对共和有多少的理解，包括袁亲信的北洋将领，他们反对的不是帝制。陈独秀的这番判断是可信的：“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1917年5月1日《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陈独秀文章选编》）

所以，袁称帝的失败也不代表共和观念的胜利，共和在中国依然有极为艰难而漫长的路要走。“袁氏之问”依然重若千斤。

这些外国观察家的意见，袁世凯不会毫无耳闻。他称帝之前最担心的也不是国内的反应，而是外国能否接受，共和体制在他眼中分量实在太轻了。

人民思想习惯，丝毫不肯。”（《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这对于他最终迈出称帝这一步，恐怕比他儿子袁克定专门为他印的假《顺天时报》影响更大。

此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博士在北京对芮恩施说过：“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

芮恩施表示喜欢君主政体。梁说：“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

“大公园丁”许君远

许君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报刊史乃至新闻出版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但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中，他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一个缺席者。

文 / 向敬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报刊史乃至新闻出版史上，许君远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然而，建国以来，历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史编撰者，几乎都遗忘了这位在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上很有成绩的有志之士。他消失在反右派的迷雾中，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缺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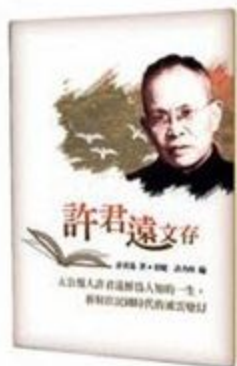
1902年，许君远出生在河北安国县，受父亲影响，自幼痴情文史，后入读北京大学英文系，曾听过陈西滢、林语堂、刘文典等大师的讲座，同废名、石民、梁遇春等同学交好，甚得了西林、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

结缘北大

1922年，许君远毕业于保定第六中学，当时一心一意想报考清华大学。由于军阀混战阻隔，耽搁了报名时间。待到战争结束后，他才约了几位同学去报考北大。那时的大学招生，不像现在一般实行全国统考，完全是单独招考。

是年，全国报考北大的学生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录取两百余人，六选一的录取率。许顺利地报了名，并通过了体检。应试当天，他看到很多的富家子弟，身着西装或绸缎长衫，而他却是一身月白大褂，挤在人群中难免有些自惭形秽。那年，北大共计录取212人，入校后先读一年预科，预科在北河沿第三院上课，后来又迁入沙滩红楼。一年后，许君远考入北大英文系本科，他在红楼共读了五年之久。

许君远曾写过一系列回忆北大师友，其笔下的北大生活，真实而感人。他没有身历



目见蔡元培在校的自由建设，而对蒋梦麟的苦苦支撑时刻铭心，也感怀于诸多学界精英的卓然和横绝。当然，“老一代的同学都在太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使之“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

许君远叹息，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早就有了许多专家学者”。

他对蔡元培时代北大的自由学风念念不忘；在同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中，在诗人的人格与文字中，他看到了美的充裕和高调；

他回忆报考北大的情景，细说“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的抱负作为；他憎恨汪兆铭对抗战中上海报界的迫害，更忘不了美国二十万侨胞的欢笑和泪滴。

五年的北大学习生活，铸就了许君远从业新闻出版的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成为一位作家、翻译家、老报人。自二十岁读大学预科开始，他便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积极投稿，在《晨报》《现代评论》《新月》《东方杂志》等报刊，频有文章发表，且多为连载。

大学尚未毕业，便加入编报行列，后辗转北京《晨报》、天津《庸报》、上海《文汇报》、重庆《中央日报》等媒体，创作不断。1949年后，他除了在上海《大公报》肩挑重担、长期编辑内刊《大公园地》外，还为上海四联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与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图书。期间，还有多部译作推出，他翻译的《老古玩店》迄今仍有学者研究其特色和影响。

右派先锋

然而，好景不长。这位《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决策者之一，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出席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著名报人、作家与翻译家，虽写过文章歌颂共产党、歌唱社会主义，但因希望宽松新闻管制环境，而被《人民日报》称为“右派急先锋”。1957年，他与徐铸成、陆诒被圈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三大右派”，并被发配到青浦县饲养场劳改，降职降薪，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

遭遇不幸，置身厄运，但他依然想用文字和思想，体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同信念。但是，厄运没有因为他的勇敢坚持而放弃对他的折磨与侵扰。1962年，许君

远因做白内障剥离手术失败,引起半身及手脚瘫痪,完全失去生活和工作能力,后又诱发肺炎,于60岁与世长辞。

许妻因惧怕红卫兵抄家,非常痛苦无奈地撕毁、焚烧了爱人遗留的大量文稿,包括其翻译的美国舞蹈家邓肯的30多万字自传,亦未能幸免。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中,许君远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一个缺席者。虽然沈从文曾著文对鲁迅漏选许氏文章入集《中国新文学大系》而抱不平,虽然张中行忆许氏和学生一起画《西厢记》中“鞋底尖儿瘦”的情景,虽然金庸忘不了许氏对其提携教导、为其证婚祝福的点滴,但许氏只能带着“《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的难得糊涂,长时间地被时人淡忘,被后人陌生。

许君远从业新闻、努力创作,鞭挞社会邪恶,呼吁文化救国。那种知识分子独有的忧乐情怀,自始至终地流荡在抒情散文、小品游记和小说诗歌中,或支撑着其新闻特写、时事评论与通讯报道,凛然动魄,摄人心魂。无论是其兼容作家艺术感、记者新闻感的文学创新,还是报告式的“白描”手法,他都能得心应手,精益求精。

作为“京派”重要一员,许氏虽没有名卷力作久远传播,但其对乡土的回味,对社会的观察,对文学的认识,对文学现状和民国文坛的评判,着实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有

许氏虽没有名卷力作久远传播,但其对乡土的回味,对社会的观察,对文学的认识,对文学现状和民国文坛的评判,着实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思想的作家的清醒与勇敢。

担当、有思想的作家的清醒与勇敢。

大公“园丁”

称他为“大公园丁”是有根据的,且不说其长期编辑《大公园地》,甚有功劳,但看他与“大公”的不解之缘,也实至名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艺界很活跃的许

君远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张季鸾、胡政之等前辈看重,1936年任《大公报》上海版要闻编辑,抗战爆发后任《大公报》编辑,1946年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

许君远在人才济济的《大公报》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的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独有个性有关,他对胡政之等人对他的赏识和重用十分感激。其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也无不让人感受到他的深情和敬意。在《大公报》虽是高级雇员、打工仔,但许君远倾注了主人翁的全力。

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许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才造就了报业领军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报纸成功的资本。他说:“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

在《大公报》及以后的日子,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不站在某个党派的立场说话,不逢迎某个集团,并坚持北大学子的自由意志,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一个“北塔山事件”,全国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总编辑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头上,许君远

被调任《大公报》资料组组长。

幸与不幸,都在一念之间。选择与坚持,都可见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杰出报人的心态和精神。综观许君远的人生,最耀眼的事业在民国时期,在他身上不乏20世纪现代学人的精彩和亮度。即便至后来,他一再被打翻在地,也保持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1958年,许君远被调回原单位上海文化出版社,由名编改当校对。

崇尚自由、向往民主的许君远,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耐,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始终没有放下笔。他化名或以朋友的名字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多篇散文、游记,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心雕龙》等研究考证文章。可惜这些文章大多一时难以查到。

学者傅国涌在《民国养育出来的许君远》中写道:“在许君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者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读他的文字,我们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味的气息。”

学者李欧梵曾言,“政治上气数愈衰,文化上的创造力愈旺”。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系列耀眼的名字,一大批耐读的著作,伴随着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现代化转型,生发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有光亮。然而,不同的阶级并立,不同的人生理念寻求,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本成绩斐然的杰出者,在后来狂风暴雨中,被洗刷了昔日的光彩。即便在红色光环照耀下,也慢慢销声匿迹,悄悄隐去。

历史不会使缺席者一直被湮没,或永远被失踪。冯文炳(废名)如此,丰子恺如此,还有叶公超、朱英诞、石民、丘士珍、刘任涛、温源宁、梁实秋、朱雯、周作人、陈林率等人都是如此,许君远亦是如此。



专访刘慈欣： 科幻作家 须看得比时代更远

记者 / 刘荣

继8月23日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雨果奖之后，9月12日，刘慈欣又拿下了第26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特别功勋奖”，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水准被世界认可。

9月14日，刘慈欣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接见。李源潮对《三体》和科幻电影的熟悉程度让人吃惊，“他竟然拿出了《三体》的第一部小说，扉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很多勾出来的句子和一些批注，可以猜测他看得非常认真和仔细。”

来自高层的认可，《三体》的热销，加上圈内有五部科幻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似乎都在应验一个猜测，“中国科幻界发展遇到了一个空前好的外部环境”。

不过，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誉为“单枪匹马将中国科幻拉到世界水准”的刘慈欣，并不喜欢被“封神”。他对行业生态深怀忧患，在银河奖颁奖现场说道，“就科幻行业整体而言，最好的时代还没有来。我的成功后面站着一群人。”

按科幻作家王晋康的话来说，刘慈欣今日的成功，是中国科幻百年长跑踢出的“临门

一脚”。与天赋和努力同样重要的是把握机遇的能力，时代潮流中的顺势而为，或许才真正锻造了这位科幻长跑的胜利者。

一个人和他的同类

2015年广州书展，刘慈欣与张嘉佳几乎前后脚出机场。

同为巨蟹座的两位畅销书作家，张嘉佳十分干净时尚，还戴上了明星范儿的墨镜。大刘则不修边幅，“斜挎了个包，胸前的扣子开到第三个，拖着箱子晃啊晃地走过来”，让迎接他的编辑王蒙印象深刻。

刘慈欣以类似形象示众很多年了，话不多，一身旧格子衬衫或黑衬衫，目光长期停在空气中的某一点，不聚焦，若有所思。

这符合他在山西娘子关火力发电厂的“刘工”身份。近三十年来，在自己的世界里规律生活，他精通计算机，工作尽责，生活稳定，“在阳泉市区已经有两套大房子了。”长跑，午睡，严格区分生活和科幻写作，将妻子和女儿的隐私保护得很好。

直到2012年，他结束了手头的所有工作，从2009年关停的火电厂离开。科幻从兼

职变为全职，他的重心转移到《三体》等电影的改编和推广。从一个人的世界，进入了一群人的世界。

在国内，坚持长期写作的科幻作家不过二三十人，平时分散在天南海北，偶尔一起喝酒撸串聊天。对于笔会，刘慈欣他们很少缺席。

编辑王蒙记得他“爱喝红酒，喝了话多，一点不装”，并亲眼看见一只烤乳猪被推过他身边，他两眼一下亮起来，像孩子看到了糖。来自科幻迷团体“未来事务管理局”的新华社记者姬少亭，则对某年的杭州笔会记忆犹新：刘慈欣扬言要把三维的杭州，二维化成一幅水墨画，这还不算厉害，他还要进一步一维化成一根细细的丝绸。“大家静止了几秒，开始鼓掌，而我的眼前白了一下，被想象力扔进了另一个空间。”她说。

和刘慈欣一起分享这个想象力世界的，是他的科幻作家朋友圈。从老一辈的科幻作家刘兴诗等人开始，到1970年代成名的吴岩，到八九十年代成名的王晋康、何夕、星河和韩松，再到更年轻的王璐、张冉、宝树、飞氲和陈楸帆，包括刚获得银河奖最佳新人奖的“90

后”索何夫等等,呈阶段状分布。

这个圈子外围,还有《科幻世界》团队和国内的科幻迷团体,以及重庆、漓江、新星、作家和人民文学等出版科幻作品的出版社。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口中“一个纯粹的绝少文人相轻的圈子”。他们中间,有的长期居住在三四线城市,有的则在北上广生活,并开始具备“世界人”的眼光,他们的创作风格,有的是老派传统的硬科幻,有的是偏软性的文学实验作品,有的两者兼备,并不单一。

现在,在一切可能的公开场合,刘慈欣都在为自己背后站着的这群人呼吁。他认为,中国科幻小说作家是所有作家群体中学历最高的。“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甚至有的还创业。”

但是,《三体》成功后的一系列反响,让他清醒地看到,单个畅销书并不能带动自己所有作品的销量,也无法改良整个行业的生态,科幻读者群依然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现在大家都是兼职,如果让他们放弃工作做专业科幻作家,可能就会出现生活问题。”

2013年,他以370万的版权收入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全国能够靠版税养活自己的科幻作家,包括我在内,也就那么两三个吧。”刘慈欣说。

心忧行业的他却很少提及,为何是自己成为了那个出类拔萃者。

冷战时代仰望星空

刘慈欣生于1963年,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里,生长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国内环境中,物资匮乏,个人自由意志很难得到实现。

他祖籍河南,生于北京,在煤炭设计大院长大,又被军人背景的父母带去了山西阳泉煤矿集团。

在人生轨迹的早期,刘慈欣还算幸运,赶上了新中国十七年创作的文艺繁荣,他的父亲收藏了很多50年代出版的书,包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高级货”,其中一本是凡尔纳的《地心引力》。到

了文革时期,文化肃杀,他的少年时代就靠翻出这些当时的“禁书”聊以打发,第二本读到的科幻小说是苏联的《宇宙神曲》。

现实显然比科幻冷酷得多。在刘慈欣的少年时代,充斥着冷战时期特定的产物。1970年的一个夜晚,他亲眼目睹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星空之美与地上真实的苦难反差是如此之大。“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2014年,他在《三体》第一部英文版的后记里这样总结。

科学的春天突然来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同年8月,文革后第一部科幻小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

早在20世纪初,西方科幻小说就已引入中国,因为战争和文革的影响,一度中断。直到改革开放,科幻迷们才真正体验了思想解禁,迎来了外国科幻小说出版热潮。除了凡尔纳,刘慈欣“顺势”读了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等科幻文学作品。

这一年,他鼓起勇气向天津的杂志《新港》投出了第一篇科幻小说,关于苏联,中国和北约等争夺一件外星人武器的故事,外星人留下来的礼物展开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这个没能发表的故事,已经孕育了他后来作品中的二维与三维切换的理念,并流露出了少年刘慈欣在冷战时代对和平的一种隐隐向往。

1981年冬天,他看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科

幻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英国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2001》。从此,他成为一个铁杆科幻迷。书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坎贝尔式”的硬科幻之美,并于很多年后,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出门仰望星空的心情,“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那时,他已经接触到了刊名还叫《科幻文艺》的《科幻世界》,以及其他科幻类读物。在主流文学的刊物,如《人民文学》和《十月》上也偶然能找到科幻作品。

短暂的春天很快过去,在1983年的精神清污运动中,科幻小说被强力划归为科普读物,其中幻想的成分,被一些重要媒体视为伪科学和精神污染,打压了科幻创作的积极性。

而刘慈欣并未幻灭,两次仰望星空,预示着他与科幻的故事刚开始,1985年他考入娘子关火电厂,像“黑暗森林法则”中潜行的猎手般蛰伏着。成长经历将如何作用于他的创作,还未见端倪。

社会学与写作试验

娘子关火电厂距离阳泉39公里,在太行山脚下。刘慈欣在这里潜心写作十年,从这里,成长为一个顺势而为的人。

山脉的另一处蜿蜒着古老的娘子关长城。刘慈欣在假日偶然登临时会看到,这是长城的第九关,宏伟的城墙分跨了山西和河北。

在他1989年开始创作的长篇《超新星纪元》的初稿中,长城这一意象曾经出现过。与之相关的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人类历史上,两种文明的力量对比,深刻影响了亚欧大陆文明格局,并进入了《罗马史》,影响到了俄罗斯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基地》,后者把两种文明的竞争搬进了宇宙。

刘慈欣本人也受阿西莫夫的影响,在后来的《三体》中加入了在不同星系补充给养,进行永久星际旅行的概念。他在《远航!远航!》中提到了“永恒的漂泊可能被认为是文明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



这个十年,刘慈欣不仅读到了科幻黄金时代三巨头——克拉克、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也读了大量物理、天文学和宇宙学方面的书,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读一些社会和历史学的相关读物。

有趣的是,尽管刘慈欣深受硬科幻影响,对外强调自己是个科技主义者,较少提及自己在社会学上的兴趣,但这种痕迹时常流露在他的作品中。尤其体现在集大成的《三体》中“宇宙社会学”的提出。

工程师刘慈欣理解社会学中的核心“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在近三十年的生活实践中得来的。他在《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中提到,1990年前后,他每天与工人们接触,厂外就是农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因为工作缘故,他见过西伯利亚的工业废墟,并醉心于这种文明的特殊遗址。

刘慈欣曾在社会主义联盟濒临解体时进入苏联,他先看见了作为失败的社会学试验的苏联,后又看到了作为航天大国的苏联。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一万年以后,不会有孩子问起,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联盟是谁?但肯定会有孩子问,是谁第一个把人类送出地球的?”

作为一个想为人类幻想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人,刘慈欣不愿被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在研究者吴岩的眼中,刘慈欣的顺势而为,主要体现在他在十年实践中,对市场、读者和国际科幻文学潮流的把握,而非闷头写作,因此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畅销书作家。

吴岩在论文中提到“与王晋康、杨鹏、星河等人将科幻的革新置于某一个侧面不同,刘慈欣对科幻现状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从叙事到主题,从情感基调到人物面貌。”

刘慈欣的创作,经历了以纯科幻(以短篇小说《微观尽头》和《宇宙坍缩》为代表)到人与自然(以短中篇《流浪地球》和长篇《球状闪电》为代表)再到社会试验(以长篇《超新星纪元》为代表)三个阶段。他在《重返伊甸园》中的一段话,显示了自己对形势的清醒认识:“笔者在创作伊始就意识到科幻小说是大众文学,自己的科幻理念必须



与读者的欣赏取向取得一定的平衡。”

尽管《三体》的最后一部并没有太顾及市场,又回归了刘慈欣喜欢的纯粹硬科幻小说,从社会学推演出了宇宙和自然的属性,但《科幻世界》图书部主任拉兹也向《凤凰周刊》表示:“作家们更应该借鉴刘慈欣的创作思想,平衡市场需求和自我表达的关系。”

中国科幻“走出去”

1999年春,已经玩转了多种科幻风格的刘慈欣,顺势而为,以五篇小说《鲸歌》《微观尽头》《宇宙坍缩》《带上她的眼睛》和《地火》,震惊了《科幻世界》编辑部。

从此,刘慈欣在《科幻世界》百投百中,为国内科幻迷所熟悉。

成全刘慈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姚海军被称为“中国的坎贝尔”,正如姬少亭所说,他所在的《科幻世界》团队看到了科幻出版市场上中短篇丰富而长篇缺乏的现状,鼓励刘慈欣等人向长篇发展。2003年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终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当时,女作家钱莉芳的长篇《天意》也在口碑和市场上实现了双赢。刘慈欣备受鼓舞,又一鼓作气在次年出版了《球状闪电》。从此,刘慈欣的创作和出版势不可

挡,并多次获得银河奖。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加强了“科技兴国”的宣传。伴随着经济利好、大国崛起思想的,是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外科幻小说的版权交流增多,不同文明间的“被发现”愈发成为可能。

进入新世纪的15年以来,科幻世界做了很多平台推广。拉兹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2002年第一次系统化大规模引进国外作品;2003年下半月刊《科幻世界·译文版》创刊,推广外国科幻。2007年,以在成都举办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为契机,与日本互推科幻专辑。

刘慈欣先后于2012年和2015年去伦敦和纽约参加了国际书展。而陈楸帆、飞氲、王瑶等年轻作者的作品,也被集体翻译成他国语言,推向国外,并出版了一些中国科幻专辑。

正是在这相对有利的内外大环境中,刘慈欣于2005年至2007年之间,完成了《三体》系列创作连载。很快,2008年,该系列第一部和第二部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和出版方美国托尔公司的帮助下,推出了英文版。2011年,《三体》系列完结。

刘慈欣还看到,席卷全世界的第三次科技浪潮——互联网革命,不仅在影响自己创作的题材,也在培养自己的读者。“在航天界、互联网领域,却是科幻小说读者最集中的两个领域。”马云、马化腾等互联网行业精英,和商界政界精英纷纷成为《三体》的粉丝。

同时,21世纪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搭乘这一浪潮,争先与科幻产生了跨界交集。刘慈欣的顺势而为,也在于他是国内科幻作家中较早向影视和游戏行业进军的。刘慈欣对于小说与电影之间的产业链同样有清醒认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科幻电影看得最多的,有时候一天一部”,姬少亭告诉记者。2006年,他便和导演宁浩商量改编科幻电影。2015年,他的多部科幻小说都参与了电影改编。

多年来,刘慈欣一直关注前沿科学领域,他告诉记者“科幻作家的眼睛必须看得比时代更远。”

历史属于失败者

历史何止是一种对失败者的慰藉，甚至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失败者的历史。

文 / 陶林

人称“草根才子”的作家杜君立，在新书《历史的慰藉》中提出一个观点：“历史是对失败者的一种慰藉”。失败者因其失败，而不能拥有现在及未来，但尚能有一笔历史存在，这或许是对失败者一种冥冥中的告慰。然而，历史何止是一种对失败者的慰藉，甚至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失败者的历史。

《历史的慰藉》是一部随笔集，收录了作者关于各种边缘史的随记与随感。散文的笔法，史家的态度，文笔清晰，十分好读——除了这些纯粹文体性的表面优点之外，更值得读者阅读这部书的理由，还在于作者在行文中所构建的看待历史的态度。

《春秋》的传统

在全书12篇文章中，作者分别记录了一些貌似“故事”很少、不算“热点”的地方史和边缘史：戏曲史、饥荒史、土匪史、盐政史、钱币史、茶叶史等。与动辄“某某朝那些事”那样的鸡汤史学著作相比，这部《历史的慰藉》虽然行走于“冷”与“野”，但是却非常“正”与“实”，是一部非常耐看的史学随笔。

作为写作者，杜君立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一定要弄清楚他感兴趣的现状的来龙去脉。这个刨根究底的态度，使得读者会不自觉地被卷入到作者的兴致之中。

在《曲终人亦散》中，他理清某些传统元素消亡的必然性，解答历史选择的问题；在《民国十八年年馑》中，作者从自己童年时代的疑惑出发，追寻陕西关中地区的一次惨绝人寰的饥荒，追索历史灭绝的



《历史的慰藉》

杜君立 著
华文出版社



作者更关心历史中的“现状”，人们怎么去京控上访，怎么度过“人相食”的饥荒，怎么在权力之下弯曲自己的膝盖，怎么为吃一口盐而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帝国……

问题；在《权力的道德》中，就“以德治国”四个字，作者拿出历史谱系学的本领，追索“道德”在历史和权力语境下的变迁，让诸多“想当然”的做法变得令人疑窦丛生；在《微盐大义》一文中，作者又拿出春秋笔法，不著一字之褒贬，直陈中国盐政两千年，剖析权力游戏下的掠夺与盘剥，令人浮想联翩……总之，强烈的“代入感”，让读者既能阅史发兴亡之叹，更能阅世，对自身的处境有不由自主的体味与思考。

在我们曾经古典的中国，一直有所谓的“春秋”传统，用历史来论证道德“经典”，

即所谓的经与史互证。“经”指明生存的意义和品质要求，“史”提供论证的途径和正反经验，经史如骨骼，支持中国这个复杂的共同体向前爬行而不一朝覆亡。

难说杜君立不是受这样传统的影响，并且在新的历史状况下，意欲延续这一传统。一万年来谁著史？官家名为修史，实为顺治。让一切历史变成当代史，一切历史因果变成当代政治之说辞，是官方的强项。古代扮演这个“官方”操刀手角色的是翰林院，而今是学院，体量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功能和智能的进化。有史堪读，写史可信的，无非心中一腔热忱的读书人，像陈寅恪那样遗世独立、以人格为写作担保的良史家。故而，在全书的序言中，杜君立强调了类似司马迁那样独立著史的重要性，官家贬之为“野史”，读者信之为“个人史”。

有无“耻辱柱”

《历史的慰藉》算是当代一部很认真的野史杂著，然而作者所持之态度丝毫不逊于经院史家，严谨、周全、以证据说话，一点不打折扣。写作边缘史需要的实证功夫，往往要比写中央史完备。弄清楚一个普通人在历史沉浮中是怎样捱过来的，是非常难的事情。杜君立并不太关心具体的人事，宫廷帝王将相全然不感兴趣，特别是计谋之类更不以为然。

他更关心的是历史中的“现状”，人们怎么去京控上访，怎么度过“人相食”的饥荒，怎么在权力之下弯曲自己的膝盖，怎么为吃一口盐而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帝国……当把这些细致而微的存在故事讲得

清晰透彻,我们面对浩瀚历史的态度,都会发生截然的变化。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去,怎样就置身于这个希望与绝望交织、现实与魔幻交织、文明与野蛮交织的东方古老文明中。

诚如杜君立在序言中所说,历史本身对现实或许毫无意义,或许仅仅只是一种淡淡的慰藉。已有之事,曾经不断循环,难保说不,失败之人事,或许注定失败了,也不值留恋。然而,就中国的“春秋”传统而言,我坚信其实也是无效甚至是失败的。古人有说法,“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我真怀疑这是著史者给自己壮胆的。

既然历史中不断有人大胆向未来放言,“天子宁有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证明“无所谓”的态度,远比王莽式的满腔投入来得更爽快。人们可以假借历史的名义做一点评判,但打不了人,也吃不了人。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冤冤相报无止尽,暴力渐渐战胜了“天道”,成为了历史主角。在一个强权为王、暴力横行的世界里,只有写史,才能在荒江野屋之中,悄声地问一声“正义何在”。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或许经历耻辱、灾难和悲剧太多——多了便不足为奇,也无以作为是非曲折的标准,或许,其本身就是历史一种演进的成本。“历史”一词能否作为一个全知全能全德的人格化主体,给一个民族以稳妥的善恶良邪指示呢?

我们喜欢把内心的对立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倘若历史并没有这么一根“耻辱柱”,甚至人们只在乎眼前的胜败得失,并不真正在乎“耻辱”二字,我们又将如何相待?心安理得承认失败的事实么?在无法想象出更高、更终极性的存在的国度里,即便历史有那么一点点对人的约束力,那也是一种弱的行为规范,而不是一种强的精神自律。

历史的脉络

《历史的慰藉》志在为无数历史的失败者做一点点记录,失败的戏曲、失败的草民、失败的饥民、失败的土匪、失败的官吏、失败的经济、失败的道德与膝盖……作

者原先设计的书稿是成书的两倍之多,几乎收罗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失败者,如果后继能得以出版,通读之下,我们一定会得出一个明确结论:或许整个历史都是失败的,所有应该出现的失误都出现了,所有的问题被提出,答案却永远只能在风中飘荡。

身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杜君立有一个基于传统的判断,就是历史上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与鞑靼文化的消长,这有类于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谈论的“正邪”二气的消长。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文化代表着礼法、文明、理性与秩序,代表农耕的节制与敬天爱人;鞑靼则代表游牧的野蛮,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对暴力的崇拜,狼群原则的本能等等。

历史的脉络何其诡谲,任何人都只能叹兴亡,不能挽狂澜。历史本身只属于失败者,因为现实属于成功者。恐龙失败了,它成了历史;剑齿虎、猛犸象失败了,也成了历史;森林猿人失败了,它也是历史;迦太基帝国、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都覆亡了,乃有各自的史记……只有中华帝国终结了,我们才对整体全部失败的帝王将相和宫廷权谋保持那么浓厚的兴致,才会把对他们亡魂的想象,移诸到当代公权者身上——虽然两者就实情与法理上天差地远。

对于失败者,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慰藉,而是其主体与本体。因为有无数的失败者存在,才有历史存留的必要。历史记录失败者的失败,倒并非为了证明现存者的成功,而是保存了我们走过的道路,也同时保存着冥冥之中无数的可能性。

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了又降,降了又升;犹太的约立了又毁,毁了又立;中国的孔庙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类的历史貌似不断循环,实质在不断前行。当我们满腔热忱地要“复兴一个伟大文明”和“光辉的历史”之前,一定要稍稍弄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有什么。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倾听历史本身的意志:历史在终结,而现代性则如滔天洪水那样在绵延。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書屋

《世界秩序》 亨利·基辛格(美) 中信出版社

此书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新著。当今世界,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失去优势,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建立。在历史性转折期,基辛格深刻探讨了怎样才能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形成共同秩序。



《历史的教训》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美)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本人类哲思之作,它试图通过对各种历史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启示。作者从生物学、种族、性格、道德、宗教等不同维度,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



《生活与命运》 瓦西里·格罗斯曼(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此书真实、全面地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的生活面貌,表达了对苏联古拉格的哀歌与沉思,迫使我们反思自由的含义、集权主义的本质,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发现李庄》 岱峻 福建教育出版社

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以及中博院、同济大学等被迫迁到四川宜宾的李庄镇,并在那里安居了六年。本书以翔实的历史调查资料、诸多珍稀的图片,发现了那段尘封历史,记载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往事。

